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陆游悬案揭秘


eBOOK
网络资料 非精英

一、家世身世之谜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月十七日，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陆宰奉诏进京，他携家自楚州（今江苏淮安）经淮河去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夫人唐氏在舟中为他生下第三个儿子。这位婴儿便是陆游。

时局相当严峻。这年冬天，我国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开始大举南侵，铁骑纵横，狼烟滚滚。一年后，开封陷落；又过了一年，徽宗、钦宗被掳北去，“靖唐之耻”为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划上了一个不光彩的句号。当时，号称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从河北逃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是为南宋高宗。随后，赵构在金兵的压迫下，仓皇渡江南逃。南宋政权偏安一方、苟延残喘的局面便由此形成了。

陆游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陆游幸运地落脚于具有爱国思想传统的家庭里，从小就听到爱国志士的抗金言论，再加上他有“儿时万死避胡兵”的惨痛经历，小小的心田里便种下了驱逐金兵、恢复中原的种子。“儿时祝身愿事主，谈笑可使中原清。”此后，此种志向终生未渝。正是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把陆游培养成为一位民族战士和爱国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是实现宏伟抱负的有效手段。陆游开始努力读书了。谁知，这位令人瞩目的少年才子竟屡试不第。这既与科举考试中的偶然性有关，也与秦桧当朝的政治气候有关。

看来，陆游破土而出的时机尚未到来。他必须学会等待。

陆游在等待。不过，他是在充实自己的过程中等待。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

据说，陆游母亲唐氏于临产前梦见了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字少游），于是，她便将新生儿名字定为“游”，字“务观”。然而——

秦观托梦之说可靠么？

《山阴陆氏族谱》载：“游字务观，小字延憎，号放翁，晚号龟堂老人。……于徽宗宣和七（原作十，显误，今改。古书中，七、十多互误——引者）年乙巳十月十七日寅时生。”

陆游为何名游而字务观呢？宋人有种种传说。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陆放翁”条谓：“盖母唐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韦居安《梅诗话》卷中亦载梦生之说，而无“或曰”。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比如，陆游确实很钦佩秦观。《剑南诗稿》卷七有《出游归卧得杂诗》，诗云：

江村处何小茅茨，红杏青蒲雨过时。

半幅生绢大年画，一联新句少游诗。

诗中的大年即赵大年，宋宗室，善画山水翎毛，山水画以王维为法。通过此诗，我们可以领悟到陆游对秦观景物诗的欣赏。《剑南诗稿》卷六六有《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诗云：

晚生常恨不从公，忽拜英姿绘画中。

妄欲步趋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情形，一些陆游传记的作者认同了《四朝闻见录》的说法，将陆游之得名与其母梦见秦观联系起来。朱东润先生在《陆游传》中，曾这样描写陆游降生时陆宰（陆游父）的心理活动：

窗外的雨声停下来了，仓里好像安静了一些。他（陆宰——引者）想起早一晚夫人曾经梦到秦观，这一位比自己高一辈，诗和词都做得很好，也能写些文章。是一位旧派呀，不知妇道人家为什么会梦到他？何况这两年皇上正在禁止元学术，凡是学习苏轼、黄庭坚、秦观、张耒这些人的诗文的，都要受到处分，那么即使真是秦观投胎，那有什么好处呢？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岳母不是晁家的吗？她的兄弟辈冲之、说之、补之，还不都和苏、黄有一些来往？补之和秦观一样，是苏轼的门生，“苏门四学士”中的人物。可能正因为这个关系，夫人会梦到他罢。

“秦观，字少游，这个孩子就起名陆游吧。”陆宰做出了决定。及至陆游长大以后，朋友们称他为陆务观，就是这个由来。

这一段文字尽管相当生动，其实站不住脚。陆游母唐夫人为名门之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将要具体介绍），她即使真的梦见了秦观，也决不会将此事张扬出去，因为，这种梦恐怕有“同床异梦”之嫌。这是不言自明的。

其实，陆游之得名，本于《列子》。《列子·仲尼》：“壶丘子曰：‘御寇之游，固与人同欤，而曰固与人异欤？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务外游，不知务内观。’”这里的“游”、“观”就是陆游名字的出处。当然，这也是秦观名字的出处。二人同据此书命名起字，所以才有这样的巧合。

《礼记·檀弓上》说：“（古人）幼名，冠字。”而配字的原则便是要求字与名在意义上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所谓“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白虎通·姓名》）。那么，游与观在意义上确有联系吗？答案是肯定的。杨伯峻先生在《列子集释》中说：“外游、内观相对，则观亦游。……《吕氏春秋·季春篇》云：‘禁妇女无观。’高注：‘观，游。’皆其证也。”杨伯峻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观、游二字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这一点，还可以从二字的连文这种情形得到印证。

《关尹子·六七》：“一蜂至微，亦能游观乎天地。”

《韩非子·存韩》：“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

《战国策·秦策三》：“愿少赐游观之间，望见足下而入之。”

由同义的二字所组成的合成词，大都可以颠倒词序，而词义不变。游观亦可作观游。

扬雄《羽猎赋》：“罕徂离宫，而辍观游。”

《汉书·贾山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

《孟子·梁惠王下》：“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赵歧注云：“当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观游乎？”

以上所引，可以作为观、游同义之证。由此，放翁之游、观与淮南居士之观、游，从名与字的关系上来说，均属于互文见义之例。

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问题：陆宰为何依《列子》为其子命名取字？这与陆氏家风中浓郁的道家习气很有关系。《剑南诗稿》卷六六有《道室试笔》诗，其中有“吾家学道今四世，世佩施真《三住铭》”之句。陆氏家富藏书，其中道书一类就达二千卷之多，由此陆宰为儿子命名时想到了《列子》，这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陆游之名字，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务观”之“观”字的读音。观字音有数读，虽属六朝文人强生分别，然至少自唐以来已相沿成俗；而其词义，除“游”义外，尚有数义，各义之间读音错综交叉，非常复杂，不同的义项分别读平、上、去三音，即使同一义项，亦有平、上、去数读的现象。

游观之观应读去声，与纵观、奇观、壮观之观声同，这从下面的诗句中可以得到证实。王安石《杭州呈胜之》诗：“游观须知此地佳，纷纷人物敌京华。”又，《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诗：“传觞三鼓罢，纵观万人同。”杨万里《过弋阳观竞渡》诗：“三年端午真虚过，奇观初逢慰道涂。”陆游《南省宿直》诗：“犹喜眼中多壮观，时看云海化鲲鹏。”上引五七言诗，均为律诗，依照诗律，观都应读去声。

观字音义相当纷繁，不免使人感到难以辨读，无怪乎陆游的名字常被人误读。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史相力荐放翁赐第，其去国自是台评。然王景文（即王质——引者）乃云：“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阴陆务观。”放翁见诗亦笑云：“我字务观，

乃去声，如何把作平声押了？”

王质与陆游是同时代的人。可见，陆游生时便有人误读其字了。

陆游出身于官僚地主士大夫家庭，光荣的家世常常唤起他伟大的回忆，他自称远祖是“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之后。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宋人修家谱“家自为说”的通病。那么——

陆游是不是楚狂接舆之后？

开禧元年（1205），陆游在山阴作《草堂》一诗（见《剑南诗稿》卷六一），诗云：

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
漉残醅瓮葛巾湿，插遍野梅纱帽香。
风紧春寒那可敌，身闲昼漏不胜长。

浩歌陌上君无怪，世谱推原自楚狂。诗中最后一句，陆游自注云：“《陆氏旧谱》云：本出接舆后。”接舆是春秋时代的楚国狂人。据《论语·微子》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楚国的狂人接舆一面走过孔子的车子，一面唱着歌道：“凤凰呀，凤凰呀！为什么这么倒霉？过去不能再挽回，未来的还可不再着迷。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诸公危乎其危！”孔子下车想与他交谈一番，他却赶快避开走掉了。

这位接舆是谁呢？曹之升《四书摭余说》云：“《论语》所记隐士皆以其事名之。门者谓之‘晨门’，杖者谓之‘丈人’，津者谓之‘沮’、‘溺’，接孔子之舆者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曹氏的这段分析相当精彩，可谓不刊之论。那么，这位无名无姓的狂人，怎么竟成了陆游的远祖？原来，西汉人刘向《列仙传》卷上有这样一段文字：“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好养生。”接舆居然姓陆！不过，《列仙传》属小说家之言，不足为凭。而且，“陆通”之名显然是由“接舆”附会而来，《陆氏旧谱》所云不值一信，陆游也决不会是楚狂接舆之后。

陆游曾师从曾几，曾几说陆游是晋代大诗人陆机、陆云之后。曾几《茶山集》卷一有《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云：“贤哉机、云孙，道眼极超胜。”陆游本人对此也引以为自豪。《剑南诗稿》卷四有《九月六日夜梦中作笑诗，觉而忘之，明日戏追补一首》，诗云：“我家笑疾自士龙，我才虽卑笑则同。”士龙即陆云之字。《晋书·陆云传》载：“吴平，入洛。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华为人多姿制，又好帛绳缠须，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己。先是，尝著上船，于水中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这种血脉关系，因世久年湮，已难考信。

陆游还自称其近祖是唐代名相陆贽。《渭南文集》卷二七有《跋续集验方》，文云：“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时，著《陆氏集验方》，故家世喜方书。予宦游四方，所获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集验方》，刻之江西仓司民为心斋。”文中所谓的宣公即指陆贽。

这种说法也大可怀疑。我们知道，唐末的黄巢起义，横扫南北，大批旧贵族官僚被杀，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基本上被消灭。经过五代十国战乱，旧氏族更被打得七零八落了。郑樵明确指出：“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宋人自

己也有这类看法，如，程祁便说：“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程氏世谱·序》）。北宋初年，在“近古谱牒之制”废绝不传的情况下，大家族从宋仁宗时开始了重新修订家谱活动。欧阳修曾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他发现这些旧谱诸本大抵内容残阙，文字芜杂，便对它们加以重新整理，成为宋代私修家谱的样板。编修家谱要叙述先世，宋代的家谱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号称精密的《欧阳氏族谱》，也是错误百出。例如，“其言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当唐末，黄巢陷州县，率州民捍贼，乡里赖以保全，琮以下谱亡。自琮八世生方，为安福令，公为安浮蹬世孙。以是考之，询在唐初，至黄巢时，几三百年，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才百四十年，乃得十六世”（《齐东野语·谱牒难写》）。这显然是个极大的疏误。在宋代，有的家谱还出现了“孙显于六国尚存之前，而祖仕于秦既并天下之后”的大笑话。这种错误的成因很多，宋人在编修家谱过程中，为了达到使族众产生孝悌之心的目的，往往故意将历史上的同姓名人引作自己的祖先，这是错误的成因之一。陆游上溯祖先至楚狂接舆、陆机陆云乃至唐相陆贽，正是基于同样的心理。

在陆游的先人中，虽没有楚狂接舆、陆机、陆云以及陆贽等等名声赫赫之流，但其近祖中却颇有几位较为人知者。我们介绍如下：陆游的高祖陆轸，字齐卿，大中祥符中进士，仁宗康定元年（1040）做过会稽太守，皇 中做过吏部郎中，直昭文馆，赠太傅，以后又做过睦州太守。陆轸聪明过人。陈鹄《耆旧续闻》卷一：“陆太傅轸，会稽人，神采秀异，好为方外游。七岁犹不能语，一日乳媪携往后园，俄而吟诗曰：‘昔时家住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在人间。’”这段记载当然不可能是实有其事的，但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当是陆轸幼时才智过人的一种曲折反映。

陆游对陆轸推崇备至，认为他有重振家风之功，《剑南诗稿》卷四六有《舍西晚眺示子聿》，诗云：“西望牛头渺天际，永怀吾祖起家初。”自注云：“牛头山在小江西北，有先太傅读书堂尚存。”陆轸曾挂冠归隐，陆游对此也油然而生敬意，将其与唐代大诗人李白并列，《剑南诗稿》卷七有《与青城道人饮酒作》，诗云：“两公穷达何足道，同是逸气横清秋。”诗中的“两公”便是指李白与陆轸。陆轸晚年学仙修道，自号朝隐子，专意炉鼎炼丹。陆游对此也很以为然，《剑南诗稿》卷五六有《岁晚幽兴》，诗云：“全家共保一忍字，累世相传《三住铭》。”自注云：“先太傅亲受《三住铭》于施肩吾先生，授游曰：‘汝其累世相传毋忽。’因即以传聿、诸子。”据蒋超伯《通斋诗话》卷上，《三住铭》为施肩吾（自号三住老人）所著，“论气形神之旨”。另外，陆轸仕宦四十年，不置产业，这也很让陆游敬佩。

陆轸生二子：长子名琪，万载县令；次子名 ，国子博士。陆 是陆游的曾祖。 生四子： 、佃、傅、倚。陆佃就是为陆游所津津乐道的祖父。

陆佃（一作甸），字农师，号陶山，少从王安石学经，是王氏新学人物，对《礼》尤有深研，但由于不同意王安石变法，后入元 新党。陆佃由于不

赞同新法而得罪了王安石，很少参与政事，只以经学任用，并不得志。哲宗立，守旧派领袖司马光任宰相，排挤王安石党，王安石的故旧门生都不敢和王来往。王安石死后，陆佃率诸生前往哭祭，足见其颇有骨气。陆佃一生著述丰富，当时传世的有：《二典义》一卷、《诗物性门类》八卷、《礼象》十五卷、《春秋后传》二十卷、《尔雅新义》二十卷、《埤雅》二十卷、《冠子解》三卷。这些著述成为陆氏家学。陆游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祖父的学识与人品。《剑南诗稿》卷四九有《诵书示子聿》，诗云：“楚公著书数百编，少师手校世世传。”楚公即陆佃（陆佃于徽宗朝封楚国公）。《剑南诗稿》卷五六有《家居自戒》，诗云：“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

陆游的父亲陆宰，字元钧，号千岩，师承陆氏家学，很有学问，亦能写诗。他于徽宗政和年间做过淮西常平使者，宣和末年，为朝请郎直秘阁权发遣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公事、京西路转运副使、赠少师（亦作少傅）、会稽公。南渡后，受到投降派排挤，后居家不仕。

综上所述，陆游虽并不是楚狂接舆之后，但也确实生于名门大族，长于诗礼簪缨之家，先人的业绩常常唤起他伟大的回忆，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陆游虽生于一个不幸的年代，但却落脚于一个幸运的家庭。山阴陆家不仅人才辈出，而且藏书极为丰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 载：绍兴十三年（1143），南宋建秘书省，征求天下遗书，陆宰家奉诏录所藏之书。而据施宿《会稽志》，此番陆家献书共“万三千卷有奇”。丰富的家庭藏书，大大拓展了陆游的知识视野。那么——

山阴陆家为何有如此丰富的藏书？

陆家有如此丰富的藏书，固然与陆游高祖陆轾以下历代嗜学有关，也与浙江的藏书之风有关。

浙江是文物之邦，历代有藏书之风。特别是到了宋代，杭州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时人有言：木板书以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后人珍视的宋板书有许多是在两浙的杭州、明州（宁波）、婺州（金华）、绍兴、台州、严州（建德）、湖州、嘉兴、衢州等地刻印的，这又为浙江藏书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浙江藏书之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皇家藏书。杭州是五代吴越国建都之地，吴越王钱滕祖孙几辈皆好贮书，政府图籍亦富收藏。据宋人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两浙钱 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阁。”书数虽不详，但当不在少数。

（2）佛寺藏书。谈到佛寺藏书，历代学者盛称北宋李公择的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僧舍的九千余卷藏书，自苏东坡《李氏山房藏书记》一出，名扬天下。然而，两浙佛寺亦多有藏书，时至南宋，洪咨夔在浙江西天目山宝福寺的闻复阁藏书已足以与李氏山房藏书相媲美。据《天目山名胜志》载，洪咨夔于此读书，藏书一万三千余卷。此种情况，正是北宋以来浙江佛寺藏书的一种极端发展。

（3）书院藏书。在宋代，全国以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藏书著称，而浙江亦有不少书院，发展至后来，较有名的有东阳郭钦正的“石洞书院”和蒋友松的“南国书院”，前者藏书号称十万卷。

（4）私家藏书。浙江私家藏书年代早，范围广。据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浙江私家藏书之风始于晋代，藏书名家和著名藏书楼日见增多。南宋之初，除陆氏外，山阴进士诸葛行存、尚书石公弼二家也藏书极多，与陆家共成为天下之首。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诸葛行存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受到南宋政府的褒奖。如前所述，陆宰家奉诏进所藏书一万三千卷，为充实南宋皇家内府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在较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山阴陆氏的私家藏书之多。这种家藏万卷的生活环境，不仅开拓了陆游的知识视野，也培养了他收藏书籍的兴趣。陆游也是一位藏书家，有藏书室“书巢”、“双清堂”。陆游入蜀，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陆游有诗云：“要与万卷归林庐”，其藏书当在不少。

陆游出生于一个诗书之家，特定的家庭氛围对于陆游的成长（乃至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要了解山阴陆氏家族的诗书风气，就必须提及陆游本人所撰的《家世旧闻》（共二卷）。这部著作是研究陆游的宝贵文献。然而，从元代起，人们已难于见到《家世旧闻》的全貌，陶宗仪《说郛》中辑《家世旧闻》共八条；《文渊阁书目》卷八著录《家世旧闻》二部，共二册，云缺。其实，《家世旧闻》一向以抄本流传，曾一睹此书者

称其为“书库中之秘籍”。那么——

《家世旧闻》究竟有什么史料价值？

多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得到《家世旧闻》的全本，因此，无法领略这部“惊人秘籍”的全貌。1957年，孔凡礼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里竟意外地发现了《家世旧闻》全本（明代穴砚斋抄本），于是，一部久秘不宣的陆游之作得以面世，人们得以评判该书的巨大价值。

《家世旧闻》记述了陆游高祖陆轸至父亲陆宰几代人以及外家唐氏的遗闻轶事，为研究陆游提供了新的第一手可以信赖的资料，较之《老学庵笔记》更为直接。

《渭南文集》卷三二《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云：“太傅（即高祖陆轸，赠太傅——引者）始以进士起家，楚公（即祖父陆佃，赠太师、楚国公——引者）继之，陆氏衣冠之盛，复如晋唐时。”据说，从陆轸始，山阴陆家大抵能诗文，但除陆佃有《陶山集》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題》作二十卷）传世外，其他人诗歌作品传世者甚少。而《家世旧闻》正好弥补了这种不足。

关于陆轸。陈鹄《耆旧续闻》卷一：“陆太傅轸，会稽人，神采秀异，好为方外游。七岁犹不能语，一日乳媪携往后园，俄而吟诗曰：‘昔时家住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在人间。’”这固然是夸张的传说，但陆轸善于诗文却为《家世旧闻》所证实，该书录陆轸任福建转运使时所作《赠真行大师》诗：

语录传来久，所明机道深。
霜天七宝月，禅夕一真心。
只有道为证，更无尘可侵。
前溪迳出没，谁自愿浮沉。

此外，《家世旧闻》还完整地保存了陆轸的两篇文章，这也是他流传下来的仅有的二篇完整文章。

关于叔祖父陆佃。据《会稽续志》卷六，陆佃为熙宁六年余进士。陆佃少以经术、文采见知王安石，与兄陆佃齐名，世称“二陆”。《家世旧闻》云：“六叔祖祠部（即陆佃——引者）平生喜作诗，日课一首，有故则追补之，至老不衰。年八十余，尝有句云：‘枕上欢醒宿酒，窗间秉烛拾残棋。’”又有《闻乱》云：“宁知小儿辈，竟坏好家居。”《家世旧闻》所录的陆佃诗句，不见于他书。除此之外，陆佃的全部作品都已失传。

陆游之父陆宰爱好诗文，也能作诗。《剑南诗稿》卷四五有这样的诗题：“《先少师宣和初有赠晁公以道诗云：‘奴爱才如肖颖士，婢知诗似郑康成。’晁公大爱赏，今逸全篇，偶读晁公文集，泣而足之。”明张元汴《云门志略》卷四载有陆宰《云门小隐》，诗云：

冉冉溪流十里长，上方钟鼓度榕。
烟霞已属维摩诘，岩壑徒夸顾长康。

舟逐泉飞苔渍井，笔随人化草迷仓。

昙花经叶金园寂，一炷檀熏夜未央。

《家世旧闻》录陆宰诗二首。

其一是徽宗宣和初年，陆宰为淮西提举常平，行部至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访三祖山（在今潜山县境内）惟照长老不值，留诗于壁间：

芙蓉已入双林寂，山谷今传佛祖衣。

千里客来何所遇，夜堂人静雨霏霏。

其二是高宗绍兴初避地东阳（今属浙江）山中，临归时留别诗云：

前生疑是此山僧，猿鹤相逢亦有情。

珍重岭头风与月，百年常记者夫名。这两首诗不见于他书，尤显珍贵。

《家世旧闻》还录有陆游伯父陆字年未二十时写的《别友人》诗：

园花今烂熳，一一手亲栽。

惟有新离恨，东风吹不开。

这首诗显示出作者颇有艺术才华。此诗亦不见于他书。

以上见于《家世旧闻》中的诗，大抵是陆游随手记下，或者是为了说明某一问题而举诗为证，并不是精心选出的代表作。到了陆宰那一代，山阴陆氏已经是很大的家族，人口众多，满门纱帽。这个家族中的子弟，吟咏为诗是习以为常的事，而且有人异常勤奋（如陆傅“日课一首”）。这样的氛围，为陆游在诗歌世界里的驰骋、翱翔，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根据《家世旧闻》记载，山阴陆氏家族从陆轶到陆宰，出入朝廷，经历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八代，为官者均以忧国忧民为先。陆轶为馆职时，不顾个人利害，举笏指仁宗御榻说：“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须好作，乃可长保！”明日，仁宗以其语告大臣，很赞叹他的淳直。陆佃在海州作官时，曾有“无地得施调国手，惟天知有济民心”之句，其志“常在生民”。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陆佃任尚书左丞，为朝廷要员，他感叹当时“天下大势，政如久病羸瘠、气息仅续之人，但当以糜粥养之于茵席间”，“若虐使驰骋骑射，岂复有全人”，把持朝政者的种种荒谬之举把国家引上了极为危险的道路，他为此忧心忡忡。陆宰在徽宗大观年间为江阴酒官，与因危言说论而屡遭贬斥的邹浩来往密切。在任淮西提举常平时，为刘仁瞻立庙；在任京西路转运副使时，为王彦章、裴约之庙书榜。他们都是五代时全节之士，陆宰表彰他们，是为了扶持正气，激励人们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从《家世旧闻》以上的叙述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陆游深厚的爱国思想有着肥沃的土壤环境。

当然，《家世旧闻》也叙述了道家对山阴陆氏家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陆游一生的诗文中也时时表现出来。

总之，《家世旧闻》有助于我们了解陆游生活的特定小环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最后，我们顺便介绍一下《家世旧闻》的写作年代。《家世旧闻》问世

后，受到了当时著名历史学家李焘的重视。李焘在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两处引用了《家世旧闻》，一处是卷三二六神宗元丰五年五月癸未纪事，另一处是卷三四八元丰七年九月辛亥纪事。据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二六《李文简公（即李焘——引者）神道碑》，李焘卒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那时，陆游60岁。据此，《家世旧闻》当为陆游中年之作。

陆游十几岁时，在云门山中读书，其同学中有一位名叫胡杞者。钱仲联先生在注《剑南诗稿》卷五《读胡基仲旧诗有感》时说：“《文集》卷二六《高皇御书二》：‘臣某少时与胡尚书之子杞同学于云门山中。’《诗稿》卷十在山阴所作之《比作陈下似……》自注：‘酒方昔得之胡基仲。’知基仲为山阴人，此诗有‘少日飞腾翰墨场’句，又与少年同学时之情景相合，疑基仲即是杞之字。”由于文献不足，钱仲联先生此处用“疑”表示猜测，那么——

胡杞究竟是不是胡基仲？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七册载：杞兄弟七人，杞为长，次则相、楫、枏、根、朴。胡相字作仲，因父亲胡直孺卒于会稽，遂家焉。据乾隆《浙江通志》及《宋会要辑稿》，胡直孺曾任刑部尚书、试兵部尚书，所以陆游称胡杞为“胡尚书之子”。

胡杞字基仲。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得出来：首先，杞兄弟名皆从木，一字相同当是兄弟取字惯例，故杞与相同有“仲”字；其次，《剑南诗稿》卷五六《寄题胡基仲故居》有“旅坟三尺云门寺”之句，可见，胡基仲确实曾住于云门；另据邹浩《道乡集·胡直孺集序》，胡杞本籍在豫章，故陆游诗中用“旅”字；最后，据《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七册，胡直孺葬云门白水塘，而胡基仲墓地亦在此处，这当然不是偶合。综合以上三条证据，胡杞必是胡基仲无疑。

陆游对胡基仲多有提及。《剑南诗稿》卷四四《追怀胡基仲》称其“高洁胡征士，当时已绝无”；卷五六《寄题胡基仲故居》称其“才气沙尘埋巨阙，文章林壑吼於菟”。《老学庵笔记》卷五有与胡基仲谈韩愈《石鼓歌》事。胡基仲之为人于此可见一斑。

陆游在《跋洪庆善贴》中说：“某儿童时，以先少师之命，获给扫洒丹阳先生之门。退与子威讲学，则兄弟如也。每见子威言洪成季、庆善学行，然皆不及识。”（《渭南文集》卷二十七）对于这位丹阳先生，赵翼和钱大昕的《陆放翁年谱》中都没有提及。那么——

丹阳先生究竟是谁？

于北山先生疑丹阳先生是鲍季和（见《陆游年谱》33页）。他以陆游《绍兴辛酉间，予年十七矣，距今已六十年，追感旧事作绝句》（《剑南诗稿》卷四十五）为证。诗云：“尝忆初年十七时，朝朝乌帽出从师（自注：与许子威辈同从鲍季和先生，晨兴，必具帽带而出）。忽逢寒食停供课，正写砚书作贖碑。”欧小牧先生在《陆游年谱》中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先生17岁，“先生从鲍季和先生学”。他在文后附注中引《跋洪庆善贴》后写道：“此丹阳先生，是否即是鲍季和？待考。”郭光先生在《陆游传》中说得更肯定：“（陆游）发愤读书，17岁外出从师，与许子威（名伯虎）辈同从云门鲍季和（字丹阳）先生受业，早出晚归。”（该书16页）

以上诸人的说法大为可疑。

鲍季和不过是一位平凡的私塾先生，名不见经传；而丹阳先生必定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因此，陆游晚年回忆起当时从师之事，很以为荣，并写下了“获给扫洒”之语。另外，“退与子威讲学”云云，暗有师从鲍季和在先，师从丹阳先生在后之意。因为年事渐长，陆游专心致学，“作贖碑”那样调皮之事，已经成为过去。

丹阳先生不是鲍季和，而是葛胜仲。

葛胜仲（1072—1141），字鲁卿，常州江阴人，徙居丹阳。他于绍圣四年（1097）及进士第，累迁太常卿。他曾采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太子善恶成败之迹，日进数事，诏嘉之。后除国子祭酒，寻知湖州，徙邓州。因受人排挤，罢归。建炎中复知湖州，政绩卓著。绍兴初丐祠归。绍兴十四年（1144）九月卒，年七十三，谥文康。《宋史》列之人文苑传。

葛胜仲有《丹阳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六评价说：“其节甚伟，历典诸州，皆有干略。再知湖州，遭逢寇乱，复有全城之功。其官绩亦足以自传，本不尽以文章重，即以文章论之，在南北宋间亦裒然一作者也。”

《丹阳集》卷二十有《次韵陆老祠部见寄五首》，其中第四首写道：

词场弱岁以文鸣，落落寒松见老成。

剧郡神君频结课，中台郎位早飞声。

当年威令千人废，此日精神一座倾。

欲试闲窗鸿笔健，春客诗轴灿群英。由此可见，葛胜仲对陆老很是赏识，二人情谊深厚，频有往来。这位陆老又是谁呢？陆老，名傅，是《陶山集》作者陆的弟弟，是陆游的叔祖。陆游在《跋洪庆善贴》中所说的“先少师”，便是指父亲陆宰。由于陆、葛两家是世交，陆宰叫陆游师从葛胜仲是十分自然的，而以葛胜仲的道德文章而论，也不负陆游“扫洒”之意。扫洒，即洒水扫地，表示极恭敬。比如，《后汉书·赵孝传》载：“亭长先时

闻孝当过，以有长者客，扫洒待之。”

丹阳先生之所以是葛胜仲而不是鲍季和，还可以从有关人士的籍贯中看得出来。陆游《跋洪庆善贴》中提到了洪成季、洪庆善。洪成季，名拟，一字逸叟，世称净智先生，本姓弘，避南唐讳改洪，丹阳人。《宋史》有传。洪庆善，名兴祖，号练塘，丹阳人，洪拟兄之子，是当时著名学者，著述颇丰，《楚辞补注》是其最引人注目者。二洪与丹阳先生有关，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现在，我们再谈一谈许子威。许子威，名伯虎。陆游《入蜀记》六月十四日记事中提到了他。许子威很可能也是丹阳人。《南宋馆阁录》卷七有许苍舒，字子齐，丹阳人。《宝庆会稽续志》隆兴元年进士题名，亦列苍舒。苍舒当原为丹阳人，后籍会稽。子威也许是子齐的兄弟辈。

陆游师从葛胜仲之地，当在吴兴。《丹阳集》卷二四附有葛胜仲《行状》，该文称葛胜仲晚年居吴兴：“筑室宝溪之上，山水环凑，名人魁士，杖策造门，公为之赋诗饮酒，乐而不厌。客去则观书著文，优游闲适，凡十有四年。与子孙讲论文艺，朝夕不置。闺门之内，弦诵相闻，彬彬若庠序然。”这便是陆游从师丹阳先生时的氛围。另外，洪拟卒于绍兴十五年（1145），洪兴祖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而陆游却与之“皆不相识”，由此也可知陆游师从葛胜仲之地在吴兴而不是在丹阳。

或许有人要问，陆游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自己是在“儿童”之时师从于丹阳先生的吗？根据葛胜仲之《行状》推算，陆游拜为门下之时当为绍兴十二三年间事，其时陆游十八九岁，怎么还能以“儿童”自居呢？其实这并不奇怪。《诗经·卫风·芣兰》中有“芣兰之支，童子佩”之句，孔颖达疏云：“童者，未成年人之称，年十九以下皆是也。”可见，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也是可以称为“童子”的。

陆游自幼聪明过人，12岁时便能为诗文，16岁时开始应试，但屡试不第，直至绍兴三十二年，38岁的陆游才被赐进士出身。陆游曾自信地写道：“落笔辄千言，气欲吞名场”（《剑南诗稿》卷五四《目昏废观书，以诗记其始，时年七十九矣》）。然而——

陆游为什么屡试不第？

依照宋人单岁入学的习俗，陆游9岁入私塾读书，教师是衢州江山县人毛德昭（名文）。据《老学庵笔记》卷一，毛德昭治学严谨，“苦学至忘寐食，经史多成诵”。陆游15岁成童之后，开始入乡校读书，教师有韩有功、陆彦远，他们都是守正不阿之士，在治学与做人上都给陆游以很大的影响。绍兴十年，16岁的陆游以荫补登仕郎的资格去临安吏部参加出官的考试，考试及格后即可放官。但陆游在考场上败北了，此次考场失意的原因很简单：陆游儿时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

宋代的科举是三岁一贡士。绍兴十三年，陆游年19，又逢到科举之年了。是年，他在绍兴府参加了以试诗赋为主的进士科的考试，考试中选，被推荐到礼部来应试，陆游便于秋季以应进士举来临安，准备明春试礼部。此次礼部考试，陆游不中。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归咎于诗文不好了。因为，就在这一年，陆游写了一首《菊枕诗》，是为新婚妻子唐琬写的一首爱情诗，“颇传于人”。还写了一篇《司马温公布被铭》，简要可喜，竟被当时人误传为秦桧所作（见《渭南文集》卷二二《司马温公布被铭》）。陆游的落第，只能是因为他“喜论恢复”的文章难以得到追附秦桧的考试官的赏识。

绍兴十八年陆游24岁时，父亲陆宰去世。在三年守丧期间，他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其实，在秦桧当权期间，即使参加考试，陆游也是难以及第和进入仕途的。

绍兴二十三年陆游29岁时，又逢到科举之年。志在报国的陆游又到临安参加两浙转运司锁厅试。锁厅试只限于现任官及恩荫子弟应进士科的人参加，录取名额较宽。当时，秦桧之孙秦埙以右文殿修撰就试，秦桧希望把第一名给与他的孙子秦埙，主考官陈之茂（字阜卿，无锡人）正直无私，唯才是举，按成绩选优，把陆游擢置第一，秦埙第二。秦桧大怒。绍兴二十四年，陆游参加礼部试，秦桧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还打算追究陈之茂一番，只是由于秦桧不久后死去，陈之茂才幸免于难。

“名动高皇，语触秦桧。”这两句话是陆游56岁时所写《自赞》中的句子，见《渭南文集》卷二二。陆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其答试中必有北伐抗金之语，在秦桧当权的年代里，敢于把这样的考生取为第一是需要胆识的。陆游心中也明白这一点，故在两浙转运司锁厅试后，上感谢主司的《谢解启》（《渭南文集》卷六），文中云：

……恭惟某官……心术正而无邪，文章简而有法。愤雕虫之积弊，疑野草之可收；遂致庸虚，辙先豪俊。自知不称，敢辞同进之争名；所惧流言，窃谓主司之好异。

此文写作之时，秦桧正淫威赫赫，陆游的措词比较含蓄，只是稍稍透露了一些信息，怕有人说陈之茂“好异”。在晚年，他写下一首诗悼念陈之茂，长长的诗题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了：

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推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即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予晚岁料理故书，得先生手贴，追感平昔，作长句以识其事，不知哀涕之集也。

（《剑南诗稿》卷四）

关于陆游绍兴二十四年礼部试落第之事，《宋史》本传有明显的误记，此处不可不辨。《宋史》本传云：“明年（即绍兴二十四年——引者），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这里的“主司复置游前列”之语，恐怕是修史者为追求传记的生动性而创作出来的情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曾详细介绍了绍兴二十四年礼部春试的情况：

三月辛酉，上御射殿，策该正奏名进士。先是，秦桧奏以御史中丞魏师逊、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同知贡举，吏部郎中权太常寺卿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张士襄为参详官。师逊等议以敷文阁待制秦垞为榜首，德元从誉录所取号而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贵矣。”遂定为第一。

榜未揭，虚中遣吏逾墙而白秦。及廷试，桧奏以士襄为初考官，仲熊复考，思退编排，而师逊详定。

虚中又密奏乞许有官人为第一。至是策问。……于是师逊等定垞为首，张孝祥次之，曹冠次之。上读垞策，觉其所用皆桧、语，遂进孝祥为第一，而垞为第三。……时桧之亲党周汇唱名第四，仲熊兄子右迪功郎时中第五，秦棣（秦桧之弟兄——引者）子右承务郎、杨存中子右承事郎并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孙缜，赵密之子承忠郎，秦梓（秦桧之弟兄——引者）之子右承事郎，董德元之子克正，曹泳之兄子纬，桧之姻党登仕郎沈兴杰皆中第。天下为之切齿！

此番礼部之试的舞弊之甚，令人震惊。弥封的试卷竟被违制拆开；有人逾墙报信，这更是空前绝后之举。是年主试人，皆为秦桧党羽，怎么竟会复置陆游为前列呢？

陆游落第之后返回故乡，避居云门草堂读书；而秦垞只是得意了一阵子而已。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载：“绍兴十二年，秦申王当国，其子始冠多士。二十四年，其孙垞复试南省为第一。及廷试，有司拟垞为榜首，上觉之，置之第三。桧薨，淮东提举常平朱冠卿应诏上书，极言其弊，于是追夺垞出身敕。”

顺便提及一事，陆游后来与秦垞有过私人来往。据《入蜀记》卷二，乾道六年七月六日，陆游路经建康时，“见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垞，故相益公桧之孙，延坐画堂，栋宇闳丽，前临大池，池外即御书阁，盖赐第也。家人病创，托何令（即右宣教郎知江宁县何作善——引者）招医刘仲室视脉”。陆游在第二天的记载中，意味深长地录下了秦垞馆客刘炜之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屡典质，生产亦薄。”似乎有幸灾乐祸之意。

《宋史·陆游传》称陆游“年十二，能诗文”。然而，陆游自编的《剑南诗稿》首卷首篇之作是《别曾学士》，这首诗作于绍兴十二年（1142），陆游时年 18 岁。此前之诗作全被删除掉了。人们不禁疑惑——

《剑南诗稿》为什么以《别曾学士》为开篇之作？

陆游所称的“曾学士”，是指南宋著名诗人曾几。曾几，字吉甫，其先赣州人，徙河南府。徽宗时为校书郎。高宗时历官江西、浙西提刑，以反对秦桧议和而被罢官。秦桧死，起为浙东提刑，知台州。官至礼部侍郎、敷文阁待制。卒谥文清。所以，陆游也称呼他为曾文清公。曾几曾隐居江西上饶城北茶山寺，故号茶山居士。

陆游自幼便敬佩曾几。《别曾学士》诗云：“儿时闻公名，谓在千载前。稍长诵公文，杂之韩、杜编。夜辄梦见公，皎若月在天。起坐三叹息，欲见亡繇缘。忽闻高轩过，欢喜忘食眠。袖书拜辕下，此意私自怜。”可见，陆游利用曾几路经山阴之机，投书求见，如愿以偿。这不是一次平常的相见，59岁的曾几从此与年轻的陆游结下了师生之谊。嘉泰二年（1202），陆游作《赠曾温伯、邢德允》诗（见《剑南诗稿》卷五一），诗后注云：“游获从文清公时，距今六十年。”由嘉泰二年上推60年，便是绍兴十二年。

就诗法而言，曾几属于江西诗派。曾几自称学诗于吕本中，“请问句律”（《茶山集·拾遗·东莱先生诗集后序》）。陆游也说曾几“与徐俯、韩驹、吕本中游”（《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而吕本中，徐俯、韩驹都是吕居仁《江西诗社宗派图》上挂有大名的。

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诗祖，标举“夺胎换骨”之法，强调要“无一字无来处”，有些形式主义的意味。陆游既然师从于江西诗派的曾几，很难不受到影响。《剑南诗稿》中古体诗如《和陈鲁山十诗》、《醉中歌》、《寄黄龙升老》，近体诗如《看梅绝句》、《二月二十四日作》、《斋夜观月》、《次韵鲁山新居绝句》、《寄陈鲁山》、《读赵昌甫诗卷》等，明显地是在模仿黄庭坚的诗作。谈及自己师从曾几学诗，陆游自称是“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剑南诗稿》卷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曾几则说陆游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渭南文集》卷一四《吕居仁集序》）。韦居安《梅诗话》卷中录有赵庚夫题曾几诗集之句：

茶山八十二癯仙，千首新诗手自编。

吟到瘴烟因避寇，贵登从橐只栖禅。

新于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

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祖灯传。事实十分明显，陆游学诗的过程中，受到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因此，《剑南诗稿》选编的第一首诗便是《别曾学士》，也即饮水思源的意思。陆游是在茶山先生的教诲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南宋诗坛，成为被赞为“中兴之冠”的诗人。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陆游曾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最终成为江西诗派之流。陆游并没有被江西诗派束缚住手脚，而是广泛地汲取众家长，自成风格。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得较为准确：

游诗法传自曾几，而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

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陈黄之旧格。

陆游将《别曾学士》列为《剑南诗稿》的首编，还有另一原因，即景仰曾几的人品。曾几是抗战派志士。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南侵，此时曾几正住在会稽禹迹寺，陆游也从局罢归山阴，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的言论。当时曾几已年过七十，家族人口众多，不以穷累为忧，只是忧心国事（见《渭南文集》卷三《跋曾文清公奏议稿》）。这给陆游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陆游曾向老师保证说：“名节倘全，是则不辱于门下。”（《渭南文集》卷七《谢曾侍郎启》）另外，在生活上，曾几虽然做官不小，但一生清贫，不置产业。根据宋高宗关于南渡的中原士大夫许古寺院居住的命令，曾几所至常寓居僧舍，萧然不蔽风雨。他住过上饶的茶山寺，会稽的禹迹寺，过着清贫的生活。陆游也是以国事为忧，从不作个人的营生打算，晚年住着破弊的草屋，生活较贫困，他却说：“清贫尚愧茶山在，送老湖边有把茅。”（《剑南诗稿》卷二九《新小园》，自注：“曾文清至歿常寓僧舍。”）曾几给陆游在诗文上的教导和思想作风土的影响，对于陆游后日成为爱国诗人来说，起了重要作用。陆游通过列《别曾学士》为诗稿之首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恩师的纪念。

清代诗人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一有《书剑南诗集后》四绝句，作者从国事、宦事、韵事、婚事四个方面块出了陆游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舒位在论婚事的第四首绝句中写道：

“谁遣鸳鸯化杜鹃？伤心姑恶五禽言！重来欲唱‘钗头凤’，梦雨潇潇沈氏园。”婚姻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于是，人们渴望解开——

陆游“沈园”诗本事之谜

1. 宋代的笔记小说是怎样描述的？

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陆游在山阴娶王氏为妻，其时23岁。

在此之前，陆游在爱情生活中另有一番经历，并由此而写下了《钗头凤》一词。

陆游的《钗头凤》一词，宋人笔记以为是其为感怀前妻唐氏而作，后代文人咏及此事并播之戏曲者，有清人蒋士铨《沈氏园吊放翁》（《忠雅堂诗集》卷十六），有清人桂馥《题园壁》（《后四声猿》）和近人姚锡钧《沈园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下附录）以及吴梅《陆务观寄怨 钗头凤》（《霜崖三剧·惆怅》）。今人又据此衍变为地方戏曲、电视剧及电影脚本，搬上舞台，昭之屏幕。几百年来，词以事传，事因词显，沈园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而《钗头凤》亦颇受一些选家垂爱。围绕着《钗头凤》词及沈园诗所流传的陆游爱情生活轶事，已成为家喻户晓、凄楚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其影响所及是前贤们所始料未及的。如果撇开传说究其本事情节的由来，盖始于宋人三家笔记，即陈鹄的《耆旧续闻》、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续集》以及周密的《齐东野语》。

三人之中，陈鹄的生活年代与陆游最为接近。他在《耆旧续闻》卷十写道：

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 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饌，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阙。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

陈鹄自云曾目击《钗头凤》词于沈园，且点明“淳熙间（1174—1189年）其壁犹存”。稍后的刘克庄（1181—1269年）在《后村诗话续集》卷二写道：

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与妇诀。某氏改事某官，与陆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园，坐间目成而已。翁得年甚高，晚有二绝云：

“肠断城头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旧读比诗，不解其意，后见曾温伯言其说。温伯名黯，茶山孙，受学于放翁。

刘克庄在这里也提及陆游早年婚变，但只录《沈园》二绝句，只字未提

《钗头凤》一事，陆游与唐氏沈园之会，仅是“坐间目成”而已。

到宋末元初，周密在《齐东野语》中，对沈园相会之事，记叙详备具体，几乎似于小说家铺叙笔法。《齐东野语》卷一《放翁钟情前室》条写道：

陆务观初娶唐氏，闾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实绍兴乙亥（1155）岁也。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盖庆元己未（1199）岁也。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1192）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开禧乙丑（1205）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

三家笔记相比，《齐东野语》的记载最为详尽，影响也最大，一般的选本，大都采用周密的说法。

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人反倒比宋人更清楚“沈园”诗本事的一些细节。例如，清代的《御选历代诗余》卷一八引夸娥斋主人说有唐氏答词。其全文如下：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瞞！瞞！瞞！

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引《香东漫笔》竟点明：“放翁出妻姓唐名琬。”

由于宋代笔记的记载互有差异，清代已有人对“沈园”诗本事提出质疑。吴騫在《拜经楼诗话》卷三中说：

陆放翁前室改适赵某事，载《后村诗话》及《齐东野语》，殆好事者因其诗词而傅会之。《野语》所叙岁月，先后尤多参错。且玩诗词中语意，陆或别有所属，未必曾为伉俪者。正如“玉阶蟋蟀闹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载《剑南集》，而《随隐漫录》剪去前四句，以为驿卒女题壁，放翁见之，遂纳为妾云云，皆不足信。

吴衡照也有类似看法。他在《莲子居词话》中说：

吾乡许蒿庐先生昂霄，尝疑放翁室唐氏改适赵某事，为出于傅会，说见《带经堂诗话》校勘类附识。《拜经楼诗话》亦以《齐东野语》所叙岁月先

后参错，不足信，与蒿庐说合。则当时仲卿新妇之厄，翁子故妻之情，殆好事者从而为之辞。与唐氏答词，语极浅俚……。

一石激起千层浪，今人围绕“沈园”诗本事问题展开了种种争论。

2. 《钗头凤》是不是狎游之作？

《钗头凤》一开头的“红酥手”三句，很有味道。彭乘《墨客挥犀》卷六云：“陕西凤州伎女，虽不尽娇丽，然手皆纤白。州境内所生柳，翠色尤可爱，与他处不同。又公库多美酿，故世言凤州有三出，谓手、柳、酒也。”这种惊人的相合，很容易使人将《钗头凤》与青楼韵事联系起来，人们不禁要问：——《钗头凤》是不是狎游之作？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说：

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

正是因为陆游是个例外，他的爱情诗受到格外的眷顾，《钗头凤》也因此而走红。故此，人们虽明知《齐东野语》的记叙颇有小说意味，但还是乐于据之立说。如，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于北山《陆游年谱》、欧小牧《陆游年谱》、胡云翼《宋词选》、游国恩、李易合注《陆游诗选》、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等，都是如此。

但是，也有相反的意见。周本淳先生在《陆游 钗头凤 主题辨疑》（载《江海学刊》1985年第六期）一文中，对周密语与刘克庄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以下几点不同：

（1）陆游和前妇：周密说是表亲，刘克庄未说两人本是表亲，而是说和她的后夫是表亲。

（2）离异的原因和过程：刘克庄只说“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表明陆游父母都有责任。周密却说是陆母一意孤行。刘克庄只说两人离散，周密却说：“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

（3）两人相遇的因由：周密说是春游偶然碰着，某氏倒向后夫介绍，招待陆游。刘克庄说两位男方是表兄弟，在沈园因为亲戚交往，偶然见面。

（4）周密说见面后写了《钗头凤》，刘克庄却只提晚年的《沈园》二首，压根儿未提《钗头凤》事。

周本淳先生依据当时的礼俗，认为刘说可信而周说有难通之处。他说：

古代妇女被丈夫遣离，照例应送回娘家，如乐府《孔雀东南飞》所写。照周密描述的那种过程，只有对妓女出身之妾，才可能藏之别馆。如果是这样身份的人也难以再婚士族，何况是嫁给宋的宗室赵士程呢？另外男女大

防，某氏居然可以向新夫介绍前夫，并且以酒馔招待。这种男女交往的解放程度，恐怕只有在近代西方社会才有可能。而刘克庄的叙述却是合情合理的。某氏后夫和陆游是表兄弟，亲戚通家宴会相遇，只能“目成而已”，连句话也不好说，所以，周密的叙述，恐怕真是“齐东野人之语”，不足为据。

接下去，周本淳先生推断：陆游和前妻某氏的爱情、婚姻际遇，只是在《沈园》（二首）中得到反映，跟这首《钗头凤》词根本无涉！而根据“凤州三出”（手、柳、酒）的记载，《钗头凤》当是“对于当年狎游之事的回忆，虽然未能忘情，但已能有所克制。上片云三个‘错’字，大有唐人‘谁遣同衾又分手，不如行路本无情’（长孙佐辅）的意味，觉得不该相识，分明有忏悔之意。”

在周本淳先生之前，吴熊和先生也曾对《钗头凤》提出了质疑。吴熊和先生在《陆游 钗头凤 词本事质疑》（载浙江人民出版社《文学欣赏与评论》1982年版）一文中指出：陆游词中出现手、酒、柳，不是偶然的巧合，陆游自南郑至大散关，曾经过凤州，不会不知道“凤州三出”这一俗谚。再者，如果视《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词中“宫墙”一词就难以着落。沈园在会稽城南禹迹寺旁，视野所及，无宫墙。虽然绍兴原为越国都城，宋高宗也一度升绍兴府为驻蹕之地，但城中根本没有旧宫或宋时所建行宫。吴熊和先生认为，《钗头凤》是陆游在成都时所作，词中提到的“宫墙”，当指陆游在成都时经常宴游的故蜀燕王宫。陆游诗作中有不少纪游燕王宫的诗，诗中提到燕宫多“高柳”，与《钗头凤》中“宫墙柳”一语恰能吻合。陆游在成都，一方面满怀抱国之志，另一方面也不免流连风月，因此，写下这首柔情未已之词也是完全可能的。吴熊和先生还指出，词中“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样的句子安在唐氏事上，也属不伦。唐氏此时已改嫁，个中情愫，陆游岂能明书于词而且题之于壁？这会使唐氏处于难堪的境地，爱护唐氏而礼教观念甚深的陆游是不会不顾及其生活的环境。另外，吴熊和先生还点示，陆游的沈园怀人诗总是和梅花联系在一起，从怀人诗描写的时景看，陆唐沈园相逢时在初春，与《钗头凤》描述的暮春时景并不相合。

平心而论，周、吴二人之论。虽有洞察宋人笔记互相冲突、值得怀疑之明，却也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之偏。我倾向于认为《钗头凤》与“沈园”诗本事相关，理由如下。

（1）关于“宫墙”问题。吴熊和先生认为，沈园在会稽城南禹迹寺旁，视野所及，并无宫墙。其实，绍兴本有宋行宫。《越中杂识·古迹》：“宋行宫：高宗建炎中，驻蹕于越，即州治为行宫。后返临安，命仍为州治。”再者，宫墙即可指皇宫之墙，也可指普通围墙。《说文解字》：“宫，室也。”段玉裁注：“按，宫言其外之围绕。”《管子·八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这里的“宫墙”，指的正是普通房屋围墙。《钗头凤》中所谓“宫墙柳”，即指沈园之园中柳。陆游在《沈园》绝句中有“沈园柳老不吹绵”之句，可见，当年沈园中有不少柳树。

(2) 关于题词于壁的问题。陆游素有将诗词题于壁上的习惯，翻检《剑南诗稿》，诗题直接点明为题壁或题亭堂舍庵之作有近百首，诗题虽未点明而实际是题之于壁者更为众多。山阴一带之名胜古迹，陆游几乎都留下题诗。由此可推断，陆游题诗沈园，并非不可能之事。更重要的是，陆游本人之诗作为此提供了证明。

《剑南诗稿》卷二五有诗云：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龕一炷香。诗前序言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阁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阁于石，读之怅然。”（说明：诗文及序言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剑南诗稿》卷六五有《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二首，其第二首云：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说明：诗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剑南诗稿》卷六八有《城南》诗。诗云：

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
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

（说明：诗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以上诗文，均将前妻与“墨”（题词）联系起来，可为《钗头凤》与“沈园”本事相关之证。由此看来，与陆游年代相近的陈鹤之语是可信的。陆游的“坏壁醉题尘漠漠”写于绍熙三年（1192），而“尘渍苔侵数行墨”写于开禧二年（1206），陈鹤白云曾目击《钗头凤》词于沈园，且点明“淳熙间（1174—1139）其壁犹存”，当属可信。从一般的情理上讲，陆游为前妻题词于壁上，委实有些出格，但考虑到此举为“醉题”，也就无须大惊小怪了。

(3) 关于创作地点的问题。吴熊和先生认为《钗头凤》是陆游在成都之作，因而与“沈园”本事无关。这恐怕与陆游当时的思想状况很不相符。乾道八年（1172），陆游应王炎之召，自夔府去南郑（见《渭南文集》卷一四《送范西叔序》），这一年秋天，他曾自南郑经凤州而至大散关。但在这一时期，正是陆游认为报国有路的最得意时期，他几乎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北伐的准备之中。《剑南诗稿》卷三《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写于去大散关之前，其一云：

梁州四月晚莺啼，共忆扁舟罨画溪。
莫作世间儿女态，明年万里驻安西。

（说明：诗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可见，陆游此时意气风发，无暇迷恋风情。退一步讲，即使偶尔逢场作

戏，也断不会留下如此哀怨的儿女私情。再者，陆游晚年有不少诗词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如《剑南诗稿》卷一七有《独酌有怀南郑》，诗云：

忆从 家涉南郑，笳鼓声酣醉胆粗。
投笔书生古来有，从军乐事世间无。
秋风逐虎花叱拨，夜雪射熊金仆姑。
白首功名元未晚，笑人四十叹头颅。

《剑南诗稿》卷——有《二忆山南》，诗云：

貂裘宝马梁州日，盘槊横戈一世雄。
怒虎吼山争雪刃，惊鸿出塞避雕弓。
朝陪策画清油里，暮醉笙歌锦幄中。
老去据鞍犹矍铄，君王何日伐辽东？

《渭南文集》卷五 有《谢池春》三首，其一云：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乡误。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从这些引证中可以看出，南郑时期生活给陆游留下的主要是战马控惚的回忆，这一时期的陆游，不具备写出《钗头凤》的生活基础。

（4）关于手、酒、柳的问题。联系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钗头凤》中的手、酒、柳与“凤州三出”之俗谚，当是巧合。

先说手。吴熊和先生认为：“这种艳笔（指“红酥手”——引者），不可能指望封建时代的陆游用于一向爱慕敬重的妻子身上。”其实，这并不一定。古人写美女，往往写其手。如《古诗十九首》有“纤纤出素手”；苏轼《贺新郎》有“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杜甫在《月夜》一诗中念及妻子时曾写出“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之句。杜甫是不是比陆游更“香艳”呢？

再说酒。词中点此所斟之酒为“黄酒”。《剑南诗稿》卷一八有《病中偶得名酒，小醉作此篇，是夕极寒》，诗云：“一壶花露拆黄 ，醉梦酣酣唤不应。”此诗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其时陆游知严州（今浙江建德、淳安、桐庐一带）。由此可知，黄酒应为江浙名酒，绝非凤州所出。南宋时期，绍兴是江南一带最著名的产酒之乡，写于绍兴的《钗头凤》提及“酒”是很自然的。

最后说柳。我们前面曾讲过，“官墙柳”就是沈园之园中柳。陆游《沈园》绝句中提到“沈园柳老不吹绵”，可见，当年之沈园确有不少柳树。但陆游此处写到，似一语双关。自《诗经》“杨柳依依”之句起，古人即以柳寓分别之情，后来又发展为爱情生活不幸之女子以柳自比。著名的敦煌曲子词《望江南》云：“莫扳我，扳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这）人折去那人扳，恩爱一时间。”还有一点应引起人们注意，陆游《钗头凤》虽取调于唐五代无名氏《撷芳词》，但词意却与《撷芳词》无关，而与唐人韩翃

《章台柳》与柳氏《杨柳枝》二词在内容上相当接近。韩有姬柳氏，为番将沙吒利所得，韩作《章台柳》。其词云：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以《杨柳枝》作答。其词云：

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

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一般人只认为陆游的《钗头凤》词调源于唐五代无名氏的《撷芳词》，而忽略了韩翃、柳氏二词对《钗头凤》这首词构思立意的影响，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陆游自幼饱学，对前人的诗歌作品（当然也包括词）很熟悉。他词中写柳，正是隐有“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之深意，为什么一定要与成都燕王宫的“高柳”发生联系呢？

总之，《钗头凤》并不是押游之作，而是陆游哀伤前妻之作。我们在这里不妨再电说几句。我们知道，沈园在禹迹寺之南，在陆游时禹迹寺的题咏也昭示其确有沈园题壁之举。《剑南诗稿》卷七有《禹祠》，诗云：

祠宇嵯峨接宝坊，扁舟又系画桥旁。

鼓添满箸莼丝紫，蜜渍堆盘粉饵香。

团扇卖时春渐晚，夹衣换后日初长。

故人零落今何在？空吊颓垣墨数行！

这首诗作于开禧三年（1207），其时陆游82岁，居山阴家中。同卷又有《禹寺》，诗云：

禹寺荒残钟鼓在，我来又见物华新。

绍兴年上曾题壁，观者多疑是古人。

这首诗作于嘉定元年（1208），其时陆游84岁，居山阴家中。以上二诗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读者可以此知晓《钗头凤》确为沈园题壁词。

3. 陆母与陆妻是不是姑侄关系？

陈鹄、刘克庄在记录陆游与前妻这段悲欢离合时，仅称陆妻为某氏，姓名均未提及。至周密的《齐东野语》才第一次明言陆妻姓唐，是“闾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由此，“姑侄”说一直沿延了几百年。

建国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也都沿用周密的说法。朱东润《陆游传》说：

大约在陆游二十岁的左右，他和唐婉结婚了。陆游的母亲是唐介的孙女。唐介在熙宁元年（1068），官至参知政事，第二年王安石起用，唐介和王安石主张不同，不久也就死了。唐介两子，淑问、义问。……从陆游看，唐婉是舅舅的女儿，母亲的侄女，一切应满意的了。……

郭光在《陆游传》中说：

“陆游在二十二岁的那年，发生了惨痛的婚变。陆游的妻子唐婉，和陆游的母亲是姑侄，他小俩口结婚是亲上加亲，婚后生活美满，夫妻感情很好。……

类似之论还有许多，此处不一一例举。

然而，还是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这类文章有严迪昌《陆游沈园诗本事考辩》（载《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施光明《唐婉非陆游表妹考》（载《杭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李光超《陆游 钗头凤 若干问题质疑》（载《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现将其主要论证介绍如下：

首先，据张 《宝庆会稽续志》卷七可知，做过郑州通判的唐闳是连守楚、泗、台三州、仕至鸿胪少卿的唐翊之子，是山阴人。而陆游的母亲则是江陵唐介之孙女，唐介是陆游的曾外祖父。《渭南文集》卷二六有《跋唐修撰手简》，其中有“某之曾外大父质肃唐公”之句，质肃即唐介的谥号。陆游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可信的。宋人王 《华阳集》卷三七有《唐质肃公介墓志铭》，文中说，“（唐介）其先晋昌人，唐末避乱于余杭，自其祖始徙于江陵，今为江陵人。”如此，则陆母唐夫人的祖籍当然是江陵。江陵唐氏与山阴唐氏籍贯各异，陆母唐夫人与陆妻唐氏虽然同姓，却不同宗，当然不会是姑侄关系了。在这一点上，张 《宝庆会稽续志》是正确的。张 是与陆游年岁相接的山阴本乡人，《宝庆会稽续志》修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15），相距陆游卒年仅15年，所记绝不致于混淆。

其次，据王 《唐质肃公介墓志铭》，唐介有孙男六人：懋、愿、怒、意、愚、 ，取名皆从“心”字，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曾载舅氏唐意事迹。如此说来，陆游的舅父辈中并无唐闳其人，陆母唐氏也没有这么一个亲兄弟，因此，便谈不上姑侄女作儿媳之事了。

那么，周密为何认为唐婉是陆游的表妹呢？曾永祥在《陆游 钗头凤 本事新证》（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4期）中认为，这是周密误读刘克庄文字所致。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写道：“放翁少时，二亲督责甚严。初娶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情于学，数遣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某氏改事某官，与陆氏有中外。”其实，这段文字写得很晓畅，本来是没有疑问的。但后人认定了陆妻某氏是陆游的表妹，因此将“某氏改事某官，与陆氏有中外”这句话穿凿作解，错误地认为“某氏”与“陆氏有中外”。实际上，这句话不过是用了一个古文中惯常使用的承前省略句式，省略了“某官”这个主语。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某氏必事某官，（某官）与陆氏有中外。”陆妻唐氏被遣后改嫁宗室子弟赵士诚，这个人与陆游的确是有一点宗亲关系的。《渭南文集》卷三一有《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该跋云：“某年十二三时，尝侍先夫人得谒见大主。”此言大主，即秦鲁国大长公主，她是仁宗第十女，嫁吴越王的后代钱景臻，景臻之子钱忱娶唐介孙女唐氏为妻。据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载：

钱忱伯诚妻瀛国夫人唐氏，正（质）肃公介之孙，既归钱氏，随其姑长公主入谢钦圣，向后于禁中。时绍兴初也。先有戚里妇数人在焉，俱从后步过受 殿。同行者皆仰视，读 为离，夫人笑于旁，曰：“受禧也，盖取宣

宝受 之义耳。”后喜，回顾之曰：“好人家男女终是别。”盖后亦以自谓也。王明清在此条后注“陆子逸云”四字。子逸名淞，号云溪，有文名。《耆旧续闻》云：“陆辰州子逸，左承佃之孙。”根据《挥麈后录》的这一条记载，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便是陆母唐夫人的姊妹，而据《宋史》，赵士诚系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亦即钱忱的表侄。可以看出，陆家与赵姓宗室确有姻娅瓜葛。

不过，仍有人坚持姑侄说。扬宝林先生在《陆游和唐婉非姑表亲吗》（载《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中，以《山阴陆氏族谱》为证，支持周密之说。《山阴陆氏族谱》载有“（陆游）娶妻，于其母夫人为姑侄”字样。杨文以为该《族谱》是陆氏家谱，兼有陆游等人作的序，是可信的。但扬文所据《族谱》乃清世德堂刻本，付梓年代距宋久远，族谱一般历代相传，几经修订，《族谱》所记陆游婚变，未必当时所载，或许便是据《齐东野语》补人。

其实，《山阴陆氏族谱》中，不实之处多有所见。现仅举一例。《族谱》载陆子坦（陆游子）卒于嘉定丁亥年，年七十二。考嘉定无丁亥年。1957年，绍兴平水水电站兴建时，挖得《陆子坦夫妇扩记》各一方，《扩记》记子坦卒于嘉定辛巳十四年（1221）。由此可知《族谱》的误书。

于北山先生在《陆游年谱》（修订本）中，对“姑侄”问题进行了考证。他说：

周密《齐东野语》谓陆游妻系唐闾之女，“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以姑侄骨肉之亲，非逐之门外、迫其他离不可，违情悖理，殊属可疑。经反复探索，始知“姑侄”之说不确，应作“族姑侄”方符实际。（一）绍兴府城中，原有唐姓，为邑中士族。北宋有唐翊者，以进士起家，宣和中官鸿胪少卿。长子闾（即周密所称游妻之父），官郑州通判。绍兴八年，官江东运判。其弟闾、闾，均南波早斯进士。闾于绍兴初官松阳令，赵鼎帅浙东时曾加荐举。闾官起居舍人，此职与给、舍均号称“士林荣选”。似此缙绅门第，与陆氏论婚，不为不称（以上据《嘉泰会稽志》、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宋绍兴府进士题名碑》）。（二）游母为唐介女孙。北宋王《唐质肃公墓志铭》：“公讳介，字子方，其先晋昌人。唐末避乱于余杭。自其祖（渭）始徙家江陵。”（《华阳集》卷三十七）据此，知唐介先世确曾居浙，但自唐渭、拱、介至女孙陆母，已至第五代，即使与唐翊同支，亦属疏族，与游妻并无直接骨肉关系。（三）刘克庄《唐内翰谏院》：“唐氏人物最盛，彦猷（北宋唐询之子——编者）居钱塘，质肃居荆南，然皆通谱。”（《后村大会集》卷一四）即云通谱，自非亲姑侄，古代士大夫，门第相埒者，率有通谱联宗之风，故愚以为应作“族姑侄”。

于北山先生的考证，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周密“姑侄”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4. 为何鸳鸯化杜鹃？

关于陆游与前妻分离的原因，宋人笔记有简要交待。陈鹄说：“不当母夫人意，出之。”刘克庄说：“二亲督教甚严，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周密说：陆妻“弗获于其姑”。三家笔记的文字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陆游休弃前妻是极不情愿的，是迫于某一方面的压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二人劳燕分飞？许多人仍从陈鹄、周密之说，归咎于陆母的乖戾。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赵齐平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纲要》，均从此说。至于陆母为何要棒打鸳鸯、陆妻因何不获其姑，则又有各种解释之词。有人据《剑南诗稿》中《恶姑》诗“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命来怨言”之句，认为陆母抱孙心切，而陆妻竟不能生子。

以上所云，实在可疑。

我们知道，陆母是北宋名臣唐介的孙女，既出身于名门大族，该不至于乖张刁悍如此之甚。况且，这等家门不幸的“人伦之变”（周密语），张扬出去，就是对陆母来说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者，陆游的父亲陆宰为人刚正，即便陆母性情乖戾，陆宰也不至于惧于“内命”而听之任之。

求孙之说也不可信。陆游是陆宰第三子，长兄陆淞比他大16岁，仲兄陆比他大12岁，仲兄有子陆绛，卒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其时陆游75岁。《剑南诗稿》卷四一有《大侄挽辞》，辞云：“束发已青袍，终身州县劳。”《渭南文集》卷四一《祭大侄文》，文云：“汝实先少傅之长孙，岳州使君之嫡子。早到仕籍，垂五十年。”可见，这位死在岭南博白县任上的侄儿与陆游年纪相仿。陆母完全不必为陆家无后而担忧，当然也就不会因不生育而将儿媳赶出家门。再说，陆游与这位爱妻才共同生活了二三年。

相比较而言，刘克庄的说法较为可信。这件悲剧事情的原因，在于“二亲教督甚严”，“二亲恐其惰于学也”。刘克庄的记闻得之于曾黯（黯）。曾黯是陆游老师曾几的曾孙，也是陆游的学生，与陆游晚年多有交接。《渭南文集》卷一五有《曾温伯字序》，文云：“温伯请于予曰：‘愿有以补之，以终大父之意。’予慨然叹曰：‘自大卿至温伯，三世传嫡，德亦克肖，其有以承此训矣。序其敢辞。’”《渭南文集》卷三十有《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文云：“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后四十七年，先生曾孙黯以当日疏稿示某。于今某年过八十，仕忝近列，又方王师付伐残虏时，乃不能以尘露求补山海，真先生之罪人也。”这些文字均可证明曾黯与陆游的关系。而据南宋末年韦居安《梅诗话》：“绍兴末，曾茶山卜居于越，得禹迹寺东偏舍十许间居之。”而沈园正禹迹寺南。可见，曾黯不仅与陆游有师从之缘，而且住地亦近沈园。曾氏必然有第一手材料，他不至于玩弄小说家笔法以虚构情节、侮慢师辈。刘克庄虽未曾亲耳聆听放翁教诲，但他却视陆游为“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六《题放翁像二首》之一），也不至于在笔记中乱用笔墨。

细读陆游的一些怀旧诗文，我们可以得知其前妻一定是位才貌俱佳、风华秀丽的女子。《剑南诗稿》卷十九有陆游 63 岁所作《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缝菊枕囊，凄然有感》绝句，诗云：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幽香。
唤回四十二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这两首痴情缠绵的绝句，说明当年为人们所艳称的菊枕诗正是闺房唱吟的佳作。《剑南诗稿》卷五有《同何元立赏荷花怀镜湖旧游》，诗云：

少年欺酒气吐虹，一笑未了千觞空。
凉堂下帘人似玉，月色冷冷透湘竹。
三更画船穿藕花，花为四壁船为家。
不须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无酒。
花深不见画船行，天风空吹白声。
双桨归来弄湖水，往往湖边人已起。
即今憔悴不堪论，赖有何郎共此尊。
红绿疏疏君勿叹，汉嘉去岁无荷看。

这首七古作于淳熙元年夏，陆游当时在蜀州。从“凉堂下帘人似玉”来看，当是陆游追忆婚后生活之作。新婚后的陆游，年少贪酒，嬉笑玩耍，游河赏荷，好不春风得意，正沉溺于幸福之中。他如此地整日弄水吃酒，恐怕只能遭致二亲的严责吧？祸种似已种下。《剑南诗稿》卷十七有《悲秋》一首，诗云：

小雨帘栊惨淡天，醉中偏籍乱书眠。
梦回有恨无人会，枕伴橙香似昔年。

显然，这种夜半袭来的思绪，也是对当年闺中情爱的追恋。《剑南诗稿》卷三三有一首记梦诗，其题为：“《十月二十八日夜鸡初鸣时，梦与数女仙遇，其一作诗示予，颇哀怨，加人间语，惟末句稍异。予戏之曰：‘若无此句，不可为神仙矣。’其一从旁戒曰：‘汝当勿忘此规。’作诗者甚有愧色，予颇悔之。即觉，赋两绝句以解嘲”。其诗云：

玉珠眉黛翠连娟，弄翰闲题小碧笺。
人世愁多无着处，故应分与蕊宫仙。
虹作飞桥蜃吐楼，群仙来赋海山秋。

玉珠定自多才思，更与人间替说愁。显然，陆游在这里是借梦境来倾诉对多才多艺，情韵不凡之前妻的缅怀。宋人笔记言陆游与前“琴瑟甚和”、“伉俪相得”，殆非虚语。

这样一种情感生活气氛，对陆游的“功业”难免要产生一些影响。陆游说自己当年“菊枕诗”颇传于人，正反映了其对儿女之情的眷恋。这种倾向与父辈对他的要求正好发生冲突。

我们前面讲过，陆游的父亲陆宰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官吏，徽宗政和年间做过淮西常平使者，宣和末年，为朝请郎宜秘阁权发遣淮南路什度转运副使公事、京西路转运副使、赠少师（亦作少傅）、会稽公。南渡后，高宗建炎四年，奉祠杭州洞霄宫，在山阴居住。以后受到秦桧的排挤，不复出仕。陆宰与当时的爱国士大夫来往较多，以国仇为念，不忘抗金，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这给陆游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渭南文集》卷三有《跋周侍郎奏稿》（陆游83岁时所作），文中回忆其幼年时的见闻：

一时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

《渭南文集》卷三一《跋傅给事贴》（陆游85岁时所作）中也说道：

绍兴初，余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请盟。会秦丞相桧用事，掠以为功，变恢复为和戎，非复诸公初意矣。

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陆宰对陆游寄予的报国厚望。陆游自幼聪颖，才华过人，父亲的期待值也更高。

这种期待，使陆游生活在矛盾状态之中。《剑南诗稿》卷四四有《读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诗次其韵》，诗云：

吾幼从父师，所患经不明。
何尝效侯喜，欲取能诗声？
亦岂刘随州，五字矜长城？
秋风知繁夜，掉头费经营。
区区宇宙间，舍重取所轻。
此身尚未死，仁义尚力行。

陆游虽自幼长于诗歌，但家长是不允许他舍经义而取诗歌的，陆游被期待在仕途上有所进取，而不是成为诗人。因此，陆宰夫妇对于“菊枕诗”这类的琴瑟之好是不会容忍的，他们从陆游的前途着想（当然也包括期待儿子匡时济世的愿望），不容许儿子沉迷在闺房的温馨之中，于是，他们出面横加干涉，陆游只能压服于“尊者意”，与爱妻分手了。

在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之中，陆游最终退让了。其中原因，固然有传统的“孝”道作祟，有报国抗金的感召，也有光宗耀祖的内在渴求。而这最后一点，恰恰是被所有的论者所忽略的。

我们前面曾提及，山阴陆氏是一个显赫的家族。陆游对此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剑南诗稿》卷六八有《闲游》诗，说及自陆轶以来的诗书世家：

大冠长剑已焉哉，短褐秃巾归去来。
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
麦经小雨家家下，菊著新霜处处开。
自笑闲游心未歇，青鞋蹋碎白云堆。

（说明：诗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剑南诗稿》卷四四有《读经示儿子》，说及陆家的经学成就：

通经本古训，讲字极形声。

未尺寸心苦，已销双鬓青。

惧如临战阵，敬若在朝廷。

此是吾家事，儿曹要细听。

《剑南诗稿》卷一九有《喜小儿病愈》，说及陆家的诗学传统：

喜见吾家玉雪儿，今朝竹马绕廊嬉。

也知笠泽家风在，十岁能吟《病起诗》。

淳熙十四年（1187）冬，陆游幼子子聿作《病起诗》，陆游极为得意而写此诗，所谓“笠泽家风”即指晚唐人陆龟蒙的家风。《剑南诗稿》卷四九有《七侄岁暮同诸孙来过，偶得长句》，说及陆家的生活：

雨垫林宗一角巾，萧条村路并烟津。

四朝遇主终身困，八世为儒举族贫。

行摘残蔬循废圃，卧闻饥雀噪空。

封胡羯末皆佳甚，剩喜团栾一笑新。

这种引以为荣的家世传统，使陆游有一种出自“名门”的优越感，他甚至希望他的家乡三山村，“定知千载后，犹以陆名村。”（《剑南诗稿》卷九五《题斋壁》）

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在与父母亲的对抗中，出自“高门”的优越感成为陆游的一种负担，对个人功名的考虑（只有仕途鹏程才不辱没家世），是其出妻的原因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贤者而有所避讳。

与前妻分手之后，陆游不久即与王氏结婚。庆元三年（1197），王氏夫人病故，75岁的陆游写了一首《自伤》诗（见《剑南诗稿》卷三六），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白发老嫠哭空堂，不独悼死亦自伤。这是对白发老妻的悼念。而此类诗作，以后再也没有了。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定陆游与王氏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陆游再娶之后，心情相当的复杂。《剑南诗稿》卷一七有《别梅》诗，诗云：

竹篱数掩傍鱼矶，万点梅花掠地飞。

正喜巡檐来索笑，已悲临水送将归。

影横月处愁空绝，子满枝时事更非。

自古情钟在吾辈，尊前莫怪泪沾衣。此诗写于淳熙十一年（1184），陆游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仔细玩味此诗，可以窥见陆游复杂心情之一斑，“子满枝时事更非”一句尤为醒目。

与对王氏的冷淡相反，陆游在垂暮之年对前妻的怀念之情溢于诗文。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垂暮之年的陆游，深感功（抗金报国）既不成，名（仕途进取）又不就，而个人为此付出的是不是太多了？退老山林，徘徊沈园，他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是最宝贵的。万般无奈，长歌当哭，他只好以一首首的诗作来抒发自己的哀思了。

前面讲过，由于家长的压力，陆游被迫休掉前妻。为此，陆游事后是不是对双亲大人有些不满呢？从今存陆游之诗文来看，陆游是心怀怒气的。不过，这种怨气主要指向母亲。《剑南诗稿》卷四四有《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其诗云：

女生藏深闺，未省窥墙藩。
上车移所天，父母为它门。
妾身虽甚愚，亦知君姑尊。
下床头鸡鸣，梳暑著襦裙。
堂上奉洒扫，厨中具盘飧。
青青摘葵苋，恨不美熊蹯。
姑色少不怡，衣袂湿泪痕。
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
此志竟蹉跎，薄命来谗言。
放弃不敢怨，所悲孤大恩。
古路傍陂泽，微雨鬼火昏。
君听姑恶声，无乃谴妇魂。

姑恶是一鸟名。据苏轼《五禽言》诗自注，民间传说，这种鸟是被姑虐待致死的妇女变的，因而它发出像“姑恶”般的叫声。陆游在诗中描写了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一个因为没有生男孩子而被离弃的少妇的不幸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前面曾提及，有人据此诗误认为陆游前妻被休，是因为陆游之母嫌其无子。这未免有些过于拘泥，但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认为这首诗是“有感于当前政治上之失意而作”（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三册1161页）。由于陆游诗作中多有题写“姑恶”之笔，前后联系起来考虑，我们无法排除陆游此处借题发挥，抒写对母亲不满之可能。

例如，《剑南诗稿》卷三九有《夜闻姑恶》，诗云：

湖桥东西斜月明，高城漏鼓传三更。
钓船夜过掠沙际，蒲苇萧萧姑恶声。
湖桥南北烟雨昏，两岸人家早闭门。
不知姑恶何所恨，时时一声能断魂。
天地大矣汝至微，沧波本自无危机。

秋菰有米亦可饱，哀哀如此将安归。这首诗作于庆元五年（1199），陆游时年75岁。《剑南诗稿》卷四有《夜雨》，诗云：

飞萤方得意，熠熠相追逐；
姑恶独何怨，菰丛声若哭。
吾歌亦已悲，老死终碌碌。

这首诗也作于庆元五年。《剑南诗稿》卷六六还有一首《夜闻姑恶》，诗云：

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浅未忘情。

孤愁忽起不可耐，风雨溪头姑恶声。

这首诗作于开禧二年（1206），陆游时年82岁。最后这首《夜闻姑恶》值得我们回味，所谓“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浅未忘情”，即是说，既然以经邦治国为己任，就自当舍去儿女之情，可惜自己当年做不到这一点。后两句写自己年已古稀，功不成，名不就，夜不能寐，忽觉当年之付出似不值得，而母亲当时的不近情理，委实也当责咎。诗中的“姑恶”，一语双关，意味深久。陆游晚年诗中常常提及“姑恶”鸟，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

5. 沈园之会是哪一年的事？

周密《齐东野语》记沈园之会在绍兴乙亥岁春（1155）。清人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遵从此说，今人亦多如此。如，于北山《陆游年谱》、欧小牧《陆游年谱》。

然而，陈鹄《耆旧续闻》却记沈园之会在绍兴辛未年（1151）。郭光先生的《陆游传》采用这一说法。郭光先生写道：

山阴人有游春的风俗。特别是在三月初五，相传是禹的生日，这天去会稽县东南五十二里禹庙游玩的人最多，不论贫富，倾城俱出，携带酒食，来禹庙游赏，成为节日。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三月，陆游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就在禹生日这天，他也来游禹庙，并到附近的沈家园去游玩。这里池台极盛，游玩中偶尔和唐琬、赵士程相遇……。

两种说法，相差四年。那么，沈园之会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呢？

两相比较，陈鹄的说法是可信的。首先，陈鹄的主活年代与陆游晚年相衔接，而且，他的记载乃是其亲眼所见（即“笔势飘逸”之《钗头凤》），较为可信。他又记道：“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而陆游绍熙三年（1191）曾写道：“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曾题小阁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阁于石，读之怅然。”二者正相吻合。淳熙共十六年（1174—1189），距绍熙三年仅隔数年，陈鹄之语较为可信。而《齐东野语》之记载，在年月顺序上较为混乱。吴騫《拜经楼诗话》卷三即云：“《野语》所叙岁月，先后尤多参错”，实不可信。其次，陆游诗题明云“四十年前曾题小阁壁间”，绍熙三年上推40年，是绍兴二十二年（1152），岁在壬申，前一年即辛未（1151），与陈鹄所记正合。况且，陆游在诗题中也不受什么限制，没有举其成数之必要，大可依实写来。

通过以上分析，沈园之会当于绍兴二十一年，陆游其时27岁。

6. 关于《钗头凤》若干词语的注释

《钗头凤》全词共60字，造语浅显，看似没有什么佶屈难解之处，然而，由于诸家见仁见知，会心不一，所以在若干词语的诠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前面已涉及“宫墙”、“东风恶”之类，此处，我们主要谈对煞尾处“莫莫莫”的解释。

疾风《陆放翁诗词选》认为：“莫、莫、莫”三字叠用，是“罢了！罢了！即别提啦、算了之意”。而胡云翼《宋词选》则认为，“莫莫莫”表示绝望、无奈的感情，相当于现在的“罢罢罢”，劝彼此莫再为旧情所牵挂。这两种看法大同小异，均将莫视为动词。也有人认为：“莫莫莫”与上片“错错错”乃“莫错”一词的分用（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程千帆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精华》）。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释此句时兼备以上二说，他认为：

“莫”，语助词，“莫、莫、莫”，仿佛现在说“罢，罢，罢”。唐司空图《耐辱居士歌》有“休休休，莫莫莫”句，用法与此相同，且歌中结句云“耐辱莫”。这“莫”字又不大好懂，疑亦“耐辱罢”的意思。又“错莫”本是连绵词，屡见六朝唐人诗中，如鲍照《行路难》“眼花错莫与先异”，杜甫《瘦马行》“失主错莫无晶光”，有寥落、落寞之义。本篇将它拆开，在两片分作结句，似亦含有这种意思。

俞平伯先生之论，仍有不能使人涣然冰解处，戴鸿森先生撰文与之商榷（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陆游（钗头凤）疑义试析》），对“莫错”一词作进一步说明，他认为：

俞先生“错莫”本是连绵词，拆开“在两片分作结句”一说，实已道及问题的症结。唯只泛指鲍照、杜甫句例，情事有间，明而未融。梁范静妻沈氏《晨风行》有云：“风弥叶落永离索，神往形返情错漠。”似可看作陆词造语设词的切近出处。错漠同错莫，也可作，“莫错”，李白《寄远十二首》：“朝共琅 之绮食，夜设鸳鸯之锦衾。恩情婉恋忽为别，使人莫错乱愁心。”二诗皆写恩爱夫妻不得会合之苦情，陆游与之同心相应，笔下有所取资，为极自然事。

汇通合参，所谓“错莫”，乃是俗语叫作“失神”、“走神”的黯然魂销的精神状态，或者说作“神思恍惚”、“精神迷茫”，是较寥落、落寞强烈得多。这一叠韵联绵词，陆词虽分拆以叶韵作结，文义理解上，我们仍该看作“错”即“错莫”，“莫”亦“错莫”。这种极度痛苦的“错莫”情杯，是陆游和唐氏共同的，词中也正是兼绾双方。

戴鸿森先生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联绵词如此分拆用，按常规看来，实属破格，常理常情所不应拆、不能拆的，现在竟硬生生地拆开了，这是为什么？戴鸿森先生怀疑这种手法寓有“棒打鸳鸯”，“刀劈连理”的愤懑。若果然如此，那便是深衷苦情酿出来的巧思了。

山阴早就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这对情人，是未获结婚而生离死别，死后终于化为蝴蝶，在天上飞翔。而陆游与唐氏，则虽以结婚，而未能白头偕老，中道分离，女方郁郁下世，男方长恨绵绵，为我们留下了这首说不清、道不尽的《钗头凤》。

绍兴二十四年（1154）冬，陆游在山阴写下《看梅绝句》五首（见《剑南诗稿》卷一），此后，陆游几乎半年都有咏梅诗，梅花陪伴他走完了漫长的一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词是世人皆知的名作，在《渭南文集》中还有两首寄调《朝中措》的咏梅词。在《剑南诗稿》中，单是以咏梅、探梅、观梅、别梅等等为标题的诗作竟有 150 首左右；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在其他诗作中提及梅花的更是不计其数。“为爱名花抵死狂。”陆游是古代八大爱菊诗人之一，又有“海棠颠”之绰号，其诗词提及的花卉有百种之多，然而——

陆游为什么最爱梅花？

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时代风尚对陆游的影响。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政和中，庐陵太守程祁，学有渊源，尤工诗，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谦叔，学问过人，自号潜叟。郡以遗逸八行荐，力辞。与程唱酬《梅花》绝句，晨转千首，识者已叹其博。近年有同年陈从古，字希颜，裒古今梅花诗八百篇，一一次韵。其自序云：“在汉晋未之或闻，自宋鲍照从下，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诗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乐天四首，元微之、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杜牧之各一首。自余不过一二，如李翰林、韦苏州、孟东野、皮日休诸人，则又寂无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余日积月累，酬和千篇云。”

这段文字说明，在南北朝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般文士们是不太看重梅花的，即使是《离骚》，也吟咏芳草而独不及梅。梅之作为一种名花异木逐渐被人们认识，进而递相赋咏，乃是六朝及唐以后的事情，至宋代才最受诗人们的敬重。人们往往借梅言志，托物寄情，互相酬唱。

上述周氏所说的千余篇梅花诗，我们已无从欣赏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分散于各家别集里的咏梅作品。我们甚至还可以见到宋人所辑录的关于梅花的专集，如，黄大舆《梅苑》十卷，收录了自唐至南北宋之间所有咏梅之词；范大成撰有《梅谱》一卷；张功甫有《梅品》一卷。《梅谱》与《梅品》，或罗列梅花繁多的名目，分叙其枝、色特征；或记述奖护梅林之策。宋伯仁还有《梅花喜神谱》二卷，写梅百图，神态各异。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梅花在宋代文士的眼中、笔前承蒙空前的礼遇。陆游爱以梅花为题当然与此种社会风气相关。

我们还要指出，陆游多以梅花为题，还与其具体的生活环境有关。陆游的《看梅绝句》中有“梅花有情应记得，可怜如今白发生”之句，这说明诗人与梅花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想必青少年时常在家乡寻梅赏梅，故乡的梅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禧元年（1205），81岁的陆游梦中重游沈氏园，还特别写到园中的梅花（“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陆游客居成都时写的梅花诗词最多，而蜀地名花擅古今，成都的梅花更是天下闻名。从合江园的芳华楼、城西的青羊宫到浣花溪，完全是一片梅花的香雪海。梅开时节，盛况空前，合江园甚至“自初开，监官日报府，报至开五分，则府主来宴，游人亦竞集。”（《剑南诗稿》卷十《梅花绝句》之五注语）。陆游的不少诗作反映了当时情形。如，《剑南诗稿》卷二四《梅花绝句》之三云：

锦城梅花海，十里香不断。

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

《剑南诗稿》卷九《看梅归，马上戏作》之五云：

江郊车马满斜晖，争趁城南未阖扉。

要识梅花无尽藏，人人襟袖带香归。成都梅花之盛及赏梅之盛，于此可见一斑。这种环境氛围不可能不对陆游产生某种影响。

但是，梅花在宋代文人的笔下具有不同的风韵。如范成大的咏梅诗有丝丝怜香惜玉的情调，而陆游的咏梅诗则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正气。因此，我们对陆游多有咏梅之作还要进一步探讨。

我们知道，陆游出生于北宋末的动乱之年，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南宋时代。惨痛的经历，家世的影响和环境的熏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培育出一种忧国忧民之情，随着年岁的增长，此情历久愈浓。他渴望驰骋沙场，建立功业，报效国家。可惜，朝中总是投降派当权，陆游不仅无用武之地，反而屡遭迫害。然而，他没有屈服，始终为抗金复国而奔走呼号。傲霜斗勇、力挽春回的梅花，最集中、最充分地体现了诗人献身祖国的理想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因此，诗人很自然地欣赏歌颂梅花，而梅花反过来又鼓舞、鞭策诗人在逆境中振作奋起，坚持斗争。这便是陆游热爱梅花、大量写作梅花诗词的根本原因。就一般咏梅作品来说，梅花作为一种物象往往是高人隐士闲适情怀的抒发契机，而作陆游笔下，梅花一跃升华为爱国志士坚贞不屈形象的化身，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执着于“争春回”。《剑南诗稿》卷四有《梅花》诗，其三云：

玄冥行令肃冰霜，墙角疏梅特地芳。

屑玉定烦修日户，堆金难买破天荒。

了知一气环无尽，坐笑千林冻欲僵。

力量世间谁得似，挽回岁律放春阳。这首诗作于乾道九年。我们知道，乾道八年，陆游应王炎之召来到南郑，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抗金前线，身着戎装，金戈铁马、雄心勃勃地要收复中原。但好景不长，王炎被改任后，陆游只得再回成都供闲职，发出“今朝梦忽破”的沉重叹息。但他的报国之心并未灰死，奋斗目标也没有改变。在这首诗中，墙角几枝疏梅竟有世间无比的力量，能“挽回岁律放春阳”，这正是那些为数不多、受尽迫害，却渴望力挽狂澜、改变祖国屈辱地位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在陆游的爱国诗篇中，有不少直接讽刺、谴责投降派的作品，这些投降派则是以“桃李”、“群芳”等面目出现的。《剑南诗稿》十二有《园中赏梅》二首，其一云：

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

江边晓雪愁欲语，马上夕阳香趁人。

熨眼红苞初报信，回头青子又生仁。

羁游偏觉年华速，徒倚阑干一怆神。什么叫做“清真”呢？《剑南诗稿》卷九《涟漪亭赏梅》对此作出了说明，其诗云：

判为梅花倒玉，故山幽梦忆疏篱。

写真妙绝横窗影，彻骨清寒蘸水枝。

苦节雪中逢汉使，高标泽畔见湘累。

诗成怯为花拈出，万斛尘襟我自知。显然，诗人用拟人的手法说明，梅花的“清真”便是苏武、屈原的那种热爱祖国、宁折不弯的崇高气节，反过来说，苏武、屈原的这种崇高气节，在梅花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此，陆游爱海棠、爱山茶、爱菊花，也爱杏花，却把最高的荣誉给了梅花。“何方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剑南诗稿》卷五 《梅花绝句》之三）梅花成了理想的化身。

陆游一生，不逢其时，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希望与失望的矛盾给诗人爱国忧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诗人政治失意后所产生的悲愤、苦闷、

徨，以及思乡念亲之情和消极的隐退思想，无一不被织入咏梅的作品。梅花虽有疏影暗香的风韵和独先天下春的才能，却生长在断桥水边、深山幽谷，不为人识，更不为人重。共同的命运使诗人和梅花有了更强烈的共鸣，在陆游的咏梅诗中，回荡着一种悲怆欲绝的旋律。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卜算子·咏梅》（《渭南文集》卷四九），词云：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首词完全是陆游自身遭遇的写照。秦桧主和以后，南宋小朝廷文恬武嬉，陶醉于西湖歌舞，主张抗金北伐者寥若晨星，陆游的处境十分孤独，且屡中暗箭。词的上半阙充满感伤抑郁的悲愤之情，在诗人的笔下，梅花就是这样长期忍受着寂寞愁苦的煎熬，境遇凄清，知音寥寥。而词的下半阙则充满着一股激越不平之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零落成泥，不改初衷。句句写梅，又句句自状。

我们前面曾讲过，陆游的故乡有梅。山阴不仅有梅山，还有乡乡植梅的梅市。山阴的古梅，因为云蒸雨渍，遍生苔藓，在当时最为有名。故乡山阴，正是梅花之乡。同时，唐代大诗人王维有诗云：“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昨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由此，陆游便在咏梅诗中寄托了自己的倦而思归之情。乾道九年，陆游在嘉州写下了《梅花》二首（《剑南诗稿》卷四），其二云：

月地云阶暗断肠，知心谁解赏孤芳。

相逢只怪影亦好，归去始惊身染香。

渡口耐寒窥净绿，桥边凝怨立昏黄。

与卿俱是江南客，剩欲尊前说故乡。诗人之与梅花，异域相逢，叹为知己。因为他们有同样的身世，有同样的愁肠。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相逢之时，樽前叙旧，嘘唏叹离，相互倾诉着伤心之事，故乡之思便油然而生了。

风波险恶的游宦经历，使陆游对功名越来越厌倦。因而对家乡的思念就更加强烈了。淳熙五年，陆游在成都作《小饮落梅下戏作送梅一首》（《剑

南诗稿》卷九)，诗云：

零落梅花不自由，断肠容易付东流。
与人又作经年别，问月应知此夜愁。
已是狂风卷平野，更禁横笛起危楼。
何时小雪山阴路，处处寻香系钓舟。

口家世身世之谜山阴路上的梅花，在这里不仅象征故乡，而已含有归隐之意了。

封建知识分子在仕途失意之时，往往心系田园山林。理想无法实现，又不愿同流合污，隐逸便是最好的归宿了。庆元六年春，陆游在山阴作《开岁半月湖村梅开无余偶得五诗，以烟湿落梅村为韵》（《剑南诗稿》卷四二），其四云：

斗柄忽东指，开尽湖边梅。
伟观天下无，四顾雪千堆。
时至当敛退。勿受晓角摧。
安知桃李辈，于子无嫌猜？

这既是劝梅，也是自劝；既是慰梅，也是自慰，诗人把梅花比作隐居空谷的高人，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剑南诗稿》卷九有《宿龙华山中寂然无一人，方丈前梅花盛开，月下独观至中夜》，诗云：

梅花如高人，枯槁道愈尊。
君看在空谷，岂比倚市门。

在陆游看来，梅花如同人间的伯夷、叔齐，最值得敬重，最值得效仿。更有甚者，陆游有时视梅花为世外之物，“蕊殿仙妹下界游，偶来税驾判溪头”（《剑南诗稿》卷十四《梅花已过，闻东村一树盛开，特往寻之，慨然有感》），而诗人又时常说自己“我本尘外客”，这样，诗中的仙界来客——梅花，便与诗人合而为一了。嘉定元年冬（陆游去世的前一年），诗人在山阴写下《湖山寻梅》二首（《剑南诗稿》卷八），他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神仙境界，没有官场的污浊，没有人生的痛苦，超然物外，冰清玉洁，诗人在这样境界中寻到了解脱愁苦寂寞的药方。我们并不否认陆游常在梅花身上寄托着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然而，对故乡、对隐逸、对仙境的向往，本身便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否定，是不宜轻易抹杀的。

在宋代的咏梅诗作中，林逋的《梅花》相当出名，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尤为警绝，然而，陆游却认为“林逋语虽工，竟未脱缠缚”——只重外形的刻意求工，做茧自缚，没有充分展示其精神境界。陆游的评述是有道理的。人品决定诗品，只有具有梅花那样高洁的精神境界，才能写出好的梅花诗来。可以说，陆游一生本身便是一曲可歌可泣的梅花赞歌。

二、铁马秋风之谜

苍天不负有心人。绍兴二十五年（1155），奸相秦桧一命呜呼，时局似乎出现了转机。朝野人士纷纷议论边事，主张抗金；北方沦陷区人民也盼望南宋政府早日收复失地。在抗战舆论的压力下，高宗赵构不得不暂时斥退投降派，起用抗战派。绍兴二十八年（1158），34岁的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这是他初入仕途。

在随后的三十余年中，陆游沉浮于宦海。继宁德主簿之后，他曾调官福州决曹，任敕令所删定官，为大理司直兼宗正簿，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出为镇江府通判，任通判隆兴军事，以左奉议郎为通判夔州军州军，应王炎之召为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又被调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权通判蜀州事，摄知嘉州事，摄知荣州事，曾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除朝请大夫知严州军州中，除军器少监，迁朝议大夫尚书礼部郎中，最后以“嘲咏风月”罪被斥归。

在这三十余年中，当朝的皇帝换了几个，陆游也几起几落。斗转星移，南宋的处境显然日益窘迫了。陆游一次次地看到了希望之光，又一次次地跌入失望之渊。俗话说，只有天才才能给另一个天才以施展才能的机会。陆游是一位天才，可惜，另一位天才并没有出现，而且，也根本不会出现。金人的凶残虽然令人发指，南宋的腐败亦是骇人听闻。现实并没有为陆游提供大济天下的舞台，他只好在“梦”中徘徊了。西方哲人说，作家是做白日梦者。陆游便是如此。

欲进不能，欲罢不忍。陆游由热情而激愤，由激愤而放浪。白日放歌须纵酒，看花剑外十年狂。甚至，他迷恋起歌院，热衷于仙道。自号“放翁”，这既是对群小的蔑视，又有几分对时局的无奈。屈原自称“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陆游标举“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两番言辞，一付心肠。

人们常说，在问题的正面解决之前往往有一次反面的解决。问题是：所有的反面解决之后必然是正面解决么？

绍熙五年（1190）冬，陆游在山阴写下《十一月五日夜半偶作》（《剑南诗稿》卷三十），诗云：“草径江村人迹绝，白头卧病一书生，窗间月出见梅影，枕上酒醒闻雁声。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后生谁记当年事，泪溅龙床请北征。”诗中的“龙床”自然是指皇帝的宝座。读者不免疑惑——

陆游的“泪溅龙床”是怎么回事？

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陆游除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官玉牒所，由山阴动身再去临安。此时，宋金两国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秦桧死后，抗战派逐渐抬头，纷纷要求恢复失地。而金朝在完颜亮统治时期，蒙古人已崛起，威胁他的后方；加之完颜亮是以篡弑手段窃取帝位，也为女真内部所不满。完颜亮为了摆脱蒙古人的威胁，转移内部视线，决意挥军南下。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完颜亮命参知政事李通对宋贺生辰使徐度说：今年二月末，金主要到河南（洛阳）去观花，然后去淮右打猎。五月，金主派使来贺高宗生辰，又提出了最后通牒。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使得高宗不得不对大臣们说：“今日更不问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

金主完颜亮于绍兴三十一年四月由燕京迁都开封，九月大举南侵。此时，黄宜舜为同知枢密院事，陆游曾在贺启中表示了坚决为国效命的决心（见《渭南文集》卷七《贺黄枢密启》）。陆游“泪溅龙床”（请纓北伐）之举，大约就在此时。

对于这件事，陆游多次提及。《剑南诗稿》卷二十有《史院书事》，诗云：

信史新修稿满床，牙签黄带芸香。

中人驰赐初宣旨，丞相传呼早出堂。

皇祖圣谟高万古，诸贤直笔擅三长。

孤臣曾趣龙墀对，白首为郎只自伤。作者在诗后自注：“绍兴辛巳尝蒙恩赐对，今三十九年矣。”《剑南诗稿》卷三一有《望永思陵》，其二云：

盱食忧民宴乐疏，太仓几有九年储？

贾生未解人间事，北阙犹陈痛哭书。作者在诗后自注：“绍兴庚辰、卒已间（即指绍兴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引者），游屡贡瞽言，略蒙施用。”

然而，此番“泪溅龙床”并未使陆游得到重用。同年十月，陆游便又被罢归故里了。淳熙四年（1177），陆游在成都作《感兴》（《剑南诗稿》卷九）回忆这一事件，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贼亮负函贷，江北烟尘昏。奏记本兵府，大事得具论。请治故臣罪，深绝衰乱根。言疏卒见弃，袂有血泪痕。”

当然，当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兵犯瓜州、形势万分危急时，陆游再次被起用，人都为史官——这便是另一回事了。

陆游一生之志业，在于杭击金人以恢复中原，然而，据明人陶宗仪《说郭》卷四三陆游《感知录》，隆兴元年（1165），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准备北伐时，非常看重陆游，打算教陆游兵法，陆游极为谦逊他说声“不敢”而加以拒绝。多么奇怪——

早年就立下“执戈王前驱”的陆游竟不愿读兵法么？

关于陆游谢绝张浚之事，《说邪》卷四三陆游《感知录》是这样记述的：魏国忠献张公浚，字德远，为枢密。他日谓予曰：“吾子异时当以功名显。吾少时在熙河从事，曲琦授兵法、所谓‘老曲太尉’也，今当以付子。”予谢不敢。及予通判镇江，公以右相视师过焉，又谓予曰：“官于此，天相吾子也。此郡宿兵，大多老将，可时从之游。”予亦以素不知兵，又多病，未尝识诸将为对；然公不以为件，又曰：“欲招吾子来本司，可也。”公时为都督，但自谓本司。予曰：“方以愚戆，不敢安于朝，岂敢复累公！”公曰：“不然，俟归，当力言之。”未几，公亦罢政。

读罢这段文字，我们首先感到此事不近情理。张浚以世谊长辈兼擅使相职权，欲亲以兵法相授，陆游怎能一再推辞？更主要的是，这一情节与陆游的诗文矛盾。

陆游生长在具有爱国思想传统的家庭里，从小就听到爱国志士的抗金言论，备受教育；再加上他长于兵间，有“儿时万死避胡兵（《剑南诗稿》卷六五《戏遣老怀》）的惨痛经历，于是从儿时便立下了英雄誓愿：“儿时视身愿事主，谈笑可使中原清。”（《剑南诗稿》卷二六《壬子除夕》）

为了实现这一宏愿，陆游常读兵书，而且也有这方面的家庭条件。《渭南文集》卷十五《闻鞞录序》云：“元丰初，置武学。先太师以三馆兼判学事，今学制规模多出公，而策问亦具载家集中。”由此可知，陆游之读兵书，固然出于爱国抗金之心所驱使，亦有家学渊源。下面，我们从陆游诗作中找一些读兵书之例证。

《剑南诗稿》卷一有《夜读兵书》，诗云：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

此诗作于绍兴二十五年，时年 31 岁。

《剑南诗稿》卷二 亦有《夜读兵书》，诗云：

八月风雨夕，千载孙吴书。

老病虽惫甚，壮气颜有余。

此诗作于淳熙十五年，时年 64 岁。

除诗题中直书“读兵书”者之外，从另外的一些诗文中也可知陆游素有读兵书之热情。如《渭南文集》卷二六《跋杲禅师蒙泉铭》云：

往予尝晨过郑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气豪，直据上坐。时方大雪，寒甚，因从禹功索酒，连引径醉。禹功指僧语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辞谢，方说诗论兵，旁若无人，妙喜遂去。此事发生于绍兴二十四年，时年 30 岁。

陆游不仅常读兵书，在军事战略方面亦有一些真知的见。如，绍兴末年，张浚根据四川宣抚使吴玠在陕甘方面孤军深入，破大散关，克复秦州，与金

兵相持于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县东）的情况，准备北伐。其计划是请孝宗赵“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 授，进舟山东，以为吴 之援”。北伐进军路线是请以所部 20 万人马进取山东，以为恢复。而陆游则反对孤军深入，主张首先稳固两淮，然后稳扎稳打，他在代左相史浩《乞分兵取山东札子》（《渭南文集》卷三）中云：

窃见传闻之言，多谓虏兵困于西北，不能复保京东；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师若至，可不劳而取。……万一未至尽如所传，虏人尚敢旅拒，遗民未能自拔，则我师虽重，功亦难必；而宿师于外，守备无虚。我犹知出兵京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知侵犯两淮、荆襄以牵制京东耶？为今之计，莫若戒敕宣抚司，以大兵及舟师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为不可动之计；以十分之一，遴选骁勇有纪律之将，使之更出迭入，以奇制胜。俟徐、郢、宋、毫等处抚定之后，两淮受敌处少，然后渐次那大兵前进。如此，则进有辟国拓土之功，退无劳师失备之患，实天下之至计也。

隆兴元年春，张浚赴建康都督江淮军马，陆游上《贺张都督启》（《渭南文集》卷七），文云：

恭审诞膺册书，首冠枢府。运筹决帷幄之胜，遂定庙谟；假钺督中外之军，仍专阃寄。……耕田凿井，举皆涵养之余；寸地尺天，莫匪照临之旧。岂无必取之长算，要在熟讲而缓行。

十分明显，陆游一方面对恢复中原致殷切希望，但又戒其勿轻率用兵。不幸的是，张浚后果以出兵轻率而军溃符离，偏安之论随即再一次甚嚣尘上。陆游的此番见识与他爱读兵书不无关系。

既然如此，又如何理解《感知录》所载陆游拒不研习兵书呢？答案似乎只能是：《感知录》为后人伪作，并非出于陆游手笔。陆游名声大，诗文多，后人伪托之作也多。其实，后人伪造的陆游之作并非只有《感知录》。如，《知不足斋丛书》收庐氏芸林仙馆藏本《放翁家训》，序文末称“乾道四年五月十三日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游谨书”。然而，陆游除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乃嘉奉三年事，年代相差甚远。书中赘述丧葬安排，冗沓鄙俗，绝非陆游所为。再如，《古今说海》、《历代小史》等丛书收托名陆游的《避暑漫钞》，但通读此书，可知其为拼凑宋人笔记及《老学庵笔记》数条而成，亦是后人所伪造。

当然，也有些人并非故意造伪，而是轻易推测，至使某些他人之作被署上陆游之名。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十六收署名为陆游的《贺洪枢使帅金陵启》，文云：“……方将训兵积粟，备万乘之时巡；击揖誓江，赞九重之恢复。……某自愧嵬琐，久辱眷知。擢第太常，误尘衡鉴；效官偏垒，复托 ，……小物克勤，远继毕公东郊之命；肤功迄奏，愿歌宣王北伐之诗。”据《宋史·洪遵传》可知，洪遵曾于隆兴元年夏初知贡举，但陆游此时已被贬为镇江通判，启中“擢第太常”之句无从谈起。另外，启中又称“效官偏垒，复托 ”，然洪遵出为建康太守是乾道七年六月之事，陆游此时

正任夔州通判，二地相距甚远，如何“复托”？总之，《贺洪枢使帅金陵启》的作者必为隆兴中第之人，官守亦在江东近郡，绝不可能是陆游。后人编纂《文粹》时已佚其姓名，编者也许见启中涉及北伐恢复之语，有似陆游之论，便署以陆游之名。

《渭南文集》卷四九有《水调歌头·多景楼》一词。词云：“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

连山如画佳处，缥缈着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千古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这首词是陆游的一篇力作，壮怀激烈，影响很大。问题是——

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是为谁而作？

这首词作于孝宗隆兴二年（1164）。我们知道，隆兴元年，主战派首领张浚任李显忠、邵宏渊为正副主帅，渡淮北伐。因内部发生矛盾，兵败符离。随后，投降派再度得势，国事艰难。面对这种局面，陆游写词抒怀，激励抗战派斗志，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相期。对于这首词的作意，朱东润先生在《陆游选集》中指出：“隆兴二年（1164）陆游四十岁，任通判镇江军府事时作。那年张浚正在准备北伐，往来镇江，陆游以通家子的资格，为张浚所赏识，且与幕府中人交游甚密，因有此作。上阙点出多景楼所在地，和镇江在军事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下阙以张浚比羊祜。南宋与金的对立，和西晋与吴的对立一样，张浚的往来镇江也与羊祜的镇守襄阳一样。最后指出襄阳游人，磨灭无数，独有羊祜功业，流传千古，推崇张浚，最为得体。”此番文字，在分析词意方面虽给人以启发，但仍有不妥之处。

这首词的下片写到：“露沾草，凤落木，岁方秋。”可见是作于秋季无疑。然而，张浚虽在隆兴二年三月视师镇江，并与陆游有过交往；但是，同年四月孝宗便将张浚召回朝中，尔后，解散江淮都督府，罢张浚右相；同年七月，汤思退急于向金人求和，竟毁掉两淮边备；同年八月，张浚含恨而死。由此，《水调歌头·多景楼》写作之时，张浚已离开镇江（甚至已离开人世），陆游如何为张浚作此词呢？

那么，这首词是为谁而作的呢？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八《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云：“甘露多景楼，天下盛处，废以为优婆塞之居，不知几年。桐庐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领客来游，慨然太息。寺僧识公意，阅月楼成，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安国书而刻之崖石。”张孝祥提到的“方公”，即桐庐人方滋。方滋，字务德，南渡后，三为监司，七领节帅。知镇江时，金人犯淮，淮民渡江，人数近数十万，方滋日夜奔走江滨操劳，指挥安抚工作，“为开旧港泊舟，使避风涛”，令“饥者皆得食，比去，无不感位”（据韩无咎《南涧甲乙稿》卷二一《方公墓志铭》）。据《嘉定镇江志》记载，方滋于绍兴二十二年（1162）九月至隆兴元年（1163）正月，及隆兴二年八月至乾道元年（1165）曾两度就任镇江知府（前次为代理知府）。而陆游在隆兴元年五月被贬出朝，调任镇江府通判，即刻返里，直到来年二月才至郡任职，乾道元年七月又“移官豫章”。可见，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写作时间当为隆兴二年九十月间无疑，这正与词之下片所描绘的秋天景物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张孝祥的说法是可靠的，即《水调歌头·多景楼》是为方滋而作。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全宋词》收陆游友人毛（平仲）次韵之作，词云：

襟带大江左，平望见三州。凿空遗迹千古，奇胜米公楼。太守中朝耆旧，别乘当今豪逸，人物吵应刘。此地一尊酒，歌吹拥貔貅。

楚山晓，淮月夜，海门秋。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时高唱，零落几人收。妙赏频回首，谁复继风流！

毛 自注云：“次韵陆务观陪太守方务德登多景楼。”毛 ，字平仲，信安人，礼部尚书毛友之子。工于小词， 才傲世。据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一《送毛平仲》，毛 年长陆游9岁。他除有《水调歌头·次韵陆务观陪太守方务德登多景楼》外，还有《念奴桥·次韵寄陆务观、韩无咎》，备见情谊。淳熙六年（1179），陆游曾访毛 问疾，与其子毛适同游柯山，观王质烂柯遗址（见《剑南诗稿》卷十一《访毛平仲问疾与其子适同游柯山观王质烂柯遗迹》）。由此，毛 之自注是可信的，陆游的《水调歌头·多景楼》是为方滋而作。

隆兴北伐失败后，许多支持张浚用兵者受到贬斥，陆游也不例外。投降派以陆游从父兄沅任提举两浙市舶、陆游应行回避为由，将其从京口改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剑南诗稿》卷二有《夜闻松声有感》，陆游在诗后自注云：“余丙戌七月自京口移官豫章，冒风涛自星子解舟，不半日至吴城山小龙庙。”豫章即南昌，汉名豫章郡。丙戌为乾道二年（1166年）。

然而，《入蜀记》卷二记由京口去南昌时，陆游曾至建康游钟山定林庵，作者自称：“子乙酉秋尝雨中独来游。”乙酉为乾道元年（1165），那么—

陆游究竟在哪一年被贬官南昌？

陆游改调隆兴府当是乾道元年之事。

《剑南诗稿》卷一有《去年余佐京口，遇王嘉叟从张魏公（即张浚——引者）督师过焉。魏公道免相，嘉叟亦出守莆阳。近辱书报：魏公已葬衡山。感叹不已，因用所遗（柱颊亭）诗韵奉寄》。此诗作于任隆兴府通判时。张浚视师过京口在隆兴二年甲申，则陆游自京口移官南昌，当在次年，即乾道元年乙酉。《宋会要辑稿》九十五册《职官》载：“（乾道元年）三月八日诏：权通判镇江府陆游与通判隆兴府毛钦望两易其任。……中书门下省奏：陆游以兄沆（当为沅——引者）提举本路市舶；钦望与安抚陈之茂职事不协，并乞回避。”另外，王质《雪山集》卷二十《寄题陆务观渔隐序》：“乙酉，务观贰豫章。”

陆游《夜闻松声有感》自注所云：“丙戌”当为“乙酉”之误。《剑南诗稿》卷一有陆游作于隆兴的《自咏示客》，诗云：

衰发萧萧老郡丞，洪州又看上元灯。

羞将枉直分寻尺，宁走东西就斗升。

吏进饱谗箝纸尾，客来苦劝摸床 。

归装渐理君知否？笑指庐山古涧藤。我们知道，乾道二年，言官劾陆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陆游自南昌归山阴。如果陆游是“丙戌”（乾道二年）七月方赴南昌，则《自咏示客》中“洪州（南昌，隋名洪州——引者）又看上元灯”之句就不可解了。

乾道三年（1167）十月，陆游在山阴写下《小酌》一诗（《剑南诗稿》卷一），诗云：“盘箸贫犹设，杯盂老更耽。宗文树鸡栅，灵照挈蔬篮。径醉眼共乱，高眠鼻息酣。觉来寒日晚，落叶拥茆 。”另外，《剑南诗稿》卷三七《初寒独居戏作》也有“宗文树鸡栅，灵照挈蔬篮”之句。据此，朱东润先生《陆游传》在引述陆游《上虞丞相书》中“儿年三十，女二十”之句时，作注说：“女名灵照，不知何年生。”

然而，《山阴陆氏族谱》中并没有提到这位“灵照”，那么——

灵照是不是陆游之女？

细读陆诗，宗文与灵照确实是指其一男孩、一女孩，但并非陆游二子之名。宗文本是杜甫之长男，这一点由《钱注杜诗》卷六《催宗文树鸡栅》可知，《杜诗详注》卷十五、《杜诗镜铨》卷十三均收此诗。陆游此句是借用杜甫长子宗文之名来暗指自己的长子，同样，灵照也不应该是陆游女儿之名，而应当是借用某女子之名来暗指自己的女儿，此理至明。

那么，这位“灵照”原本为谁呢？

灵照是唐代居士庞（一作蕴）的女儿之名。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八《襄州居士庞蕴》云：

襄州居士庞者，衡州衡阳人也。字道玄，世以儒为业。而居士少悟尘劳，志求真谛。唐贞元初，谒石头和尚，忘言会旨。后至江西参问马祖，云：

“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顿悟玄要。元和中，北游襄汉，随处而居。一女名灵照，常随制竹漉篱，令鬻之以供朝夕。居士将入灭，令女灵照出视日早晚及午以报。女遽报曰：“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居士出户观次，灵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居士笑曰：

“我女锋捷矣。”

对于这位灵照，《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中还有一段记载，略云：“邓州丹霞天然禅师，……师访庞居士，见女子取菜次，师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篮子，敛手而立。师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篮去。”陆游所谓“灵照挈蔬篮”，正是以此为典。

在陆游的诗作中，还有不少诗句亦是在用此典，如《剑南诗稿》卷十七《自嘲》：“极知勾漏求丹药（晋葛洪“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不及衡阳卖漉篱。”卷三二《麦熟，市米价减，邻里病者亦皆愈，欣然有赋》：“漉篱可卖饭何忧。”卷四十《戏用方外语示客》：“策篱行卖学庞公。”卷七六《感事六言》：“但有漉篱可卖，不妨到处随缘。”这些诗句都是用庞居士女儿灵照之事。

宋人诗句中涉及灵照者，并非陆游一人。如，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五《杂咏一百首·灵照》：“首如飞蓬乱，家卖漉篱供。老汉惊吾女，禅机捷乃翁。”同书卷二七《兑女，余最小孙女。慧而夭，悼以六言二首》：“性慧于灵照女，年小于似善童。急急之符夺汝，琅琅之声恼翁。”

由上所述，足以证明灵照本是庞居士的女儿，陆游在诗中用以借指自己的女儿，而这位女儿的真正名字已无从考查。

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六日，陆游被任命为通判夔州军府事。乾道六年闰五月十八日，陆游从山阴启程，溯江而上，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夔州，共计一百六十日。凡沿途所见，陆游按日记录，写成著名的《入蜀记》（共六卷）。

那么——

《入蜀记》为何受到后人推崇？

首先，《入蜀记》的字里行间，浸透着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陆游虽一路上游山赏水，心中时时想的是祖国统一和天下兴亡。如，《入蜀记》卷二“七月五日”条云：“过龙湾，浪涌如山，望石头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墙，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变，必先固守石头，真控扼要地也。”尔后，他在“七月七日”条又接着分析说：“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头当仍为关要。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贯城中，六朝立栅断航之类，缓急不可复施。然大江天险，都城临之，金汤之势，比六朝为胜，岂必依淮为固邪？”可见，陆游在游程中实地踏勘，分析地理环境，提出驻守防备的建议，希图引起南宋决策层的注意。

长江两岸多著名人士的遗址，陆游一路上踏访，通过对人物的品评，表达抗金的决心。如，《入蜀记》卷六“十月二十一日”条载：“晚泊巴东县，……谒寇莱公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寇莱公就是北宋宰相寇准（死后赠莱国公），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知巴东县，秋风亭是寇准所建。陆游对这位力排众议、动员宋真宗亲征澶州的主战派宰相无限推崇，而“怅然”、“流落天涯之叹”诸文字，则曲折地表达了对投降派得势的不满。

正因为《入蜀记》的字里行间浸透着爱国之情，所以，钱曾在《读书敏求记》卷二中说：“陆游《入蜀记》六卷。……凡途中山川易险，风俗淳漓，及古今名胜战争之地，无不排日记录。一行役而留心世道如此，后时‘家祭无忘’盖有素焉。”

其次，陆游在《入蜀记》中对沿途山水名胜作了精彩的描述，从而使其成为南宋山水游记散文的典范之作。何宇度在《益部谈资》卷上中指出：陆游是“作记妙手”，其《入蜀记》“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读之跃然”。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指出：“游本工文，故于山水风土，叙述颇为雅洁，……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悄者比也。”

前人的这种评价是有道理的，我们下面举出几例。《入蜀记》卷三“七月二十八日”条云：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群山，苍翠万叠，如列屏障，凡数十里不绝。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风张帆，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自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摇兀掀舞，才如一叶。过狮子矶，一名佛指矶，藓壁百尺，青林绿筱，倒生壁间，图画有所不及。犹恨舟行北岸，不得过其下。旁有数矶，亦奇峭，然皆非狮子比也。至马当，所谓下元水府。山势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庙依峭崖架空为阁，登降者，皆自阁西崖腹小石径，扞萝侧足而上，宛若登梯。飞萝曲槛，丹碧缥缈，江上神祠，惟此最佳。

这段文字，有概括介绍，有具体描绘，自然风光与人文景物相映衬，移

步换形，错落有致，相当优美。再如，《入蜀记》卷四“八月十六日”条云：

晚过道士矶，石壁百丈，色正青，了无窍穴，而竹树并根，交错其上，苍翠可爱，自过小孤，临江峰障无出其右。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辞》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飞”者。李太白《送弟之江东》云：“西塞当中路，南风欲进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张文潜云：“危矶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为此山写真。

这是另一种写法，作者借助于山水文学来表现山水自然。在这里，山姿水态因诗人之吟咏而名扬，激起人们向往之情，自然美借助于艺术美而加强了自己；另一方面，描写山姿水态的名章佳句，因游客亲眼目睹了山水的丽姿而深得其遣词造境之妙，艺术美借助于自然美而得到了升华。

最后，《入蜀记》对沿途的亭榭寺庙多有考证，对长江两岸的地理环境和生物分布亦有记载，对风俗人情的描述更是具体生动，因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即认识价值。

陆游学识渊博，因此，《入蜀记》中考证较多。如卷一“六月二日”条据东坡乐府辨临平塔并非太师蔡京为葬父所建，卷二“七月三日”条辨真州仪真观古今位置之不同，同卷“七月八日”条辨钟山道林真觉大师塔西小轩得名之因和《建康志》记录的失误，等等。读罢这些文字，不能不钦佩陆游的多识。

陆游对地理环境和生物分布的记载，尤为可贵。如，卷一“六月十一日”条记“无锡”的由来；“近无锡县，……近邑有锡山，出锡。汉末讖云：‘有锡天下兵，无锡天下清。有锡天下争，无锡天下宁。’至今锡见辄掩之，莫敢取者。”卷二“七月十四日”条记姑熟溪之鱼：“溪中绝多鱼，时裂水面跃出，斜日映之，有如银刀。”卷三“七月二十三日”条记阳山矶江之大鱼：“巨鱼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这类文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作者的兴致似乎还远不止于这些，作者对于各地风俗人情也一一加以记载。如卷一“六月十六日”条记新丰产酒之盛，卷三“八月六日”条记江州人以碗灯五百漂江祈福，这些文字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民俗风情画。《入蜀记》对四川农妇们描写尤为生动，卷六“十月十三日”条云：

妇人汲水，皆背负一全木盎，长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勺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峡中负物率着背，又多妇人，不独水也。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这种活灵活现的文字，是《入蜀记》风情画中最精彩之处。

总之，《入蜀记》融文学欣赏、山水领略、历史陈述、地理考辨、佚闻记录、民俗风情为一体，富有诗情画意，读之妙趣横生，陆游的忧国之情时时可见，后人对它推崇备至是情理之中的。

乾道六年（1170）十月，陆游在赴夔州通判路上路经秭归。秭归是屈原、

王昭君的故乡。

陆游住在一所寺庙，写下《饮罢寺门独立有感》（《剑南诗稿》卷二），诗云：“一邑无平土，邦人例得穷。凄凉远嫁妇，憔悴独醒翁。”自注云：“州有屈大夫及明妃祠。”明妃即王昭君，以避晋司马昭之讳而改名王明君。在陆游之前，文人虽多有咏昭君之诗，但很少有人将其与屈原并列起来。那么——

陆游为何对王昭君情有独钟？

昭君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匈奴传》。单于自言愿媾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大喜，上书愿保上谷以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寒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这样，王昭君便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一位弱女子，她是封建帝王的玩物和工具，被无情地抛向异域沙漠；作为一位民族的象征，她又是和解与亲善的使节，换得了西汉与匈奴之间几十年的太平。她是一位悲剧人物，却又体现了一种完美的崇高与伟大。由此，她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千百年来文学和艺术创造的主角。在讨论陆游昭君诗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昭君诗发生、发展的历史。

西晋石崇曾依《汉书·匈奴传》而作《王昭君辞》，云：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
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纓。
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
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
父子见陵辱，对之且惊。
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
飞鸿不我顾，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王昭君辞》的主题是“哀郁”——叹路之遥，哀漠之荒，悲立身之难，泣生而无还。这种基调影响深远，如唐代崔国辅《王昭君》云：

汉使南还尽，胡中妾独存。
紫台绵望绝，秋草不堪论。

然而，也正是在晋代，王昭君的故事发生了一些变化。

《西京杂记》卷二云：

元帝后宫既多，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值，……

同日弃市。

这则故事显然出于后人的编造，但它却启发了诗人们的新灵感——由谴责画工进而谴责君王周围的小人，从而抒写怀才不遇的愤懑。于是，“怨”便成了昭君诗的一个新主题，这在唐诗中尤为多见，兹举几例。

李商隐《王昭君》云：

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

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何焯评曰：“义山（即李商隐——引者）亦万里明妃也。”（《笺注李义山诗集》卷中）真是一语中的。

杜甫《咏怀古迹》之三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卷四评曰：“结语‘怨恨’二字，乃一诗归宿处。……‘一去’，‘怨恨’之始也；‘独留’，‘怨恨’所结也；‘画图识面’，生前失宠之‘怨恨’可知；‘环归魂’，死后无依之‘怨恨’何极！”杜甫此诗，可谓此类诗中的绝唱。

时至宋代，诗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他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昭君故事，终于发现了昭君出塞的重大历史意义。北宋郭祥正《青山集》卷二八《昭君上马图》云：

飘飘秀色夺仙春，只恐丹青画不真。

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在这首诗中，王昭君一洗愁容，成为一位以身许国的英雄！

这种审视角度的变化，自有其深广的社会背景。宋朝自建立之初就边患不断，且不论辽与金，就是在与弱小的西夏政权的战争中，宋军也频遭败绩。在强大的外患压力之下，人们自然便想起了那位曾消弥两个敌对国宿怨的女子，人们惊叹一弱女子竟然能给国家带来几十年的边境安宁，从而不得不承认她的历史功绩。堂堂七尺之躯的男人们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歌唱起王昭君来。李纲《梁溪集》卷十二《明妃曲》云：

昭君自恃颜如花，肯赂画师丹青加。

十年望幸不得见，一日远嫁来天涯。

辞官脉脉洒红泪，出塞漠漠惊黄沙。

宁辞玉质配胡虏，但恨拙谋羞汉家。

穹庐腥 厌酥酪，长调幽怨传琵琶。

一宫美女不知数，肯委黄土纷如麻。

当时失意虽可恨，犹得诗人千古夸。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们纷纷为王昭君唱赞歌，一方面固然出于对其历史地位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昏庸、将帅无能的讽刺。《宋诗纪事》卷六五引许辈《明妃》一首，诗云：

汉家眉斧息边臣，功压貔貅百万人。

好把香闺旧脂粉，艳妆颜色上麒麟。作者的意思十分明显，百万大军不及一位女子，真正有资格上功臣阁的究竟应该是谁呢？

把国家的安危存亡寄托在一位女子身上，这分明是男儿们的一种耻辱，宋人感受到了这一点。吕本中《东莱诗集》卷二《明妃》诗云：

秦人强盛时，百战无逡巡。

汉氏失中策，清边烽燧频。

丈夫不任事，女子去和亲。

这种耻辱感刺激人们去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样，昭君诗中便充满了对朝政腐败的不满。叶芮《顺适堂吟稿·昭君怨》云：

塞外将军且罢兵，一身万里自经营。

将军歌舞升平日，却调琵琶寄怨声。

了解了宋代的外患压力及其昭君诗主题的演变，我们就不难理解陆游为什么将王昭君与屈原相提并论了。在陆游看来。屈原的被放逐，王昭君的出塞和亲，都是为国家、为民族承担了不幸的命运。陆游用极为哀婉的笔调，表达了对他们的敬意与同情。在陆游的诗作中，远嫁异地的王昭君心中所“凄凉”的原因，已不是个人的身世，而是国事、天下事，这一点从前后诗句的关系中可以体会得出来，过去文人笔下那位悲悲泣泣的昭君，现在竟有些类似于忧国忧民的三闾大夫屈原了。

绍熙五年夏，陆游在山阴作《明妃曲》（《剑南诗稿》卷三），将问题说得更明白。诗云：

汉家和亲成故事，万里风尘妾何罪？

掖庭终有一人行，敢道君王弃蕉萃？

双驼驾车夷乐悲，公卿谁悟和戎非！

蒲桃宫中颜色惨，鸡鹿塞外行人稀。

沙碛茫茫天四围，一片云生雪即飞。

太古以来无寸草，借问春从何处归？诗中，“掖庭终有一人行”是对昭君舍身为国的称颂，而“公卿谁悟和戎非”则是对投降派的控诉。

在陆游影响下的江湖诗人们，也常常把王昭君作为歌颂的对象。如，盛世忠《江湖后集》卷十四有《王昭君》，诗云：

汉使南归绝信音，毡庭青草始知春。

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诗人以对比的手法，给投降派以无情的讽刺。

乾道八年（1172）春二月，陆游应王炎之召，离开四川夔州通判任所，经广元（即利州，又名小益）赴南郑供职，途中写下《蝶恋花·离小益作》三首，其第一首有“凭高望断南楼信”之句。朱东润先生《陆游选集》注“南楼”云“泛指，陆游赴南郑之初，眷属仍留夔州。南楼信可能指家信。”但是，我们在“陆游‘沈园’诗本事之谜”中讲过，陆游与其后妻王氏的关系

相当冷淡，陆游从戎途中怎么会“凭高望断南楼信”呢？人们不禁要问——

《蝶恋花·离小益作》之一究竟为何而作？

其实，这首词抒写的并不是对后妻王氏的挂念，而是对前妻唐氏的缅怀。

为了说明问题，现将全词引录如下：陌上箫声寒食近。雨过园林，花气浮芳润。千里斜阳钟欲暝，凭高望断南楼信。海角天涯行略尽。三十年间，天处无遗恨！天若有情终欲问，忍教霜点相思鬓？

对于这首词的理解，我们必须结合陆游其他爱情悼亡诗的相关词句，才能把握住其底蕴真谛。现逐句分析如下：

陌上箫声寒食近：首先表明行止在陌上，听到的是呜咽的箫声，而时序则接近寒食。此句中的“寒食”尤为值得注意。寒食“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且在清明节前一、二日，系传统扫墓祭坟、纪念死者之时。此时，陆游为沿途所见触动，自然联想到当年与唐婉相会于沈园以及后来唐婉死去的伤心往事，难免伤怀。

雨过园林，花气浮芳润：此句即是写景，又暗含回忆当年沈园之会。沈园之会，时值春季，春雨过后，园中百花滋润，芬芳宜人。陆游对此，记忆尤深，84岁时还在《春游》四诗其四中写到：“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而今由路经之园想到沈家之园，深感园中百花虽年年如锦，但已物是人非，不免徒增悲凄。

千里斜阳钟欲暝：陆游68岁时所写思念唐婉的一首诗，诗题中有“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阁壁间”之句；说明，沈园位于禹迹寺南；又，陆游84岁时所写《禹寺》诗中有“禹寺荒残钟鼓在，我来又见物华新”之句，证明禹迹寺亦有钟鼓之设。一般寺庙中僧徒早晚礼佛，即敲钟鼓。此句意谓在千里之外夕阳将落的黄昏时分，油然联想到禹迹寺的阵阵钟声，唤回几十年前的凄凉情景。

凭高望断南楼信：据周密《齐东野语》载，自与唐婉沈园相会之后，陆游“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晚年既复如此，其中年之情形亦应可知。此句意当为昔日曾登临禹迹寺之高处，远望唐婉所处之楼阁，希望有音信得知，宜至夜幕降临时为止。

海角天涯行略尽：此句可与《鹅湖夜坐书怀》诗中之“我行环万里，险阻真备尝。……我亦思报国，梦绕古战场”（《剑南诗稿》卷十一）数句，对照参看。我们前面曾讲过，为了建立功业，陆游屈从于家中压力与唐婉分手，几十年来，陆游四处奔走，其目的在于报效国家，建立功业，然而一事无成。念及为此而牺牲爱情，不禁心酸。

三十年间，无处无遗恨：陆游19岁时（绍兴十三年——1143）至临安应进士举失败，次年与唐婉结婚，后被迫离异；其后二十多年间，仕途坎坷，沉居下僚。此处谓“三十年间”，盖举时间之成数而言。

天若有情终欲问，忍教霜点相思鬓：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有“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陆游用此典以寄托自己的凄苦之情。

句中的“忍”字意为“怎忍”、“岂忍”，秦观《鹊桥仙》有“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之句，陆游怀念唐婉，情不能已，鬓发成霜，即古诗“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之意。陆游对这一点感受极深，其后在68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诗中仍提及这一点，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陆游因思念唐婉，两鬓成霜，出于激愤，不自以为忧思过度，反而设想天若有情欲加质问，岂忍使白霜点染了自己之鬓。其不能忘情之苦衷溢于言表。

总之，《蝶恋花·离小益作》之一是哀悼唐婉之作，不可能是思念后妻王氏之笔。须知，陆游与王氏的关系并不亲密！

乾道八年（1172），陆游改除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十一月二日自南郑去成都，初抵成都便登临道教圣地青城山。此后，在仕蜀期间又三次上青城。陆游时道教的兴趣于此可见一斑。庆元六年（1200）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竟写下这样的诗句：“人间事事皆须命，惟有神仙可自求。”（《剑南诗稿》卷四四《读仙书作》）那么——

陆游为什么对道教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陆游对道教颇有兴趣，这与其社会环境和家世之风有很大的关系。

宋朝诸皇对道家十分推崇，这是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宋代自赵匡胤始便崇尚宗教；至真宗时，更发展为佛、道并重，尊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建筑玉清宫，极为壮观，又封龙虎山道士张静随为真静先生。到宋徽宗时，为了提倡道教，不但设道官，编道史，建道观，还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依然如故，这既有统治集团借以缓和内部矛盾的考虑，也有其利用宗教抵御外族入侵的用心。陆游《癸丑七月二十七日夜梦游华岳庙》（《剑南诗稿》卷二七）云：“驿树秋风急，关城暮角悲。平生忠愤意，来拜华山祠。”可见，当时的道教，既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又是维系民心的工具。

由于历朝皇帝的推崇，道教对宋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山阴陆氏家族的情况尤为典型。陆游在《跋修心鉴》（《渭南文集》卷二六）中，曾这样追述高祖陆轸的事迹：

公生七年，家贫未就学，忽自作诗，有神仙语，观者惊焉。晚自号朝隐子。尝退朝，见异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许，邀与俱归，则古仙人嵩山栖真施先生肩吾也。因受炼丹辟谷之术，尸解而去。然其术秘不传；今惟此书尚存。某既刻板传世，并以七岁吟及自赞附卷末，庶几笃志方外之士读之，有所发焉。亦公之遗意也。

祖父陆佃虽是有名的经学家，但其遗留下的少数诗文中，亦有与李得柔道士的交往之作。陆宰本人对道教也很有兴趣。受到如此家世之风的影响，陆游曾“少时妄意学金丹”（《剑南诗稿》卷五四《溪上夜钓》）。“焚香读书户常闭，少年曾预老聃役”（《剑南诗稿》卷六三《读老子次前韵》）。这正是陆游少时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陆游的恩师曾几在这方面也曾推波助澜、火上加薪，他鼓励弟子读道家典籍。曾几《茶山集》卷一《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中有这样的诗句：

周时柱下史，设教本清静。

至今五千言，谈若鼓钟磬。

曾几显然希望陆游将来能把清静无为的道旨应用到政治施为中去。而陆游也正是这样认识的，他在《读老子》（《剑南诗稿》卷四四）一诗中说：“孰能试之出毫芒，未俗可复跻羲黄。”自年轻时代起，陆游就与道人多有周旋，陆游宦四方后，就所识更多了。

我们并不否认陆游在对道教的崇尚中含有逃避现实、向往游仙等消极的思想情绪，但我们还要注意到，陆游在对道教的崇尚中还含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因素。

首先，陆游的神仙迷信、遐举飞升，有时和杀敌报国的思想交织在一起。门前来一化缘道士，他认为可复国仇：“须君更出囊中剑，一为关河洗虏尘。”

（《剑南诗稿》卷四九《有道流过门，留与之语，颇异，口占赠之》）陆游曾主张迁都关中，此等骇世之论不被决策层所采纳，陆游只好托之于神仙之论，《渭南文集》卷二五《书渭桥事》于此有生动的描述。

其次，陆游的神仙迷信、遐举飞升，有时是追求理想、鄙弃世俗的反映。乾道三年，陆游在山阴写下《夜读隐书有感》（《剑南诗稿》卷一），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平生志慕白云乡，俯仰人间每自伤。

我们知道，陆游在隆兴二年秋以后，政治上受到打击，思想相当苦闷，在镇江，在南昌，以至罢官归山阴，时时在道书中寻找寄托。隆兴二年七月曾作《跋修心鉴》，乾道二年作《跋坐忘论》、《跋高象先金丹歌》、《跋天隐子》、《跋老子道德古文》，乾道三年作《跋造化权舆》及此诗。现实社会并没有向他提供大济天下的机会，由此便形成了“有志不伸空自悼”的政治苦闷，他屏弃世俗，只得在白云乡中去追觅自己的理想。

正是因为如此，陆游对神仙、金丹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并不是完全相信。他有时比较清醒地认为金丹是茫昧的，《剑南诗稿》卷五四《养生》一诗云：

昔虽学养生，所遇少硕师。

金丹既茫昧，鸾鹤安可期。

关于神仙，他的弟子苏 在《冷然斋诗集》卷一《正月五日谒放翁留饮欢甚》中记载过他的话说：

未言神仙事，于世本无用。

但可于世人，矫首飞鸿送。

由此可见，陆游虽对道教有浓厚的兴趣，但绝不是一位道教徒！

陆游对于道教的这种矛盾态度并不难于理解。从时代来看，他生逢外族入侵的严酷岁月，亲身受到了这种入侵的强烈震撼，坚定的抗敌意念使他不可能真正地置身世外。从其学术思想来看，他基本上仍然属于儒家。陆游屡有诗作说：“暮年尚欲师周、孔，未遽长斋绣佛前”（《剑南诗稿》卷四八《江上》）；“六经未与秦灰冷，尚付余年断简中”（同上，卷四九《冬夜读书有感》）；“平生学六经，白首颇自信”（同上，卷七九《病中夜思》）；“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同上，卷三八《六经示儿子》）。由这些诗句可以看出，陆游跳不出或不肯跳出儒学的藩篱。

淳熙二年（1175）春，陆游在成都得知其从祖兄陆升之死讯，作《闻仲高从兄讣》（《剑南诗稿》卷六），称其“丹心抱忠贞”、“文章果何罪”。然而，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云：

“陆升之仲高，山阴胜流，词翰俱妙，晚坐秦党，遂废于家。”两种评价，截然相反。人们不禁要问——

陆升之人品究竟如何？

陆游与陆升之的交往较早。绍兴十年，16岁的陆游便与陆升之等人同去临安参加“春铨”——南宋朝廷为恩荫子弟未仕官者所特设的考试，于每年三月上旬举行。二人同场屋（见《渭南文集》卷二九《跋范元卿舍人书陈公实长短句后》）。

二人双双败北。庆元六年，76岁的陆游作《枕上口占》（《剑南诗稿》卷四二），诗云：“蹋雨敲门觅季夷，褰笈同和仲高诗。回思五十年前事，恰似今宵梦里时。”庆元六年为公元1200年，上推50年，为绍兴二十年（1500），即陆游26岁之前。而陆升之已于绍兴十八年中进士，遂入仕途，故诗中“褰笈同和仲高诗”之事当在绍兴十八年之前，所谓“五十年前事”不过是举其整数而已。由此可知，陆游在青少年时期与陆升之交往较密。

然而，二人后来发生了矛盾。绍兴二十一二年间，陆游在山阴作《送仲高兄官学秩满赴行在》（《剑南诗稿》卷一）。诗云：

兄去游东阁，才堪直北扉。
莫忧持橐晚，姑记乞身归。
道义无古今，功名有是非。
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

要理解这首诗，我们要阅读下面的材料。《山阴陆氏族谱》云：“升之，……以父恩补郎。高示绍兴戊辰王佐榜进士，仕至承议郎，提举两浙市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云：“绍兴二十年，春正月，丙申，两浙转运判官曹泳言：右承务郎李孟坚省记父光所作小史，语涉讥谤，请送大理寺。初，光在贬所，常作私史，孟坚间为所亲左奉议郎、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言之，升之讪其事，遂命泳究实申省。”陆游对陆升之的政治态度非常不满，在诗中劝升之要辨明功名中的大是大非，不要失节，不要忘记“乞身归”。叶《爱日斋丛钞》卷四对此诗评论说：“陆放翁《剑南诗集》中有送兄仲高造朝一首，规做之意，不迫不迂，最可诵也。仲高讳升之，为诸王宫教授，告李庄简家私史，擢宗正丞。秦桧死，前诬讪之党悉投窜，仲高亦坐累徙雷州。”陆升之当时并未听从陆游的劝告，反而心中不快，韦居安《梅诗话》卷中云：“放翁《送仲高兄官学秩满赴行在》诗云云，其兄不悦。后放翁入朝，仲高变用此诗送行，只改兄作弟字。”据此，二人友情中断，分道扬镳了。

十分奇怪的是，陆游在晚年对陆升之倒是一片深情。《渭南文集》卷五有《渔家傲·寄仲高》，词云：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鬢丝几缕茶烟里。

这首词作于蜀中，叙写别情，婉而有致。据《山阴陆氏族谱》，陆升之

卒于淳熙元年，由于越蜀两地相距甚远，陆游隔年始得讣讯，作《闻仲高从兄讣》，诗云：

去国万里游，发书三日哭。
久矣吾已衰，哀哉公不淑。
寄书墨未干，玉立在我目。
天高鬼神恶，生世露电速。
丹心抱忠贞，白首悲放逐。
九阍不可叫，百身何由赎！
文章果何罪？一斥独不复。
上寿阿母前，悔不早碌碌。

陆游早年讥陆升之不明是非；其死，又赞其“丹心抱忠贞”，这种截然不同的评判令学者们大惑不解。其实，《渭南文集》卷十七的《复斋记》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线索。为说明问题，现将《复斋记》引录如下：

仲高于某为从祖兄，某盖少仲高十有二岁。方某为童子时，仲高文章论议已称成材，冠峨带博，车骑雍容，一时名公卿皆慕与之交。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谓仲高仕进且一日千里。自从官御史，识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为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称美仕，在仲高则谓之蹉跌不偶可也。顾曾不暖席，遂遭口语，南迁万里，凡七阅寒暑，不得内徙。与仲高亲厚者，每相与燕游，辄南望叹息出涕，因罢酒去，如是数矣。然客自海上来，言仲高初不以迁谪瘴病动其心，方与学佛者游，落其浮华，以反本根，非复昔日仲高矣。闻者皆怅然，自以为不足测斯人之浅深也。

隆兴元年夏，某自都还里中，始与兄遇，视其貌，渊乎似道；听其言，简而尽，所谓落浮华、反本根者，乃亲见之。尝对榻语至丙夜，谓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复斋，子为我记。”某自念少贫贱，仕而加甚，凡世所谓利欲声色、足以败志汨心者，一不践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学道者。然从事于此数年，卒无毛发之得。若仲高驰骋于得丧之场，出入于忧乐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于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盖将就学焉。敢极道本末，以为《复斋记》。

根据此文，陆升之被贬后，颇有悔过之意，“落其浮华，以反本根”，竟至于“非复昔日仲高矣”。有鉴于此，陆游对他油然而生同情之心，认为南窜七年之处罚有些过重。特别应指出的是，陆游对陆升之“反本根”所达到的人生境界颇为赞许，并表示“将就学焉”。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陆游闻陆升之讣讯后才写下“丹心抱忠贞”之类的溢美之辞。

当然，不论陆升之后来表现如何，他人仕之初附合秦党之举是客观存在的，陆游对陆升之的盖棺之论是不正确的。可以说，《闻仲高从兄讣》是陆游的一大败笔。

淳熙二年（1175）六月，范成大以四川制置使的身份来到成都，此时陆游任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据《宋史·陆游

传》：“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细想一下，便觉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陆游与范成大早有交往，四川宣抚使罢后，四川制置使便是西北的最高军事长官，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北控秦陇，临制悍防，地位很重要。陆游成为范成大的参议官，似乎正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竟放浪起来？人们不禁要探问——

陆游自号放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陆游与范成大相识，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陆游于是年九月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而《渭南文集》卷四三《入蜀记》云：“至能名成大，圣政所同官。”此后，二人交往较密，范成大称赞陆游有“孤忠”（见《石湖居士诗集》卷九《送陆务观编修监镇江郡归会稽待阙》）。由于这种关系，陆游对范成大抱有希望，认为通过范成大可以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可是，多年的宦海沉浮已使得范成大圆滑多了，他少了一些豪气，多了一些闲情别致。在交往中，陆游发现范成大无意于恢复进取，范成大表示：“开边吾岂敢，口铁马秋风之谜自治有余巧。”（《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七《九月十九日衙散回谒大将及幕属饮清心堂，观晚菊，分韵得 字》）范成大这种安于仕宦、苟且偷安的态度，使陆游由希望变成了失望。

对于范成大的“自治有余巧”，陆游亦不敢恭维。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载：

（范成大）淳熙元年十月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初及境，言“吐番、南诏昔为唐患，今幸瓜分，西南无警二百年。近者雅州碉门蛮人寇败官军。乾道九年，吐蕃青羌两犯黎州，而奴儿结，蕃列等尤桀黠，轻视中国。臣当内教将兵，外修堡寨，仍讲明寨丁教阅团练之法，使人自为战，三者非财不可。”上手札奖励，赐度牒四十万缗公日夜阅兵，制器甲，督边郡，次第行之，时摘兵赴帅司，按其精粗，以黎为要地，奏置路，分督监，增五寨，籍少壮五千为战兵，经理岁余，凡吐蕃扰边径路十有八，悉筑堡置戍。对于范成大这种顾小失大之举，陆游是不赞同的。例如，淳熙三年八月，范成大为了夸耀自己筹边武功，在成都西南重建筹边楼，作为纪念。筹边楼原是唐文宗时四川节度观察使李德裕所建，当时土番叛乱，南诏犯境，李德裕建筹边楼，在其四壁图蛮夷及吐番险要，李德裕等天天策划于其上，故有此名。同年九月，范成大请陆游作《筹边楼记》（《渭南文集》卷十八），陆游在《筹边楼记》中没有提及范成大镇压四川西南边境少数民族之武功，只是夸范成大“洽闻强纪，擅名一时”，完全是敷衍的态度。

范成大既无意于恢复，便只能把陆游视为是“文字交”，陆游对于这种不被理解的境遇，十分痛苦。淳熙三年正月，陆游作《喜谭德称归》（《剑南诗稿》卷六），诗中有“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诸公荐文章，颇恨非素志”之句。

陆游曾把这种失望的心情向范成大吐露过，《渭南文集》卷五十有《双头莲》（陆游自注：呈范至能待制），词云：

华鬢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门俊游淮记？ 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门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纵有楚舵吴檣，知何时东逝？

空怅望， 美菰香， 秋风又起。

然而，我们见不到范成大家对陆游所说的“惊壮志成虚”有何表示，他给陆游安排的是一种美色加美酒的生活，《剑南诗稿》卷七有《锦亭》一诗，对此有一种暗有讽意的描写，诗云：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聳丞聳。

夜宴新亭海棠底，红云倒吸玻璃钟。

琵琶弦繁腰鼓急，盘凤舞衫香雾湿。

春醪凸盏烛光摇，素月中天花影立。

游人如云环玉帐，诗未落纸先传唱。

此邦句律方一新，凤阁舍人今有样。

在这里，陆游显然将现在的生活与昔时的南郑从戎相比。当年是“王师入秦驻一月，传檄足定河南北”；而今日，不过是“此邦句律方一新，凤阁舍人今有样”而已。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陆游只能以不拘礼法、耽于游放来渲泻自己的苦闷了。由于他与范成大的特殊关系，他处在一种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的窘境，他只能是随人所称，自号放翁了。须知，陆游的这种游放生活，并没有排遣掉他的苦闷，反而“看花身落魄，对酒色凄凉”（《剑南诗稿》卷十一《鹅湖夜坐书怀》）；因此，他自己也是不满意这种生活的，“颓然却自嫌疏放，旋了生涯一首诗”（《剑南诗稿》卷六《午睡》），他的颓放是出于苦闷和不得已，内心里何尝忘了经世呢？用陆游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浮沈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识此心。”（《剑南诗稿》卷七《书叹》）既然时人不识，只好寄希望于来者了。

时人确实不理解陆游。淳熙三年三月，陆游便因“恃酒颓放”而被免职了。

淳熙四年（1177）十月，陆游在成都作《赵将军》（《剑南诗稿》卷九）。陆游在诗序中说：“容为予言：‘靖康、建炎间，关中奇士赵宗印者，提义兵击虏，有众数千，所向辄下，虏不敢当。会王师败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济，大恸于王景略庙，尽以金帛散其下，被发入华山，不知所终。’予感其事，为作此诗。”陆游以容言为基础，写诗歌颂赵宗印渴望抗金大业能继起有人。钱仲联在注此诗时对赵宗印未置注语。那么——

赵宗印究竟何许人也？

陆游在诗序中认为赵宗印为靖康、建炎年间义军首领，然而，考之史料，赵宗印竟是临阵脱逃的一位懦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二载：

（建炎二年正月）戊子，金女真万户尼楚赫陷邓州。初，观文殿学士京西南路安抚使范致虚既受命，会河东制置使赵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关，欲趋行在，与致虚会于方城，因将其军偕至。致虚之未至也，转运副使右文殿修撰刘汲摄守事，营缮储峙，所以待乘舆之具甚备。时中原 忧，汲初受命，即遣家属还乡，益治兵为战守计，至是尼楚赫将压境，州兵不满万人，致虚闻风亟遁。汲除安抚使。语诸将曰：

“国家养汝曹，久不力战，无以报；且吾不令汝曹独死也。”士皆感奋。汲募敢死士得四百余人，乃遣兵马都监戚鼎以兵三千出东门迎敌，靳仪以兵九百出南门，赵宗印兵三千出西门掎之。汲以牙兵四百登阵以望，见宗印遁，即自至鼎军中，历其众阵以待。

敌至，士争死斗，敌为却。饿而仪亦败。敌以二军夹乘之，矢如雨。军中请汲去盖，汲不许，曰：“使敌知安抚使在此，乐为国致死！”敌大至，汲死之。

宗印率军民自房陵奔襄阳。事闻，赠汲太中大夫，后谥忠介。

据这段文字，赵宗印怯阵而逃，致使宋军兵败城失，客言“所向辄下，虏不敢当”之语，纯为子虚乌有。当时宋金混战，南北隔绝，陆游以客言为据写诗，不当责怪，但今之注家则应当考其究竟了。

陆游在蜀中的生活是相当浪漫的。由此，一些文人笔记中则出现了一些更为浪漫的记载，甚至出现了他因爱其诗才而纳驿卒之女为妾的情节。好奇心驱动我们去探问——

陆游因诗纳驿卒之女是否属实？

宋元之交的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记载：

陆放翁宿驿中，见题壁诗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放翁询之，驿卒女也，遂纳为妾。方余半载，夫人逐之。妾赋《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晓起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

这段风流韵事固然浪漫，但前人已辨其伪。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读》卷十三云：

“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小说载此为蜀中某驿卒女诗，放翁见之，纳以为妾。为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词：“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云云。按《剑南集》，此诗乃放翁在蜀时所作。前四句云：“西风繁杆 征衣，客子关情正此时。万事从初聊复尔，百年强半欲何之？”“玉阶”作“画堂”，“闹”作“怨”。后人稍窜易数字，辄付（附）会，或收入闺秀诗，可笑也。

王士禛所驳甚是。“玉阶蟋蟀”云云，见《剑南诗稿》卷八，题作《感秋》，作于淳熙四年七八月间。但也有人不知真伪，据《随隐漫录》所记而妄下评论。如，宋长白《柳亭诗话》卷十一云：“务观前妻见逐于其母，此妾又见逐于其妻，钗头双凤，大小一揆，庐江吏、冯敬通，殆合而为一身者乎？”这委实是贻笑大方之论。

无风不起浪。问题是，这件风流韵事被杜撰出来的背景是什么？

首先，宋人割裂《感秋》为绝句，造陆游纳驿卒女为妾之流言，诚不可信，然陆游确有蜀女为妾。《渭南文集》卷三三《山阴陆氏女女墓铭》云：“淳熙丙午秋七月，予来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女所生母杨氏，蜀郡华阳人。”淳熙丙午为淳熙十三年（1186）。

其次，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有一条记载与此相关。该书云：

蜀倡类能文，盖薛涛风也。放翁有客自蜀挟一妓归，蓄之别室，率数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颇疑之。客作词作解，妓即韵答之云：“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因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的？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会闲，又那得功夫咒你！”或谤放翁尝挟蜀尼以归，即此妓也。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客人之妓颇能文辞，而此事又被人别有用心地归之于陆游，那么，割裂陆游之作以生发出一段风流韵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陆游在蜀中时也确曾混迹歌院青楼。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我们不妨读一下《剑南诗稿》卷四的《成都行》：

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
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
青丝金络白马驹，日斜驰遣迎名姝。

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鬟半脱娇不梳。
吴绫便面对客书，斜行小草密复疏。
墨君秀润瘦不枯，风枝雨叶笔笔殊。
月浸罗袜清夜徂，满身花影醉索扶。
东来此欢堕空虚，坐悲新霜点鬓须。

易求合浦千斛珠，难觅锦江双鲤鱼。这首诗作于乾道九年。此时，王炎幕府已散，陆游的北伐之梦又一次破灭了，他在酒肆歌院中排遣着自己的苦闷，这是特定环境、特定心态下的一种特殊行为，表现了传统士大夫的一种思想局限。类似的作品还有《春愁曲》（《剑南诗稿》卷四）、《风流子》（《渭南文集》卷五），我们就不再引录原文了。

总之，陆游因其诗才而纳驿卒之女为妾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它的出现也是有其原因的。南郑从戎之后，陆游在蜀中确实有些放浪。陆游与李白一样，除好酒之外，还好名姬。

淳熙五年（1178）秋，陆游自成都抵临安，孝宗即召对便殿，但终未能重用陆游，将其外放为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治在建州（今福建建瓯）。淳熙六年，又改命他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治在抚州（今江西临川），陆游于是年十二月到任。淳熙七年十一月，孝宗把陆游召还，行至严州寿昌县界时，为给事中赵汝愚所驳，被免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职务，得旨不必入奏。那么——

陆游为何被罢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这一职务？

《宋史》本传云：“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奏拔义仓振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召还，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与祠。”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元方回《桐江集》卷四《跋所抄陆放翁诗集后》云：“予闻诸前辈，放翁入蜀从范石湖（即范成大——引者），后出蜀，携成都妓荆为尼而与归。赵汝愚尝帅蜀，必以此事驳放翁也。”依此，陆游此次被罢是因为行为不检点。二说相悖，何说为实呢？

首先应当指出，赵汝愚以陆游携妓出蜀为由予以封驳，此事实不足信。查《宋史·孝宗本纪》及《赵汝愚传》，赵汝愚知成都府兼四川制置使在淳熙十二年十二月，而陆游被赵汝愚所驳，则淳熙七年底，此时赵汝愚尚未帅蜀，何以知陆游日后当携妓而归？而且，陆游的私生活也不至于如此荒唐。他有一妾，《剑南诗稿》卷三八《戏作贫诗》有“妾病常停织”之句。此妾为蜀郡华阳人杨氏，据《渭南文集》卷三三《山阴陆氏女女墓铭》，杨氏曾生子布、子 ，又生一女名定娘。陆游在成都时写有《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见《剑南诗稿》卷七），诗中有“室无摩诃持花女”之句；东归后也说：“家无钗泽穷冯衍，身着 裙老管宁。”（《剑南诗稿》卷十八《休日感兴》）此句诗用东汉冯衍之典。据《后汉书·冯衍传》，冯衍“娶北地女任氏，为妻悍忌，不得蓄媵妾。”开禧三年，83岁的陆游写下《次韵李季章参政哭其夫人》（《剑南诗稿》卷七三），诗中有“九十老翁缘底健？一生强半是单栖”之句。以上所引，均不见其有携妓疏放的迹象。陆游在私生活方面的严肃，很受人称颂，江湖诗人苏 《冷然斋诗集》卷三有《次韵高秘书谒陆待制二首》，其二云：

海上三神宅，人间陆放翁。
谈谐诗雅 ，任己易屯蒙。
松竹当姬侍，鸥禽是仆童。
后来那可计，应有不如公。

从这些材料来看，陆游“携成都妓荆为尼而与归”之说，显系不实之辞。

淳熙三年，陆游为蜀帅范成大参议官时，曾因被视为“恃酒颓放”免官，淳熙七年赵汝愚之驳是不是旧事重提呢？这也与情理不通。陆游东归之后，已任官职，似不应再于旧事纠缠不休。

细读《宋史》本传，陆游被罢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之职，当于赈救灾民有关。

提举常平茶盐公事职掌一路的常平义仓，视年岁的丰歉，或敛或散，以惠农民。商人有滞货，政府收购起来，再卖出去，以平物价，这就是陆游所谓“敛散视丰凶之宜，阜通去农未之病”（《渭南文集》卷九《福建谢史丞相启》）。但是，由于南宋政权吏治腐败，义仓的谷米往往被移作他用；或者，荒歉年时，义仓的谷米发放之后，南宋政府不再如数拨款补充。因此，

常平义仓积粟不多，在“惠民”方面很受限制。

陆游于淳熙六年十一月到任，淳熙七年五月，江西就发生了大水灾。这年入夏以来，阴雨绵绵不断，江水暴涨，受灾地区相当大。《剑南诗稿》卷十二有《大雨逾旬，既止复作，江遂大涨》，描绘的正是灾情之严重，其二云：

一春少雨忧旱，熟睡潭坐龙懒。
以勤赎懒护其短，水浸城门渠不管。
传闻霖潦千里远，榜舟发粟敢不勉。

空村避水无鸡犬，茆舍夜深萤火满。陆游在诗后自注云：“民家避水，多依丘阜，以小舟载米赈之。”据《宋史》本传，陆游一方面拨义仓粮赈济，一方面又给江西地方官下令，迅速给灾民发放粮食。可以说，在整个抗灾赈救过程中，陆游的表现是出色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陆游竟因此而被罢免了呢？我们推测，陆游在此次赈灾中肯定有某种越权之举。据《宋会要辑稿》，淳熙八年三月，陆游有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之命，为臣僚论罢，其理由为“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既然“所为多越于规矩”并非指“携妓”或“颓放”，那么，它只能是指陆游在情急之时先行后奏的“大胆妄为”了。可惜，这其中的细节我们还未款探究清楚。

值得钦佩的是，陆游虽因赈灾之事而再度回乡闲居，但他却不悔所为。第二年，即淳熙八年，浙东水灾、旱灾相继不断，饥民遍地。宰相王淮推荐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陆游即作《寄朱元晦提举》（《剑南诗稿》卷十四），希望他早日来赈，并放宽对人民的征科期限，诗云：

市聚萧条极，村墟冻馁稠。
劝分元积粟，告未通流。
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征科得宽否？尚及麦禾秋。
真可谓一片赤诚，为民请命。

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陆游祠禄将满，陈乞再任，起知严州，过阙陛辞，来到临安。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记云：“放翁在朝日，尝与馆阁诸人会饮于张功甫南湖园。酒酣，主人出小姬新挑者，歌自制曲以侑尊。以手中团扇求诗于翁，翁书一绝。云：‘寒食清明数日中，西园春事又匆匆。梅花自避新桃李，不为高楼一笛风。’盖戏寓小姬名于句中，以为一笑。当路有恙之者，遽指以为所讥，竟以此去。”那么——

陆游果真因题扇诗而被罢职么？

其实，周密所云是未中要害的。

《浩然斋雅谈》中所提到的张功甫，是循王张俊之孙，名 。一字时可，号约斋，又号南湖。他虽是官僚子弟，但有能诗之声。他广交了当时的名诗人，和辛弃疾交谊也深厚。他相当推崇陆游，称其为“江汉万古词源流”（《陆编修送月石砚屏》，《南湖集》卷二）。淳熙八年，张 曾向陆游投诗请教，陆游教育他“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君今已似骥 云，更看他年鲲击水”（《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剑南诗稿》卷十三），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淳熙十年冬，张 要来三山面谒，陆游作有《张功甫许见访，以诗坚其约》（《剑南诗稿》卷十五）。

淳熙十三年春，陆游在临安与张 相逢了，心情自然十分高兴。而张 好客又好诗，免不了邀高朋至宅舍饮酒吟诗。戴表元《判溪集》卷十《牡丹席诗序》云：“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渐渐修还承平阁故事，而循王孙张功父（甫）使君以好客闻天下。当是时，遇佳风日，花时月夕，功父必开玉照堂置酒乐客。其客户陵杨廷秀，山阴陆务观、浮梁姜尧章之徒以十数。至，辄欢饮浩歌，穷昼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或乐府词累累传都下，都下人门抄户诵，以为盛事。然或半旬十日不尔，则诸公嘲呀问故之书至矣。”由此可知，时人视南湖园之会为“盛事”，并无什么不良影响。

况且，陆游此次进京，极受孝宗欣识——当然，仅限于文学方面。张 《南湖集》卷三《杨秘监为余言……》诗中自注：“陆丈赴官，陛辞日，上曰：‘严陵清虚之地，卿可多作文。’”《宋史·陆游传》也载孝宗之语：“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当然，陆游此次进京乘趁机向孝宗上书（见《渭南文集》卷四《上殿札子》），言民间疾苦和积极备战北伐的计划，其严州之任命，实为大材小用。杨万里对此曾评论说：“乃是故人陆浚仪（陆云字士龙，曾做过浚仪令——引者），诗骨点化黄金丹。宜谓天禄贲刘向，不然亦合云台上。却令去索催租钱，枉却清风明月三千篇。”（《再和云龙歌，留陆务观西湖小集且督战云》，《诚斋集》卷十九）杨万里认为，陆游在学问上可比天禄阁校书刘向；在武功方面，如果抱负得展，也可以建立功名，如同东汉功臣那般画像云台（《后汉书·马武传》附以邓禹为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说：“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可是现在却去严州催租钱，这令人惋惜不已。然而，严州之任命在前，与随后的张功甫南湖之宴无关。

淳熙十三年春，陆游在临安小住后确曾返回山阴，《剑南诗稿》卷十七有《还家》二首，其二云：

天津桥上醉骑驴，一锦囊诗一束书。
作客况当初病后，还家已过暮春初。
泥深村巷谁人顾，革满园畦手自锄。

不为衰迟思屏迹，此心元向名利疏。

不过，此次还家并非因谗言而“去”，而是回乡候阙。是年七月，陆游结束了五年的闲居生活，离别山阴赴严州。宋陈公亮《严州图经》卷一载：“陆游淳熙十三年七月初三日以朝请大夫权知，淳熙十五年七月初六满。”可见，陆游并未因题扇诗而罢知严州的任命，甚至也并未因此而被提前解职。陆游是任满而去的。

若把周密所谓“竟以此去”理解为严州任后之事，也与情形不符。陆游严州任后曾回山阴小住，随后又被召至临安。《宋史·陆游传》：“再召人见，上曰：‘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军器少监。”关于陆游的这次就任新职，周必大《奉诏录》卷七记载云：

淳熙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御笔”问：“陆游除郎不致烦言否？恐或有议论，且除少卿如何？”回奏：

“臣昨来与二参商议，只是奏本人任满多日，未审欲与何差遣？陛下爱怜其才，便欲除郎。臣曾奏知，莫若且令奏事。近询众论，谓处以闲曹如驾部之类，亦是示陛下不弃才之意。如后来烦言，非臣所知。只与外任，亦无不可。圣意若留陆游作少监，偶李祥允乞外，自可令填此阙。”

淳熙十五年冬，陆游就任新职——军器少监。可见，即使在严州任满后，陆游也并未因南湖题扇诗而“竟以此去”，反而住进临安、成为一名京官。

然而，孝宗淳熙十六年十二月，近年来颇受孝宗照顾的陆游为谏议大夫何澹所弹劾，以作诗“嘲咏风月”罪被斥归。第二年，陆游在山阴作《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剑南诗稿》卷二四）。诗云：

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

放逐尚非馀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又：

绿蔬丹果荐瓢尊，身寄城南禹会村。

连坐频年到风月，固应无客叩吾门。读罢诗文，使人觉得陆游此番被斥归确实与作诗不严肃有关，但我们为什么要说周密《浩然斋雅谈》所记未中要害呢？关键在于，淳熙十六年二月，南宋都城发生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赵 传位于皇太子赵 （即光宗），而陆游被斥归正与此事有关。

我们首先应明白，赵 内禅是一件很不情愿的事。《西湖志馀》卷二载：

光宗在鹤禁，意望内禅，终难发言，数击鲜于慈福太后。太后疑之，询近侍曰：“大哥屡排当，何故？”旁有奏曰：“意望娘娘为趣上耳。”顷之，寿皇至东内，从容间，语上曰：“官家也好早取乐，放下与儿曹。”上曰：“臣久欲尔，但孩儿尚小，未经历，故不能与之。不尔则自快活多时矣。”后不能强，语光宗曰：“吾尝谕乃翁，渠所见乃尔。”光宗岸帻稟曰：“臣发已白，尚以为童，则罪过翁翁。”盖言高宗逊寿皇于盛年也。

文中的慈福太后，即高宗后吴氏；寿皇即孝宗。高宗赵构本无亲生骨肉，赵 及其抱养之子，绍兴三十二年，赵构传位于赵 ，赵 时年31岁。而

此时赵 已过而立之年，有些迫不及待地等待内禅了。

关于这次禅位，《四朝闻见录》也有一条记载：

光皇春秋已高，又自东官尹天府，入侍重华，从容启上曰：“有赠臣乌髭须者，臣未敢用。”上语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

赵 真是胆大妄为，请奶奶逼父亲退位不行，便亲自来逼宫了。出于无奈，孝宗准备内禅了。但他决定在内禅之前将后事安排好。于是， 熙十六年正月，以周必大为左丞相，留正为右丞相，命于华文殿修《高宗实录》，陆游被命兼实录院检讨官。二月，正式举行内禅大典，赵 即位，时年41岁。赵 于内禅前一天除授陆游为礼部郎中，这是他27年皇帝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任命。由此，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乙集称陆游“其得上眷如此”！

一朝天子一朝臣。光宗即位伊始，便开始动手清洗父亲的“遗产”。淳熙十六年五月，周必大罢相，此后，周系官员陆续落马。《宋史·何澹传》载：“孝宗内禅，（何澹）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澹本周必大所厚，始为学官，二年不迁，留正奏迁之，澹恨必大。及长谏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尝与所善刘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岂无可论，第其门多佳士，不可并及其所荐者。’澹不听。”看来，清洗到陆游头上是在所难免的了。其实，早在这年晚春，陆游在其《仪曹直庐》一诗中，已有“谗波虽稽天，未遽妨人狂”之句，足见其时已有人在制造舆论，迫使他下台。但那时，好友周必大尚在职，攻讦者对之无奈。周必大下台后，情形就不同了。《宋会要辑稿·黜降九》载：（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礼部郎中陆游、大理寺丞李端友、秘书省正字吴镒并放罢。以谏议大夫何澹论游前后屡遭白简，所至有污秽之迹；端友凡所历任，略无善状；镒轻薄浮躁，专以口吻劫持为事。故有是命。

这年十二月，陆游回到了故乡。

综上所述，陆游此次被罢任，主要是由于在孝宗与光宗的父子之争中被视为周党，与张园题扇诗并无关系。即使弹劾者举证出那首小诗，也不过是拼凑罪状而已。况且，如果没有那首小诗，弹劾者也会找到其他诗篇来进行弹劾的。

马令是北宋末年宜兴人，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旧事。他有感于当时修南唐史事者“忘远取近，率多疏略”（马令《南唐书》自序），于是撰《南唐书》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指出：马令书“略备纪传体”，“书法亦谨严不苟”，见闻广博；但是，马书在材料取舍、人物事件评价等方面不尽如人意，而且“于诗话小说不能割爱，亦不免芜杂琐碎，自秽其书”。也许，陆游正是因其不够完善，才重撰《南唐书》的。历代学者比较马、陆二书，多是陆非马，推奖陆书。明人胡震亨说，“余始得马令《南唐书》，以为正可作酒后谈资耳。及得陆游《新修南唐书》读之，乃知正史稗官迥自悬别，未可以伪史忽之”。（《丛书集成》本《南唐书》题辞）有人甚至将此书与欧阳修的《五代史》相比。人们不禁要问——

陆游《新修南唐书》为何受到如此推崇？

首先，陆游撰此书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希望南宋统治者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非常注重历史经验的借鉴，正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责任感在陆游身上有十分强烈的表现，他认为“学者当以经论天下自期”（《渭南文集》卷二六《跋文武两朝献替记》），因而仰慕伊尹、姜尚、诸葛亮、王猛等人，渴望自己也能如同他们那样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兴邦治国，大济苍生。这一思想基础使他注重总结南唐王朝的盛衰得失，以为南宋政权提供借鉴。

陆游认为，南唐之初，由于政策措施得当，南唐因而强盛。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对当时的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盼望安定，社会需要秩序。南唐烈祖李升认识到了这种时代的要求，以此获得实力与民心。《新修南唐书·烈祖纪》说：“时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专事军旅。帝独褒廉吏，课农桑”，“罢去苛政，与吾民更始”，一时“上下悦服”，大得人心。李升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又恭行节俭，不营造新京和宫殿，至其逝“终不改作”，日常“蹑蒲履，用铁盆盎，暑月寝殿施青葛帷”，“左右官婢才数人，服饰朴陋”。陆游认为李升“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焉”，可与汉文帝相比。陆游写下这些笔墨，不仅要与南唐之末的骄奢作对比，也是要与南宋苟安政权的醉生梦死作对比。《剑南诗稿》卷三九有《读晋书》，诗曰：

诸公日饫万钱厨，人乳蒸豚玉石无。

谁信秋风 城里，有人归棹为尊鲈。

同书卷五一有《读夏书》，诗曰：

巨浸稽天日沸腾，九州人民若丘陵。

一朝财得居平土，峻宇雕墙已遽兴。这些读史诗皆是缘于现实而作，可与他在《新修南唐书》中对李升的颂扬互为表里。

陆游对李升虚心纳谏、慧眼识才也极为推崇。当李升还只是升州刺史之时，就“招延四方士大夫，倾身下之”；辅佐吴政时，“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及琴奕游戏之具，以延四方贤士，政事之暇，多与讲评古今”（《新修南唐书·陈觉传》）。南唐政权建立后，李升一方面安抚拉拢吴政权的旧臣，一方面也要稳固自己的基础，因而更重视招徕四方秀杰。李升对宋齐丘的恭礼可为一例。李升称呼他一向“字之而不敢名”，而“一语不合，（齐丘）则挈衣筒望秦淮门欲去，（李升）追谢之乃已”。（《新修南唐书·孙晟传》）在这种气氛之中，人臣敢谏，君王善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陆游慨叹说：“区区江淮之地，有国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后世追考 犹谓国有人焉。盖自烈祖以来，倾心下士，士之避乱失职者，以唐为归。……”

是诚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气、名人类者，乌得不以死报之耶！”

对于南唐的灭亡，陆游有独到的见解。传统看法认为，南唐是因其弱小而被强大之敌国所吞灭的，陆游却另有见地。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所处的地理条件比其他各国要优越得多；而且，南唐自称大唐宗室（李升为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对天下的号召力也令其他各国望尘莫及。如果用人得当、抓住时机，确实能与中原皇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鹿死谁手是难以预料的。不幸的是，南唐后期用人不当，党争不止，以致不但无力逐鹿中原，反倒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最终灭亡了。陆游在《新修南唐书·元宗纪》中评论说：

元宗举闽楚之师，境内虚耗。及契丹灭晋，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国力，既已弗支，熟视而不能以出。世以为恨。予谓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闽，楚昏乱，一举而平之，然后东取吴越，南下五岭，成南北之势，中原虽欲睥睨，岂易动哉？不幸诸将失律，贪功轻进，大事弗成，国势遂弱，非始谋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

陆游的这段评论是很有道理的。

有感于南宋当时的政局，陆游对南唐后期的用人不当与党争内耗，用笔尤多。陆游在《李金全传》中写道：“闽楚之役，用事者皆少年，不更军旅，复相败踵。周人乘我疲敝，攻取淮南，国势衰削，不能复振”。让这样一些人掌握军队，南唐用师闽楚犹丧败若此，若北向而争天下，与秦晋赵魏之师战于中原，胜负就可以预知了。陆游在《朱令 传》中评论说：“金陵之被围也，以守备任皇甫继勋，以外援付朱令 。继勋既怀二心，而令 孺子，复非大将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间死，卢绛得当攻守之任，胡则、申屠令坚辈宣力围城中，虽天威临之，岂易遽亡哉！然则江南虽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独乘其任人乖刺而已”。

陆游认为，南唐后期的用人不当、党争内耗与始于元宗的赏罚不明、纲纪败坏有很大关系。陆游在《朱元传》中评论说：“亡国之君，必先坏其纪纲，而后其国从焉。方是时，疆场之臣非皆不才也。败于敌未必诛；一有成功，谗先杀之。放强者玩寇，弱者降敌，自古非一世也。”朱元才兼文武，早年上书言事，很见非凡，但当政者嫉其言，相与诋毁。后周军犯淮南时，朱元从齐王景达救寿州，破后周军于舒、和二州，军功卓著，但遭受监军使陈觉的嫉忌而被夺去军权，迫使他一气之下投降了后周。此后，淮南的战局就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南唐元宗只好割地求和，臣事后周，使南唐“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陆游的此番议论，显然是针对南宋政权的，用人不当，赏罚不明，党争不止，纲纪败坏，这正是南宋政权的生动写照。

其次，陆游的《新修南唐书》在编撰体例上也有独到之处，表现了陆游非凡的史识。

在陆游之前，马令的《南唐书》自烈祖李升以下谓之“书”，胡恢的《南

唐书》则谓之“载记”。前者是仿照《三国志》的体例，把南唐比作三国时期的吴、蜀；后者是用《晋书》的体例，把南唐比作两晋时期的十六国。而陆游却以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的体例，为南唐三帝立了本纪。在这里，书、载记与本纪之争，并不是名词之争，也不是单纯的史书体例问题，其中包含有政治内容，即正统之争。称之为“书”或“载记”，便是不承认其具有正统地位。赵构南渡后，宋朝偏安江南（即南宋），与南唐有某种相似之处。否认了南唐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动摇了南宋的正统地位；而抬高南唐，为之立本纪，认为它具有正统地位，实际上也就抬高了南宋，不承认当时占据中原的金国具有正统的地位。陆游生活在大敌压境的南宋时代，他对于这一问题极为敏感，因此才为南唐三帝立本纪。并在《烈祖本纪》之后的“论”中，不论李升的功业，专论前两部《南唐书》体例之不当。在这种体例之争背后，我们可以领悟到陆游的超人史识。

《新修南唐书》在列传的编排上很有特色。《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后妃诸王传置之群臣之后，杂艺方士传列于忠义之前，揆以体例，亦有未允。”其实，这是一种迂腐之论。后妃诸王列传为何非居群臣列传之前？忠义列传为何非居杂艺方士列传之前？陆游在安排列传的顺序时，既考虑到其人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又考虑到其是非功过。后妃诸王的事迹平平，无大功过，与南唐的兴亡关系不大，放在群臣列传之后亦无不可。况且，《汉书》后妃事迹收在《外戚传》里，即列于群臣之后，其诸王传亦多分列于各朝群臣传后。关于忠义传，陆游于传前先有申明：“古史官书忠义、孝行、列女各为传，南唐偏方短世，又史牒放逸，不能尽见，摭其仅可书者，合为节义传。”再说，忠义列于杂艺方士之后，亦有先例。《后汉书》即置《方术传》于《逸民传》之前。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认真阅读《新修南唐书》，可以发现陆游在人物的先后顺序上颇有用心。全书卷四至卷十五为群臣列传，陆游置宋齐丘于列传之首，与马令《南唐书》把宋齐丘归入《党与传》的做法不同。宋齐丘是南唐烈祖李升建国过程中的首席谋士，但他“好权利，诡譎，造虚誉，植朋党，矜功忌能，饰诈护前，富贵满溢，犹不知惧，狃于要君，暗于知人”。同时，陆游把善谈惑主的魏岑放在最后，中间正邪相间。这种编排法，令人初读莫得其意绪，久之便得其味，知是用心“深著南唐之所以亡，垂戒后世也”。（清人汤运泰《南唐书笺注序》）。近人刘承干在《南唐补注》卷十五中还说：“列传前宋后魏，延己、文徽等分布其间，而一二正人说士动辄掣肘，编次间隔，亦《春秋》微显之义也。”

最后，《新修南唐书》在史料的增补保存方面也有巨大价值。由于陆游对南唐史料的长朗搜集整理，陆游的《新修南唐书》与同类著作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南唐史料。明人沈士龙在《南唐书题辞》中对马令、陆游的著作进行了比较：马令书较之陆游书，“刘仁贍无夫人五日不食死，汪文慰不载奏疏，景遂无弘冀行鸩，刁彦能无子 孙约，徐锴传廖廖数语，陆皆补考

无遗。其它如申屠令坚之不拜吴越王，张雄之满门死难，乔匡舜之极谏亲征，张仪方之力振纪纲，欧阳广之疏劾边镐，高远之料楚难守，陈褒之十世同居，此皆马书所无，赖务观以显。”这些史料的出处多已久佚，又为仅存的南唐史另一专著——马令《南唐史》所不载，陆书的史料价值就尤为可贵了。

陆游《新修南唐书》在史料方面的丰富性，与他在收集文字资料之外重视调查访问分不开的。在《新修南唐书》中，这种得自调查访问的材料很多。如《廖居素传》云：“后几百年，将乐父老犹叩头称之。”这是陆游在福建做官时了解到的情况。在《刘仁贍传》后的“论”中，陆游谈及寿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时事及其夫人不食五日而死，这也是亲自访来的材料。为了替刘仁贍辩诬，他在四川任职时，特地访问过藏有周世宗除仁贍天平军节度使制书的梓潼令金君，弄清后世诬传是靠不住的。在《杂艺方士列传》中，陆游记“耿先生”事时说：“金陵好事家，至今犹有耿先生写真云”。这自然也是从访问中得到的材料。

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原因，陆游的《新修南唐书》很受后人重视，注家迭出，如李清、汤运泰、周在浚、高醇、刘承于等纷纷笺注或补注此书，评论者也不少，毛晋认为陆游“得史迁（史迁即司马迁——引者）家法”。此语确实不虚。

三、躬耕垅亩之谜

陆游自礼部罢归之后，重新回到镜湖之三山，开始了再一次的闲居生活。时 65 岁。

他似乎有些疲倦，屏居湖上，罕与人交，希望在故乡的湖光山色中，暂时忘掉自己的烦恼。由于生活的窘迫，不得不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与农民有了密切的交往。有感于故乡山阴淳朴的民风民情，有感于自然山水的毓秀钟灵，陆游发现：“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正所谓，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寻，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就是在这个时期，陆游对山水有了独到的理解与认识，打通了中国古代山水诗走向心灵的坦途。这真是：有意栽花，奔波官场竟无成；无心插柳，峰回路转又一村！

然而，诗人并没有忘却世事，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嘉泰二年（1202），陆游再次出仕，参与编修国史，抱着参加抗金政府的幻想再赴临安。次年，由于失望，重归故乡。可以说，这次出仕是陆游风烛之年的最后一搏，他这把年纪的人，早已看淡了功名利禄，心中牵念的只有恢复中原。可是，偏偏有人讥其晚节不保。以己度人是轻而易举之举，要洞悉伟人的心灵绝非轻松之事。陆游问心无愧，不屑置辩。

开禧北伐失败之后，陆游宝谟阁待制半俸被剥夺，诗人已经是真正的心力憔悴了。嘉定二年立秋以后，他得了膈上疾，近寒露，始稍愈。十月底，又病倒，十二月末便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写下了绝笔之作——《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

出师未捷身先死，诗卷长留天地间。陆游去世 79 年之后，苟安于一隅的南宋政权灭亡了，而诗人却走向了辉煌，他凭借诗文为自己留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为的丰碑。

《说苑·建本》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陆游晚年增根据这个故事将自己的读书室命名为“老学庵”。

然而——

“老学庵”的命名时间究竟在哪一年？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之编者认为，放翁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立老学庵。该书第8页至第9页录朱熹《答巩仲至》的几封书信。其第四书云：“向已许为放翁作《老学庵铭》，后亦不复敢著语。”其第十七书云“方欲往求一文字，或恐以此贱迹之为累，未必肯作耳。”其第十八书云：“放翁久不得书，欲往从觅一文字，所系颇重；又恐贱迹累其升腾，未敢启口也。”编者加按语说：“放翁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立老学庵。此时正值韩胄当权，排斥赵汝愚、朱熹等，并严‘伪学’之禁。观朱熹书中所言曾许为放翁作者学庵铭，至是不敢复作，以及‘贱迹为累’、‘恐贱迹累其升腾’等语，盖均为此一时间所作。”

翻检《剑南诗稿》，其卷三三有《老学庵》一首，诗云：

穷冬短景苦匆忙，老学庵中日自长。

名誉不如心自肯，文辞终与道相妨。

吾心本自同天地，俗学何知溺 糠。

已与儿曹相约定，勿为无益费年光。钱仲联先生认为这首诗“庆元元年冬作于山阴”。然而这首《老学庵》本身并未注明写作年月，怎么就断定它一定作于庆元元年呢？也许，这首诗的前面有《山行》一诗，《山行》可断定为庆元元年的作品。但是，即使此诗确实作于庆元元年，也不能由此证明老学庵就是在这一年命名的。因为，这首诗既可以是在老学庵命名时所作的抒怀之诗，也可以是陆游后来对老学庵的题咏。仅以此诗为据是不妥的。

另一面，朱熹许诺为陆游作《老学庵铭》之时，并不一定是陆游初始命名之时，因为，陆游完全可以在命名一段时期之后再找人为之作铭。老学庵命名于庆元元之说不足取。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六载宋刻本《老学庵笔记》陆游次子 跋语说：“《老学庵笔记》，先太史淳熙、绍熙间所著也”。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所载同样的陆子 跋语，则无“绍熙”二字。由陆子 的跋语可以看出，“老学庵”的命名，当在比宋宁宗庆元元年更早的淳熙、绍熙年间。

郭光先生在《陆游传》中说：

陆游自礼部罢归之后，重新回到镜湖之三山，开始了再一次的闲居生活。……陆游又自治地开药圃、蔬圃，取名东篱。在舍东种桑百棵，种竹十亩。罢归后的第四年绍熙三年（1192）十月，在竹间葺小庵两间，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名叫“老学庵”，读书其中。

朱东润先生的《陆游传》中也有同样的说法。

这种说法可以从陆游本人的诗作中找到支点。《剑南诗稿》卷二六有《题老学庵壁》，诗云：

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茹只数椽。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太平民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睡眠。

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这首诗是绍熙三年冬所作。

绍熙三年说虽比庆元元年说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仍有可疑问之处。《题老学庵壁》一诗只能证明其时老学庵之斋名已有，并不能证明作诗之时为老学庵命名之始，因为，这首诗仍有可能是命名后之作。

其实，老学庵之命名当在绍熙二年正月至同年六月之间。《渭南文集》卷二有《桑泽卿砖砚铭》，文云：

古名砚以瓦，今名砚以砖。瓦以利于用，砖以全其天。砖乎砖乎，宁用之钝而保其全乎？尚无愧之，日陈于前。

陆游在文后自注云：“放翁铭桑甥泽卿砚砖。绍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学庵书。”可见，老学庵之名至迟在绍熙二年六月九日已经确定。

我们知道，陆游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末，为谏议大夫何澹所劾，罢官归乡；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秋，陆游曾立风月轩（见《剑南诗稿》卷二一）；又次年，即绍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陆游作《跋郭德谊书》（见《渭南文集》卷二七），署为“笠泽老渔”；以后至同年六月九日，陆游未曾有另外之署名。依古代文人习惯，每立一斋名堂号，常常喜爱很快便在诗文中用之。据以上情况，老学庵之命名，当在绍熙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同年六月九日之前。

口躬耕垅亩之谜据日本古代的一些文籍记载，明朝成化年间，日本国王源义政国文籍焚于兵火，特地咨大明礼部文，要求赠与中国文籍，所开列的书目中就有《老学庵笔记》。那么——

日本人为何爱读《老学庵笔记》？

《老学庵笔记》是以陆游晚年书斋老学庵命名的。老学庵在镜湖之畔，背环青山，前临碧水，安适静谧。陆游读书广博，阅历丰富，见闻极多，《老学庵笔记》所载，多是他亲见或亲闻之事（也有读书之心得），内容真实丰富，笔调流畅优美，是宋人笔记中的佼佼者。

《老学庵笔记》并非陆游闭门读书之作或消遣自娱之笔，他针砭时弊，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陆游的政治倾向在记叙中有充分地流露。我们选出几例以供一读。

《老学庵笔记》卷一：

建炎维扬南渡时，虽甚仓猝，二府犹张盖塔城坐而出，军民有怀砖狙击黄相者。既至临安，二府因言：“方艰危时，臣等当一切贬损。今张盖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并权省去，候事平日依旧。”诏从之。实惩维扬事也。

文中的黄相，是指黄潜善。建炎三年（1129）扬州溃退之时，黄潜善、汪彦伯为相，力主和议，在军事上不作任何准备，甚至在临时都城的维扬（扬州）附近都没有派出警哨，敌军打到城下时才发觉，仓皇南逃，军民死伤不计其数。而黄潜善在逃跑时还大摆宰相架子，因此遭到军民的狙击。陆游记下这一细节，表达对这次南逃事件的无限愤慨。

《老学庵笔记》卷一：

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此条虽文字不多，但对比鲜明，内容丰富。岳飞被秦桧害死之事，众人皆知、不须多谈。范琼是建炎初年的带兵大将，在金兵面前吓破了胆，望风而逃，时人讥之曰：“此将军岂解杀敌，惟有走耳。”不仅如此，范琼在败逃路上焚掠州县，残杀守官，图谋不轨，宋高宗采纳知枢密院张浚（字德远）的建议，捕杀了范琼。人民群众敬惜爱国屈死的岳飞，痛恨死有余辜的范琼，人心昭昭，是非确有公论。

南宋之初，秦桧当权，卖国求和，激起公愤。《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秦会（桧）之当国，有殿前司军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斩马刀邀于望仙桥下斫之，断轿子一柱而不能伤。诛死。其后，秦每出辄以亲兵五十人持挺卫之。初，斩全于市，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

陆游的记叙是带有幽默感的。施全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勇者，“朗言”者讲的则是反语，真正的意思是可惜未把秦桧杀死，“闻者皆笑”之“笑”，是一种会心的笑，表达了时秦桧的愤恨之情。陆游正是以这一故事表露了自己对投降派的仇视之情。

对于坚持抗战、反抗奸臣的仁人志士，陆游满怀赞叹之情，而对于那些

色厉胆虚的假义士，陆游则极尽嘲讽之能事。《老学庵笔记》卷一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学至忘寝食，经史冬成诵，喜大骂极谈。绍兴初，招徕直谏，无所忌讳。德昭对客议时事，率不逊语，人莫敢与对，而德昭愈自若。晚来临安赴省试，时秦会（桧）之当国，数以言罪人，势焰可畏。有唐锡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门茶肆中，素恶其狂，乃与坐，附耳语曰：

“君素号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德昭大骇，亟起掩耳曰：“放气，放气！”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这个故事读来令人捧腹。它一方面反映出秦桧“数以言罪人”的嚣张气焰，也揭示出毛德昭“无所忌讳”之妄。

《老学庵笔记》除了具有强烈的思想性之外，还有广泛的知识性，书中有大量篇幅是记载当时的名物典章制度的，内容相当广泛。例如卷三、卷十谈编修《太祖实录》、朱墨本《神宗实录》的经过，卷七记教官出试题错引麻沙版本上的讹字，卷八记宋初流行的“《文选》烂，秀才半”之语，卷二口陆游悬案揭秘记陂池的兴废，卷五记靖康年间出土的原始墓葬瓦棺葬，卷六记四川茂州雪蛆，卷三记辰、沉、靖州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描述他们踏歌醉舞的社交生活。这些文字都是研究宋代文化的宝贵资料。

陆游的写作态度是相当认真的。《老学庵笔记》卷二有这样一条：

淮南谚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验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鸡寒上距，鸭寒下嘴耳。”上距，谓缩一足；下嘴，谓藏其于翼间。

陆游就是这样注意向当地群众学习，以实地观察了解，来获得新的知识，印证从书本上或听闻中得到的知识。《老学庵笔记》卷二还有另一条记载：

鲁直（即黄庭坚——引者）在戎州作《乐诗》曰：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曲，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

若不是亲见过黄庭坚的原稿，又习知四川方音，谁又能判断完全入韵的“曲”字是个讹字，而那个按通行的语音来说不入韵的“笛”字却是诗人本来使用的韵字呢？

正是由于陆游的写作态度如此认真，《老学庵笔记》绝少道听途说、讹误相传之习气，这是其受人喜爱的原因之一。陆游是位大诗人，诗歌创作的成就很大，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倡导“养气”之说，反对在死的语句上参验、推敲。在《老学庵笔记》中，陆游也多次表达自己对诗歌创作和欣赏的观点。下面举出两例，以见一斑。《老学庵笔记》卷六云：

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

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杨九重万乘主，谗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自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一别磋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

《老学庵笔记》卷七云：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从这里可以看出陆游对形式主义诗风是坚决反对的，他的见解确实高出一般人之上。陆游反对在诗中咬文嚼字，主张诗歌语言应通俗上口，为此，他在《老学庵笔记》卷四中举十一位诗人的十二句诗为例，说明唐人语浅意长之诗句如何已成为“今世所道俗语”。这些例子有韩愈的“何人更向死前休”，杜荀鹤的“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和“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司空图的“忍事故灾星”，朱湾的“一朝权在手，看取令行时”，冯道的“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戎昱的“在家贫亦好”等等。诗句之“可喜”者，既要句精语辟、哲理性强，又要浅近易晓、读来上口。这便是陆游的追求。

总之，从各方面看，《老学庵笔记》都有极大的阅读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它“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严谨；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这些评价是很公允的，无怪乎此书很早就传至日本，成为当地人士爱读之书。

绍熙四年（1193）夏，陆游在山阴写下《忆昔》（《剑南诗稿》卷二七），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壮士埋巴峡，孤身卧海。”陆游在“壮士埋巴峡”句下自注：“独孤策”。

这位独孤策在陆游诗作中共有六次明确提及，可谓推许备至。于北山《陆游年谱》中说：“独孤氏生平无考，山经地志及各家别集，均不见其姓名。昔扬万里曾谓务观诗中长啸吹笛之湖中隐者即务观自况（《诚斋集》卷六八《再答陆务观郎中书》），意者独孤策亦务观所塑造之艺术形象而借以自喻者也。”那么——

独孤策是不是陆游所虚拟的人物？

我们先将唐代一位名为“独孤生”者介绍一番。《太平广记》卷二 四引《逸史》云：

[李]，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醮，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釀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笼，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 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自来。坐客皆更赞 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消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生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进，独孤生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蹙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乃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访之，竟不知其所去。

这位神秘的吹笛神手独孤生是陆游的同乡，也曾隐居于山阴镜湖。于北山先生认为：“务观生长于斯，取以自况，颇为贴切。”至于为何名之为策，于北山先生解释说，这是“隐寓心在中原，志怀王霸”。

于北山先生之论，委实新奇，但仍会使人心生疑团。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陆游有关独孤策的诗作按年代先后引录如下。

淳熙四年九月，陆游在四川新都、弥牟之间小猎，夜投民舍，作《猎罢夜饮示独孤生》（《剑南诗稿》卷八），诗云：

客途孤愤只君知，不作儿曹怨别离。

报国虽思包马革，爱身未忍 羊皮。

呼鹰小猎新霜后，弹剑长歌夜雨时。

感慨却愁伤壮志，倒瓶浊酒洗余悲。淳熙九年正月，陆游在山阴作《独孤生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击剑，一世奇士也。有自峡中来者，言其死于忠、涪间。感涕赋诗》（《剑南诗稿》卷十四），诗云：

忆昨骑驴入蜀关，旗亭避后一开颜。

气钟太华中条秀，文在先秦两汉间。

宝剑凭谁占斗气？名驹竟失养天闲。

身今老病投空谷，回首东风涕自潸。同年二月，陆游在山阴作《有怀独孤景略》（《剑南诗稿》卷十四），诗云：

富贵世间元不乏，此君才大独难成。

暗鸣意气千人废，娴雅风流一座倾。

韬略岂劳平大敌，文章亦足主齐盟。

荒山野水涪州路，肠断西风薤露声。

绍熙元年秋，陆游在山阴作《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剑南诗稿》卷二一），诗云：

买醉村场半夜归，西山落月照柴扉。

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绍熙三年秋，陆游在山阴作《感旧》（《剑南诗稿》卷二五），诗云：

当年书剑揖三公，谈舌如云气吐虹。

十丈战尘孤壮志，一簪华发醉秋风。

梦国松漠榆关外，身老桑村麦野中。

奇士久埋巴峡骨，灯前慷慨与谁同？陆游自注：“独孤景略死于忠州十年矣。”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此诗的绍熙三年（1192）至初闻独孤生死讯的淳熙九年（1182），正好10年。

通观这些诗作，我们可看出：首先，独孤生以其书剑奇才博得陆游敬重，诗人从未提及其音乐天赋，所以，于北山认为此人物以唐代镜湖隐者为原形似有不妥；其次，陆游对独孤生的描述前后一致，似不当视为即兴虚拟的人物。至于杨万里在《再答陆务观郎中书》称陆游以长啸吹笛之湖中隐者自况，恰恰从另一方面说明独孤景略并非以当年的镜湖隐士为原形，因为陆游以镜湖隐士自况时，强调其长啸吹笛，而独孤景略则完全是另一种形象。

我们当然承认，迄今为止，除陆游的诗文外，我们尚未查到有关独孤景略的其它文字记载，他确实是一位“奇士”。然而，为恢复中原，陆游非常热衷于交结这种奇士。例如，淳熙三年五月，陆游在成都作《剑客行》（《剑南诗稿》卷七），诗云：

我友剑侠非常人，袖中青蛇生细鳞。

腾空顷刻已千里，手决风云惊鬼神。

荆轲、专诸何足数，正昼入燕诛逆虬。

一身独报万国仇，归告昌陵泪如雨。诗中的昌陵指宋太祖之墓永昌陵。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陆游幻想通过剑客的谋杀行动来抵御外族入侵，这当然是可笑的，但这种精神是不应轻易抹煞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淳熙四年十一月作于成都的另一首《剑客行》（《剑南诗稿》卷九）中也有相同的表达，诗云：

世无知剑人，太阿混凡铁。
至宝弃泥沙，光景终不灭。
一朝斩长鲸，海水赤三月。
隐见天地间，变化岂易测。
国家未灭胡，臣子同此责。
浪迹潜山海，岁晚得剑客。
酒酣脱匕首，白刃明霜雪。
夜半报仇归，斑斑腥带血。
细仇何足问，大耻同愤切。
臣位虽卑贱，臣身可屠裂。
誓当函胡首，再拜奏北阙。
逃去变姓名，中山餐玉屑。

时局的无奈使得陆游只能寄希望于剑侠奇士，而独孤景略正是他所认识的剑侠奇士之一。

绍熙五年（1194）冬，陆游在山阴作《上之回》（《剑南诗稿》卷三一）。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是在讽刺汉武帝刘彻欲求神仙，结果却难免一死。问题是哪种外在的刺激使诗人忽然想到了汉武帝？有趣的是，宋孝宗赵 正是死于这一年，而孝宗如同汉武帝一样，对长生不死之事心驰神往。那么——

《上之回》一诗究竟在讽刺谁？

我们先将《上之回》一诗抄录如下：

咸阳宫阙天下壮，五更卫士传鸡唱。
重门洞开銮驾出，回中更在云霄上。
云霄一路蟠青冥，车声隐辚驰雷霆。
宓妃穿仗王母下，何必轩皇居大庭。
君王游幸无终极，万年尽是欢娱日。

文成已死方不讎，茂陵松柏秋萧瑟。关于诗题《上之回》，我们可看《乐府诗集》卷十六中的一段文字：“《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四曰《上之回》。’又，《汉书》曰：‘孝武（按，应为孝文，见卷九四《匈奴传》）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萧关，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宫也。《武帝纪》曰：‘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沉建《广题》曰，‘汉曲皆美当时之事。’”

诗中的“文成”，指齐人少翁。《史记·封禅书》载：“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指汉武帝——引者）。……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讎，上乃诛五利。”刘彻求仙不成，求金亦不成，死后葬于茂陵，身后仅留下冢上的松柏，在秋风中抖动。

从表面上看，《上之回》是在讽刺汉武帝，然而，陆游将此诗编在《孝宗皇帝挽词》之前（中间隔《杂咏园中果子》四首，《闭户》二首，《连日大寒，夜坐复苦饥，戏作短歌》，《园中对酒作》），《孝宗皇帝挽词》云：

大道本生知，崇高志不移。
凝神超事物，观妙极希夷。
访药三山还，遗弓万国悲。
神孙昔钟爱，天作太平基。

这种编排的苦心，是使读者将《上之回》与《孝宗皇帝挽词》联系起来理解，从而体会到《上之回》的真正用意——讽刺孝宗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的一段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孝宗尤精内景，时召山林修养者入内，置之高士，人因称之曰某高士。易如刚最后酒扫高士堂，亦称高士。陆三山（游）因斋宿扣其庐，有苍童对奕，闻松风间有琴丝棋枰声，陆心羨何异神仙。扣童欲见高士，童答以高士往某御药处，陆因叹曰：

“高士亦见御药耶？”笑而出。此事颇近于传奇故事，故孔凡礼、齐治平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未予收录。然而，此事确实不虚，《渭南文集》卷十三有《答陆伯政上舍书》，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仆绍兴末在朝路偶与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宫，闻中有高士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访之，则皆扁户出矣。徘徊老松流水之间，久之，一丫髻童负琴引鹤而来，风致甚高。吾辈相与言曰：“不得见高士，得见此童亦足矣。”及揖而问之，则曰：“今日董御药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献香矣。”吾辈遂一笑而去。所谓“御药”即为皇帝治病之太医。此事虽发生于绍兴末年，却是孝宗当朝之时。我们知道，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赵构传位于太子赵昀，是为孝宗，次年，改元隆兴。依此看来，陆游对孝宗服药求仙之举早有不满意，所以才在孝宗卒年写下《上之回》，以此讽刺其荒唐之举。庆元六年（1200）秋，陆游在山阴作《近村暮归》（《剑南诗稿》卷四三），诗云：“莫笑山翁雪鬓繁，归休幸出上恩宽。鲎樽恰受三升酒，龟屋新裁二寸冠。僧阁鬻茶同淡话，渔舟投钓卜清欢。还家欲作诸孙赠，村路累累柿未丹。”陆游在“二寸冠”下自注说：“予近以龟壳作冠，高二寸许。”同书同卷又有《读史有感》，其二云：“昔人识不过十字，富贵封侯渠自如；龟堂闭门万卷读，一字不肯供时须。”据此，陆游晚年自称其宅为“龟屋”、“龟堂”，而且还用龟壳做了一顶两寸多高的帽子戴在头上。我们都知道，在现代俗语中，龟是詈人之词（指其妻与他人通淫的男子），人们不禁要问——

陆游为什么以“龟”自居？

其实，从有史可征的殷商时代起，龟一直是深受汉民族崇尚和喜爱的动物，它含有某种署人的意义则是元代以后的事，即使如此，龟的神圣性依然没有完全丧失。在远古，龟首先作为人类的保护神出现于洪水神话之中。据河南一带的民间神话传说，在洪水泛滥之前，龟作为保护神用巧妙的方法向兄妹俩泄露“天机”，让他们躲避这场大难；在天塌地陷之时，它保护人类的幸存者躲进山洞，或者送入自己的肚子里。据安徽一带的民间神话传说，洪水发生之后，几乎淹死了所有的人，兄妹俩人四处飘荡，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时，龟出现在他们面前，驮着他们到了一座荒山上，又劝说他们合婚，繁衍了人类。

既然龟的预言这样灵验，龟的出现又这样神奇，那么，它在初民的心目中自然是无比神圣的，这显然与原始部族的图腾观念有关。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以龟为图腾是一种很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华夏族团中的黄帝族，其著名大酋长号称黄帝轩辕氏，轩辕即鼃，是一种神化的大龟鳖。所以，黄帝在与 尤争战的关键时刻，龟便在冥冥中鼎力相助，此事见《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龟部》。《拾遗记》载：“鲧治水无功，舜幽于羽山，乃自沉于羽渊，化为元鱼。”元龟或称玄龟，鲧死化为元鱼即玄龟，是信奉图腾者死后还原为图腾的心理体现。由此，大禹治水受阻时，龟以尾划迹启迪大禹，并以青泥封记于禹所穿凿之处，帮助禹疏理洪水，完成大业。

龟作为人类的老祖宗，它所具有的灵性受到人们的崇拜，当人们遇到特殊情况而犹豫不决时，便要向龟讨教。由此，龟又成为一种占卜的工具，担负起预示未来、探测成败的重任。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的龙山文化遗址，诸如山东莒县、江苏邳县等地的文化层中都发现有穿孔的龟壳，本世纪初以来，在河南安阳的殷都古址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龟甲更是以龟占卜的明证。商周之前的龟卜占法，《尚书》、《礼记》等古籍均有记载，司马迁的《史记·龟策列传》则记载得更为详备。这些记载说明，先秦时期的人们笃信神明，君主的举动都要通过占卜活动来获得神和祖宗的同意，而在这个过程中，龟作为人神之间的中介，成为整个占卜活动中举足轻重的灵物。

我们的祖先对于龟的崇拜，不仅基于图腾文化和占卜活动，也基于龟本身的生理特征，人们很早就发现龟有长寿的特征。龟之所以叫龟就是由于活得长久。“龟”和“久”在上古时期的读音是相同的。刘向《易·系辞义》说：“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也。”《说文解字》也说：“龟，旧也。”旧也是长久的意思。褚少孙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补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南方有一位老人用龟垫床腿，过了二十多年，这位老人去世后，别人移床时发现龟仍活着。这并非无稽之谈。我们知道，龟虽缺乏强有力的攻击能力，但有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它的肺可以贮存大量的空气，新陈代谢慢，因此能缓慢地呼吸，仅消耗少量的体能；它的体内贮有

充分的水份及养料，能长久地不饮、不食，保持正常的生活；甚至，龟在身体受到重大损伤后还可以慢慢愈合。古人对于龟的长寿性做了如下说明：“龟能咽息不食，以气自养，可以不求养于外者也。”龟的这种行气导引的生存机能，是其得以长寿的手段。由此，在众多的取象比拟中，龟作为长行的象征而备受青睐。曹操有《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的诗篇，传诵千古。唐代诗人涉及此意项者更多。如，李端《奉和元丞侍从游南城别业》写道：“献寿回龟顾，和羹跃鲤香。”杨巨源《春日奉献圣寿无疆》里有：“莲叶看龟上，桐苑识凤过”之句（《史记》中讲：“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

在龟的生理特征启发下，有人学其行气导引而求生存。《博物记》载：“人有山行堕深涧者，无出路，饥饿欲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领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饥，体殊轻得能登崖岸。经数年后，竦身举臂，遂超山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泽，颇更黠慧。”诸如此类的记述并非完全是面壁虚构，因为行气导引在一定情况下确有其合理性，只是无有此种神奇罢了。

正是由于龟即是神灵之物，又是长寿的象征，所以，人们对它情有所钟，此种情况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人们起名时用龟字，服饰上用龟纹，建房时以龟为镇宅之物。特别应指出的是，唐宋诗人受庄子论龟的影响，认为龟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曳尾于泥中”，人也可以逍遥于尘世之外，清静无为地生活，于是便以龟作为避世的象征。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唐代诗人杜甫、韩愈一生追求“达济天下”，为世所用，所以诗中用“龙”（象征积极进取）的地方多；而白居易饱经宦海沉浮，处事日见圆滑，所以诗中用“龟”的地方颇多，如《九年十一月感事而作》有“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之句，他以历史上李斯临刑时才后悔为例，表达自己愿作泥中曳尾的乌龟，远离尘世。我们可以说，陆游以龟自称，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情绪。

自从元代之后，龟又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从而有时成为詈人之语，其身份也就得杂得多了。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卷二八中收录了一首《废家子孙》诗，诗云：“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民间传说兔子望月而孕，故“撑目兔”指“不夫而孕”的女子，而“缩头龟”自然指“撑目兔”的丈夫了。

龟为什么成为詈人之词呢？有人认为唐时乐户（官妓的家庭）的男子头上都带绿头巾，而龟头也呈绿色，故用龟称妓家之男子及妻有外遇者。也有人引明代谢肇《五杂俎》之语另立新说，《五杂俎》云：“今以妻之外淫者谓其夫曰龟。龟不能交，而纵牝者与蛇交也。”其实，龟成为詈人之词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下面两个事实。其一，自古以来有蒙巾示辱的习俗。到了元代，政府明确规定娼妓家的男子必须戴青头巾作为标记。《元典章·礼部·服色》，“至元五年，准中书省札，娼妓穿着紫皂衫子，戴角冠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青可以指绿色，所以有些人把娼妓家的男子戴的青头巾说成绿头巾。如，元赵孟顺《松雪斋集·论曲》云：“院本娼夫之词名

曰绿头巾词，虽有绝佳者，不得并称乐府。”明承元制，仍要求娼家男子裹绿头巾。谢肇《五杂俎》说：娼妓“隶于官者为乐户，又为水户，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耳。”其二，龟的背甲上容易附生绿色水藻，古称绿毛龟或青毛龟。《宋史·乐志一》：“伏见今年荆南进甘露，京兆东州进嘉乐，黄州进紫芝，和州进绿毛龟。”《南齐书·祥瑞志》：“永明五年，武骑常侍唐潜上青毛龟一头。七年六月，鼓城郡田中获青毛龟一头。”苏轼有“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的诗句。龟背上的绿藻如同龟的绿头巾，这就与娼妓家戴绿头巾的男子很自然地联系到了一起。明代郭勋选编的元明人散曲·戏曲集《雍熙乐府》卷二有《叨叨令并折桂令》，其云：“虾儿腰，龟儿背，玉连环系不起香罗带；脊儿高，绞儿细，绿茸毛生就的王八盖。”这就是龟因绿茸毛而成为王八的明证。

应当指出的是，龟在元代以后成为詈人之词，这只是龟文化发展的变异性方面，而龟文化发展的传承性方面仍不容忽视。在陆游的家乡江浙一带，时至明末清初仍流行着龟卜占法。清初学者胡煦在雍正年间曾出版《卜法详考》四卷，这部书除了详尽地考证古籍中关于龟卜的记述并使之系统化外，还专门记述了江浙一带的民间龟卜占法，对龟卜的全过程（诸如选龟、攻龟、灼契、占龟、占折等）有具体的描述。

同时，胡氏还附有龟板画图，使占卜更为清晰醒目。龟占过程之具体，程序之缜密，说明明清时期人们对神明的恭敬，视龟卜为十分严肃的事情。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尤其是到了科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一切，龟和自然界的万物生灵一样，无非是寻常之物。然而，文化是割不断的，自远古就形成的龟灵崇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国人的深层意识之中。

明白了以上所述，我们会理解陆游为什么会以“龟”自居。

陆游与杨万里同列于“中兴四大诗人”（另两位是范成大与尤袤），二人多有诗作唱和及书信往来。然而，开禧二年（1205）五月，杨万里去世，陆游竟未置一辞。人们不禁要问——

陆游与杨万里的关系究竟如何？

陆游与杨万里相识之年已不可知。据二人诗文，孝宗淳熙十三年春，双方酬唱较多。这年正月，杨万里官枢密院检详，十一月，迁左司郎中。陆游此时已奉命知严州，赴任前，在临安小住。《剑南诗稿》卷十七有《简杨庭秀》，诗云：

袞袞过白日，悠悠良自欺。
未成千古事，易满百年期。
黄卷闲多味，红尘老不宜。
相逢又轻别，此恨定谁知。

庭秀为杨万里之字。此诗作于淳熙十三年春，杨万里《诚斋集》卷十九有《和陆务观惠五言》一首，即次其韵。其诗云：

官缚春无分，髯疏雪更欺。
云间堕词客，事外得心期。
我老诗全退，君才句总宜。
一生非浪苦，酱瓿会相知。

《诚斋集》同卷还有《云龙歌调陆务观》、《再和云龙歌留陆务观西湖小集且督战云》、《上巳日，予与沈虞卿、龙延之、莫仲谦招陆务观、沈子寿小集张氏北园赏海棠，务观持酒酌花，予走笔赋长句》、《醉卧海棠图歌赠陆务观》等等，其《云龙歌调陆务观》诗中有“长安市上忽再值，向来一别三千岁”之句，可知，在淳熙十三年之前，二人就已相识。

淳熙十四年，杨万里将其《南海集》寄至严州，《剑南诗稿》卷十九有《杨庭秀寄南海集》记其事。

淳熙十五年四月，杨万里因争张浚配享，贬知筠州（今江西高安），途径严州，陆游载酒迎候于钓台以尽东道主之宜，《诚斋集》卷八一有《诚斋江西道院集序》记其事。

淳熙十六年九月，杨万里奉诏回京，十月，除秘书监。陆游不久亦还朝，除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二人相逢，多有酬唱。如，《剑南诗稿》卷二一有《喜杨庭秀秘监再入馆》，《诚斋集》卷二七有《和陆务观见贺归馆之韵》。同年十一月，陆游为谏议大夫何澹所弹劾，以作诗“嘲咏风月”罪被斥归乡里。自此一别，二人未再相遇，只有一些诗函往来。

通观二人唱和之作及往来信函，陆游与杨万里仅是文字之交，相知并不深厚。就杨万里方面而言，他曾于淳熙十二年向宰相王淮进《淳熙荐士录》，推荐60人，各加评语，请予擢用，其中并无陆游之名。《诚斋集》中《答陆务观道院佛祖之戏》，晚年居家《答陆务观郎中书》、《再答陆务观郎中书》，都是酬应之作。就陆游方面而言，他对与杨万里的唱和之作亦不太重视，如，《诚斋集》卷三一有《和陆务观用张季长吏部韵寄季长兼简老夫补外之行》，而《剑南诗稿》中并未保存陆游原作。嘉泰二年（1202），陆游次子陆子龙

任吉州司理，陆游作《送子龙赴吉州掾》（《剑南诗稿》卷五〇），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益公名位重，凛若乔岳峙；
汝以通家故，或许望燕几。
得见已足荣，切勿有所启。
又若杨诚斋，清介世莫此。
一闻俗人言，三日归洗耳。
汝但问起居，余事勿挂齿。

益公即指老友周必大，淳熙十五年，周必大拜左丞相、少保、益国公。陆游先提周必大，次及杨万里，其亲疏可见。

进而言之，二人在文字之交的背后隐含着重大的矛盾分歧。杨万里平生以张、朱熹、吕祖谦为师友，视其为儒家正传；而陆游则受家学影响，属临川（王安石）学派。就诗歌理论而言，杨万里论诗，主风味，尚微婉，认为好诗应“意在言外”，“诗已尽而味方永”，“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尽管他也推崇杜甫，但对于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未能着重继承，他心爱的乃是陶、谢、王、孟、韦、柳一路的山水田园诗，尤其推崇王维的《辋川集》，因而，他的诗作大都是“斧藻江山，追琢风月”，和他所处的多难时代很不相称。而陆游论诗，力主“养气”，认为“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他不同意杨万里标举晚唐之举，认为“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因而，陆游的诗作大都是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感人至深。

陆游与杨万里最尖锐的分歧在于对时局的态度。绍熙五年（1194）杨万里妄信陆游依附于权臣韩胄，寄诗相讥（见《诚斋集》卷三六《寄陆务观》），陆游不予理睬。嘉泰二年，陆游再度出山任史官，杨万里对其应召出仕支持韩胄非常不满，认为是贪恋富贵，并于是年五月作了一首《纪闻悼旧》诗（见《诚斋集》卷四一），表达了对陆游的失望：

莫说湘南寺，令人绝痛渠。
中间缘国论，偶似《绝交书》。
衫短枯荷叶，墙高过笋舆。
人生须富贵，富贵竟何如？

诗的首联是痛悼为韩胄迫害而死的赵汝愚。“湘南寺”指湖南衡州城东的开福寺，为赵汝愚葬地。诗的颔联是述说自己与陆游的矛盾。“国论”是《仇国论》，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谯周反对屡屡出师伐魏，作《仇国论》，讨论是否对敌国用兵，杨万里以《仇国论》中两种对立的主张，比之嵇康与山巨源的《绝交书》。诗的颈联是对陆游的讽喻。屈原《离骚》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之句，而陆游却着枯荷叶，自然无芬芳可言。笋舆就是肩舆，墙高阻止不住肩舆的来往，喻陆游热中仕途，和迫害赵汝愚的韩党来往。尾联是对陆游的责难与规劝。杨万里不仅不同韩党合作，而且也不同意陆游出仕，他只看到韩胄北伐之谋中隐有个人私心，并

没有看到北伐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据《宋史·杨万里传》，当他后来听到开禧用兵时，竟不食而死。杨万里之举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偏安情绪。陆游则是另一种态度。他虽对韩 胄有所不满，但对于北伐之谋还是支持的。为此，他反对党争，主张团结，略细节而谋大成，当辛弃疾再度起用时，他写长诗表示祝贺，并劝勉他以国仇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 亭夜（《剑南诗稿》卷五七《送辛幼安殿撰造朝》）”！陆游与杨万里的差异，泾渭分明。

综上所述，陆游与杨万里虽同为“中兴四大诗人”，但二人因诗论及政见的不同而最终分道扬镳了。由此，杨万里去世之时，陆游不置一辞也就不足为怪了。

《宋史·陆游传》云：“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 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又论曰：“陆游学广而望隆，晚为韩 胄著堂记，君子惜之，抑《春秋》责贤者备也。”陆游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性情耿介，时人称其“趋向不害正”，人们不禁迷惑——

陆游的“晚节”问题从何而来？

1. 纷纭复杂的前人之说

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是指他在韩 胄当政时曾再度出仕，并曾为韩胄作《南园记》、《阅古泉记》。

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赵 昀死，南宋小朝廷顿时兴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孝宗赵 昀与其子光宗赵 昀原本不和，这已成为临安城内的公开秘密。绍熙五年正月，孝宗病重，丞相留正、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赵汝愚等请光宗问病，不听。六月九日，孝宗死，光宗亦不过问；十三日大殓，光宗还是不去。临安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大小官吏纷递辞呈，丞相留正也请求罢免，启程离京。在这种情形下，赵汝愚谋举政变，拥立皇太子嘉王赵扩为新皇帝，迫使光宗退位。此事须得宪圣皇太后（高宗吴后）的同意，而宪圣皇太后居慈福宫，无法商量。韩 胄（南宋初名将韩琦后人）之妻吴夫人是宪圣侄女，而且韩 胄与慈福内侍熟识，他通过慈福内侍，密启宪圣皇太后。太后出面宣布：“以皇帝疾未能执丧，命皇太子嘉王即皇帝位。”是为宁宗。宁宗即位后，拜赵汝愚为右丞相，韩 胄因拥立有功，且又是宁宗韩皇后的曾季祖，凭外戚出入两宫，很得赵扩信任。于是，他便居中用事，谋逐赵汝愚党，进而控制了朝政。

开禧二年，韩 胄兴师北伐，战事不利，老投降派史浩之子礼部侍郎史弥远抓住了北伐丧师的机会，利用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皇子荣王谋杀韩 胄，许多朝臣也都参与了此事，同年十一月，史弥远等趁韩 胄上朝之际，在途中玉津园出其不意，杀韩 胄以议和。嘉定元年（1208），宋使以韩 胄首界金，订立了“开禧和议”。

《宋史》将韩 胄列入《奸臣传》。

陆游的“晚节”问题即由此而产生。

《宋史·陆游传》所引朱熹之言，见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朱子大全集》卷六四）。原书未注明写作年月，据专家考证，此书作于庆元五年（1199），即在庆元六年（1200）写《南园记》前一年，在嘉泰二年（1202）陆游再次出仕前三年。朱熹卒于庆元六年三月，既不及见《南园记》，更不及见陆游之应召出山。其所谓“晚节”问题，只不过是他的主观推测，故用“恐”字。陆游在淳熙七年（1180）曾为赵汝愚所劾罢，朱熹恐其因此而站在韩 胄一边，这是很自然的。然而，由于朱熹在当时士大夫中有很大的影响，于是，南宋后期以来许多公私记载便纷纷谈论起陆游的“晚节”问题来，指责陆游竟投靠奸臣韩 胄。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云：

韩 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对，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为词，有“飞上锦 红绡”之语。……先是，慈福（即圣宪皇太后——引者）赐韩以南园，韩求记于公，公记云：“天下知

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本自不侔，盖寓微词也。又云：“游老，谢事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来曰：‘子为我作《南园记》。’”

岂取其无谀言，无侈辞，足以道公之志欤！”公已赐丙第，人谓公探孝宗恢复之志，故作为歌诗，以恢复自期。至公之终，犹留诗以示其家云：“王师复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则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箠之时矣。

叶绍翁虽在为陆游开脱，然体会其言外之意，其心中亦有陆游晚节有污之疑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八云：

及韩氏用事，游既挂冠久矣，有幼子泽不逮，为 胄作《南园记》，起为大蓬，以次对再致仕。陈振孙的这段文字对后代颇有影响，元刘埙《隐居通议》对此加以渲染：“放翁本欲高蹈。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独不为此小官人耶？’乃降节从 胄游。”

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八有《至节前一日》诗，其云：

鲈鲙鉴湖风，想象依稀老放翁。

惜为平原多一出，诗名元已擅无穷。

诗中之“平原”即指韩 胄，韩曾封平原郡王。

周密《浩然斋雅谈》载：

韩平原南园既成，遂以记属之陆务观。务观辞不获，遂以其归耕、退休二堂名以警其满溢勇退之意甚婉，韩不能用其语，遂以败。务观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对太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庄兼外制，行词云：“山林之兴方适，已遂挂冠；子孙之累未忘，胡为改节？虽文人不顾于细行，而贤者责备于《春秋》。……岂谓宜休之晚节，蔽于不义之浮云！深刻大书，固又追于前辈；高风劲节，得无愧于古人？时以是而深讥，朕亦为之慨叹。”

《浩然斋雅谈》所载之制词，流传广泛，几乎士人皆知，戴表元《剡源集》卷一八《题陆渭南遗文钞后》记云：“余蚤闻好事者说，谓放翁晚岁食贫，牵于幼子之累，赖以文字取妍韩氏，遂得近臣恩数，遍官数子。”

据说，与陆游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也对《南园记》颇有微词。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云：

[陆游]晚年为韩平原作《南园记》，除从官。杨诚斋（即杨万里——引者）寄诗云：“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羨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盖切磋之也。《渭南文集》不载《南园记》、《阅古泉记》二文，这更引起人们的疑心：陆游是不是同心有愧，删去此二文？纪昀便持有这种看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 云：

史称游晚年再出，为韩 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今集中凡与 胄启，皆讳其姓，但称曰丞相；亦不载此二记。惟叶绍翁《四明闻见录》有其全文（引者按：《四朝闻见录》并未载二记全文）。（毛）晋

为收入《逸稿》，盖非游之本意。然足见愧词曲笔，虽自刊除，而流传记载于求其混没而不可得者，是亦足以为戒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云：

南宋诗集，传于今者，惟万里及陆游最富。游晚年隳节，为韩 胄作《南园记》，得除从官，万里寄诗规之，有“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羨夔龙集凤池”句。罗大经《鹤林玉露》尝记其事。以诗品论，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以人品论，则万里侷乎远矣。

然而，相反的意见始终是存在的。如，南宋罗大经便认为“《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谏辞”。此种看法，后人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元人戴元表《题陆渭南遗文钞后》云：

渡江以来，如放翁可谓问学行义人矣！谗其放 而不伤，困窳而能肆，不可谓无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见，欲为身谋，为子孙谋，当盛年时，知己如麻，何待七八十岁之后始媚一戚里权幸而为之耶？虽血气既衰，圣人不免于戒，不可谓世之君子必当然也；谓世之君子必当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辞者：穷不能忘仕，为文不能不徇人之求，庞眉皓发，屑屑远道之间，而曰我意非有它也，人谁能谅之哉！此编取饶州之意，于《南园》、《阅古》二记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绝于韩氏者，其语止此。

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云：

山阴陆放翁务观之出也，韩平原实招致之，所作《南园》、《阅古泉》二记，时虽称颂，而有规劝之忠焉。故平原败，而犹得免祸。

张元忭《绍兴府志》卷四四云：

《宋史》谓其晚年为韩 胄作《南园记》，见讽清议；余独谓不然。夫泉石品题，非有大关系也。以时宰求为一记，而必峻拒之，不已甚乎？顾其记所云何如耳。余于《西湖志》见此记而详味之，其以忠献有后为言，盖歆之以法祖也；又以许闲、归耕为公之志，盖讽之以知止也。游自以为无谏辞，无侈言，殆信然矣。是又何足为病哉？甚矣议者之固也！

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一《辛集七》中有与张元忭相近似之语。

清人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 有《书 陆游传 后》一文，对陆游的“不得全其晚节”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驳正。原文较长，我们就不引录，仅将其主要观点介绍一番。袁枚认为：首先，韩 胄亲仁，陆游劝善，均合孔孟之道，俱无所非；其次，若陆游有附权希冀之心，在曾觌、龙大渊柄国时，若不弹劾其奸，早已显达，岂有风烛残年反丧其守之理；再次，韩 胄自咎前失，大弛伪学（指朱熹理学）之禁，陆游有疏解之劳；最后，《宋史》成书于元代理学正炽之时，是以杨时受蔡京之荐，史无讥辞，胡安国受秦桧之荐，史无讥辞，结党营私、卖国求荣的史弥远可以不入奸臣传，其原因是杨、胡与朱熹善，史弥远弛伪学之禁。这种互不相让的论述还有许多，兹不多引。

面对这种诸说纷纭的情形，笔者赞成后一种看法。不过，窃以为袁枚诸

人之说并未涉及陆游“晚节”问题的要害——陆游矢志抗金与为韩 胄撰两记的关系。因此，对于这个问题仍有申说的必要。

2. 韩 胄何许人也？

陆游的“晚节”问题与韩 胄密切相关，因此，要解开这一谜案，必须首先弄清楚韩 胄究竟何许人也。

要认识韩 胄，必须突破《宋史》本传的束缚，因为，有关韩 胄的史料多数是经过他的对手史弥远之流改窜过的。据《续通鉴》卷一五八，史弥远杀韩 胄后，立即于嘉定元年（1200）月“诏史官自绍熙以来 胄事迹悉加改正”。其次，其它私家所记有利于韩 胄的材料也遭到明令禁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云：“颐正著《续稽古录》，盛言 胄定策之勋，……及 胄死，有诏毁其《稽古录》焉。”人们往往以成败论英雄，各种脏水便泼到韩 胄头上。周密《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条云：“（ 胄）身殒之后，众恶皆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若杂记所记：赵师鞏犬吠，乃郑井所造以报挾武学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事。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 固宜。而一朝信史（指理宗一朝编撰的《中兴四朝国史》——引者）乃不择是否尽取之，何哉？”同书卷五《南园香山》条云：“事有一时传说而人竟信之者，阅古（指韩 胄——引者）之败，众恶皆归焉。然其间多浮诞之语，抑有乘时以丑名恶声以诋平日所不乐以甘心者，如犬吠材庄事是也。姑以《四朝闻见录》所载一事言之。谓蜀帅（指吴曦——引者）献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园凌风阁下。今庆乐园即昔之南园也，所谓沉香山尚巍然立于阁前，乃枯 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尽信也如此。”

明白了以上情形，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宋史》所列韩 胄的两大罪状：庆元党禁与开禧北伐。

关于庆元党禁——

宁宋即位后，韩 胄与赵汝愚因拥立有功，权势赫赫，不久之后，二人便发生了权力之争。当时，侍讲朱熹曾借经筵之机，在宁宗面前弹劾韩 胄“擅权害政”，而韩 胄则用“内批”罢免了他的侍讲官职。宁宗庆元元年（1195）二月，韩 胄言官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罢相。从此，朝政由韩 胄掌握。

韩氏为了进一步打击赵汝愚、朱熹等人，把朱熹等道学家说成是“伪学”，称“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洁好修者，皆伪人也”。认为朱熹之流以理学为旗帜，招集徒众，图谋不轨。由此，赵汝愚被扣上“伪学罪首”之帽，充军至永州，暴死于湖南衡阳道中。朱熹被视为“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图谋不轨”。周必大也被视为“以身为伪学标准，羽翼其徒，使邪说横流，以害天下”。韩党以“伪学”之名，打击赵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公布一张“伪学逆党”名单，其中有

赵汝愚、朱熹、周必大、叶适等 59 人，把他们当作政治犯，限制他们的活动，并下令禁止进用“伪学逆党”，规定初人仕转官，“不是伪学，方与铨除”。这便是“庆元党禁”。

然而，这场使南宋国力耗于内争的党禁之祸，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韩 胄一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云：

韩 胄柄国，皆由道学诸公激之使然。……光宗属疾，宁皇未内禅，外朝与中禁势相隔绝，赵忠定（赵汝愚）招 胄通太后（慈福吴后），中官关礼任往来之旨。宁庆即位，诸公便欲掩其一日之劳，嗾台谏、给舍攻其专辄之罪。此时 胄本不知弄权怙势为何等事，道学诸公反教之如此为弄权，如此为怙势。及太阿倒持，道学之祸起矣。

周密《齐东野语》卷三也说：

先是，汝愚许 胄以事成日授节钺，彦逾执政。

既而推定策恩，……仅除郭杲节度使，彦逾为端明殿学士，出为四川制置知成都府， 胄迁观察使、枢密都承旨（原注：元为防御使知阁门事，至是仅迁一级）。于是二人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过蒙成耳。今既正居相位以专其功，乃置吾辈度外耶！”于是始有逐汝愚之谋矣。……既而 胄迁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专政，肇开兵端，身殒国危。在 胄不足责，而当时诸君子驭之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张端义、周密二人之语，是很有道理的道学家门户之见一向特别严重，鼓吹“君子小人之别”，根本不会看得起具有外戚、知阁门事身份的韩 胄，得势之后排斥韩氏乃在情理之中。甚至韩氏登门拜见，赵亦拒而不见，及至有人提醒，“汝愚亦悟，复见之， 胄终不择矣”（《宋史·赵汝愚传》）。认真地说，庆元党禁实肇于道学家自身。

另一方面，道学本身也很有问题。朱熹好友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就曾尖锐批评道学家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叶适虽也列于庆元党籍之中，但他也不满于道学家的门户偏见，他在《答吴明辅书》中说：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言曰：“举天下之学者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耳。其本稍差，其末大弊矣。（《水心文集》卷二七）周密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志雅堂杂钞》卷上中说：

道学之党名起于元 ，盛于淳熙，其徒甚众。

……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闢扞边者，则名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以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以驯至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呜呼，孰谓伪学之党不甚于典午清谈之乎！

周密在《齐东野语》，卷十一中还写到：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相附于道学之名。衷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录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目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其

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韩 胄用事，遂逐赵忠定，凡不附己者，指为道学尽逐之。……时嗜利无耻之徒，虽尝附于道学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习歌鼓，欲以自别。甚者，邓友龙辈附会迎合，首启边衅。而向之得罪于庆元初者，亦皆从而和之，可叹也已。

由此看来，韩 胄的压制道家算不上弥天大罪。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韩 胄最初无意于道学本身，只不过是借以打击政治对手。因此，当他地位巩固之后，对于“伪党之禁”就不大热心了。为了准备北伐，他竟主动作出和解的姿态，于嘉泰二年（1202）月弛“伪党之禁”，“死者赠恤，生者招擢”。追复赵汝愚资政殿学士、朱熹焕章阁待制，致仕。复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党人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章颖、叶适等人也先后复官，又削荐犊中“不系伪学”一节，俾勿复有言。这种措施显然有利于加强抗金力量。

综上所述，庆元党禁不过是一场朝内的权利斗争，其原因并不在于韩 胄一人，它并不能成为韩 胄的一大罪状。

关于开禧北伐——

《宋史·韩 胄传》称：“或劝 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然而，正是这种纠缠于主事者个人动机之论，形成了一种障眼迷雾，从而掩盖了这一事实：北伐战争本身是一场正义战争，它顺从了爱国士大夫阶层的要求，客观上也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韩 胄筹谋北伐，为时较早。庆元元年八月，“诏内外诸军主帅条奏武备边防之策以闻”。十二月。“置楚州弩手效军用”，这反映了韩 胄开始走向备战。不论韩 胄杂有何种个人动机，这种冲破苟安积习、倡导恢复之议的行为，毕竟有其迷人之处。

随着北伐准备的逐步展开，韩 胄被许多人视为收复失地的希望之所在。例如，叶适应召权礼部侍郎；同样名列党籍的周必大也支持陆游出仕。著名词人刘过（号龙州道人）亦支持韩 胄北伐，他在贺韩 胄生日词中说：

堂堂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欤？”曰：“可。”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

（《江西月》。自注：贺词）

辛弃疾也因寿词赞其用兵。

韩 胄虽为一时权臣，但毕竟是个庸才，他对北伐的准备是不周密、不充分的，他排斥辛弃疾等人不用，任用陈自强、苏师旦等夸谈贪进的小人，以至于赞同并参与筹谋北伐的叶适也看到了准备不足和用非其人的危险，他在《上宁宗皇帝札子》中指出：“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虜已衰弱，虜有天变，虜有外患；怵轻勇试进之计，用粗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

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隆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水心文集》卷上）遗憾的是，这种意见并未受到注重。

开禧二年（1206）四月，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是月，追夺秦桧王爵，进军伐金，分由淮南东西路和襄阳、唐、邓等地出师，旋即收复了安徽北部的泗州（今盱眙）、虹县（今泗县）。河南东部的新息县（今南息县）、褒信县（今包信县）。捷报传来，人心振奋，五月，下诏伐金。

但是，宋金两军一正式接触，准备不足的宋军便溃败下来。先是攻宿州、寿州不克，接着又败于蔡州、唐州、城固。同年六月，宋军西线主帅吴曦叛降，形势急转直下，金兵分九路南侵，宋廷震动，韩 胄动摇不定，和议之说再兴。

认真考查起来，即便在这种情形之下，远不能说胜负已定。开禧三年（1207）二月，吴曦为部下所杀，李好义先后收复金兵所侵阶、成、凤、和泗州及大散关，由于毕再遇的用兵有方，江、淮战场上宋军也连连得手。就金国方面而言，金人因其内部问题，并无南下之实力。他们一方面虚张声势，号称九路出兵；另一方面，又诏彰德府不得损坏韩 胄祖父韩琦之墓，意在留下退路以求和。韩 胄在这关键时刻举棋不定，他首先授意人与金议和，及至金人提出苛刻条件，又怒而重新求战。其结果，早就不满意北伐的史弥远等人借机发难，玉津园之变便发生了。并以韩 胄之首送予金国，以乞和平。

韩 胄的昏庸误国自然是应当谴责的；但伐金一事虽失败，却和张浚的符离丧师一样，还是应当肯定的。特别是对于函韩 胄之首以畀金，更是为公论所不满，认为既有伤国体，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边的问题。当时有人在侍从宅上题诗说：

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

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

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在诗中，作者将韩 胄比作赤心为国的晁错以及与秦国不共戴天的樊于期，这种评价自有其道理。就金国方面而言，虽然要求惩办北伐的首谋，但对韩 胄也不能不存有敬畏之意。韩首送到金朝之后，金朝台谏交章言“ 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候，“以其忠于为国，缪于谋身”。以礼葬韩首于河南安阳其祖韩琦墓侧。

纵观开禧北伐，虽首谋韩 胄杂有某些个人动机，但绝不能加以全面否定，只是由于韩氏得罪于道学家，才蒙上罪人之名。对于这一点，古代的学者也不乏公论。如，清代颜元在其《宋史评》中说：“独韩平原毅然下诏伐金，可谓为祖宗雪耻地下者矣。仗义复仇，虽败犹荣矣！乃宋人必欲诛之以畀金，尚有人心哉？”他又说：“《宋史》人之《奸臣传》，徒以贬道学曰伪学，犯文人之深恶也。”袁枚在《书陆游传后》中说：“张浚伐金之谋，与 胄同；符离之败，与 胄同。然而张浚不诛，士林不议者，何也？则一

与朱子（即朱熹——引者）交，一与朱子忤故也。”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二有《过安阳有感韩平原事四首》，见识过人，现摘录如下：

十年富贵老平原，一著残棋一局翻。
毕竟未忘青盖辱，九原不愧魏公孙。
胸无成算掷千钧，壮志区区那得伸？
一样北征师挫衄，符离未戮主谋人。
匆匆函首议和亲，昭雪何心及老秦！
朝局是非堪齿冷，千秋公论在金人。
成败论人亦可嗤，谁持秦镜照须眉。
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

3. 陆游对韩 胄持何种态度？

韩 胄之为，并非一无可取之处，陆游为其作二记也就不应草率地视为“晚节”有污。况且，陆游对于韩氏，亦绝非极尽附庸之能事。

绍熙五年“禅位”之变时，陆游在山阴，对此事毫无参与，不过，陆游显然是支持这次政变的。庆元元年夏，陆游有《送叶尚书》诗（《剑南诗稿》卷三二）。叶尚书是吏部尚书叶翥，在政治上属韩党，他曾要侍郎倪思列疏论伪学，倪思不从被免官，而叶翥却因此被韩 胄擢为执政。叶翥从绍熙五年七月到庆元元年五月这段时间知绍兴府，与陆游交往较多。陆游在其《送叶尚书》诗中说：“悬知新天子，虚怀须启沃。愿公论其大，始为天下福。”这表现了他对新皇帝宁宗的拥护和期待，并希望叶翥向新皇帝论及天下大事，为人民造福。从这一点上看，陆游最初对韩党并无恶感。

我们前面讲过，韩 胄掌政后的两件大事是庆元党禁与开禧北伐。下面，我们具体分析陆游对这两件事的态度，从而弄清楚陆游是否有附从权奸之嫌。

关于庆元党禁——

陆游曾为赵汝愚所弹劾，当然不在“伪党”之例。对于庆元元年赵汝愚的罢相，陆游的反映比较冷淡。他在这一年写的《上已忆事》诗云：“丞相传闻又三押，衡茅未改日高眠。”《闲中书事》诗云：“登庸策免多新事，老子痴顽总不知。”冷眼旁观只是表面，在内心深处，陆游对于韩、赵之争真是无所厚薄于其间吗？显然并非如此。史载，赵汝愚罢相，兵部侍郎章颖、国子祭酒李详、国子博士杨简并起而力争，相继被罢去；太府丞吕祖俭上封事劾韩 胄，命安置韶州；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书抗争，诏悉送五百里外编管。陆游在此时有《春夏之交鸣鸟百族，惟布谷声最悲急动人，戏作十韵》，诗云：“南风吹众绿，一扫紫与 。此时岂不佳，乃尔怀不平？”此诗的针对性十分明显。当然，陆游并不是在发泄私愤、兴灾乐祸，陆游对赵汝愚的平庸无才早有不满意，他寄希望于朝局之更新，希望赵汝愚罢相后，死气沉沉的朝局或将出现一点变化。

然而，对赵汝愚的不满，并不必然导致陆游对庆元党禁的支持。其实际

情况恰恰相反。

陆游是元 党籍之家，他从幼年就深深感到党争的误国。淳熙五年（1178），陆游从四川东归，路过涪陵，拜谒程颐祠堂，写下《北岩》（《剑南诗稿》卷十）一诗：

乌帽程丈人，闭户本好修。
骇机一朝发，议罪至窜投。
党禁久不解，胡尘暗神州。
修怨以稔祸，哀哉谁始谋？
小人无远略，所怀在私仇。

绍熙五年冬十一月，韩 胄当权之后，陆游写下《岁暮感怀》（《剑南诗稿》卷三一），对党争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
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
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
中更夷狄祸，此风犹未已。
臣不难负君，生者固卖死。
傥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对于庆元党禁，陆游认为这是虚耗国力的内讧，因此，他于庆元五年（1199）写下《北望感怀》（《剑南诗稿》卷四一），诗云：

荥河温洛帝王州，七十年来禾黍秋。

大事竟为朋党误，遗民空叹岁时道。他呼吁团结，共同抗金，这正是陆游伟大之处。陆游此类诗作为数不少，嘉泰三年（1203）他修史毕再次回山阴时所写《书感》诗云：“党祸本从名辈出，弊端常向盛时生。”开禧二年他所写的《闻百舌》诗云：“春鸟虽馋言，春尽能 舌。秋蝮与寒 ，一各知时节。微物顾如此，人乃独不然。君看甘陵党，作孽非由天。”这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理应团结对敌，诗人指斥热衷于党争者竟不如虫鸟。

我们前面曾提及，朱熹在庆元党禁中首当其冲。据《四朝闻见录》载：“庆元间，朱熹以伪学之禁，避地至长溪，虽门人故交，尝过其门，慄然不敢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游仍与朱熹保持着往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得知陆游对于党禁的态度。例如，庆元三年（1197），朱熹寄纸被至，陆游赋诗谢之（见《剑南诗稿》卷三六《谢朱元晦寄纸被》）；庆元五年（1199），朱熹为陆游诗作跋（见《朱子大全·跋陆务观诗》，《四库备要》本第三十五册《晦 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八）。庆元六年（1200），朱熹卒，《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六年三月，朱熹卒，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从之。”可见，当时的政治气候仍是寒气逼人，而陆游在此时撰《祭朱元晦侍讲文》（见《渭南文集》卷四一），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

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来殮！”可谓一往情深！就当时情形而言，许多与朱熹有旧者多退避三舍，而陆游竟不顾韩 胄脸色，十分沉痛地悼念老友，写下这篇催人泪下的祭文。从这篇文章，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陆游对庆元党禁的态度，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到陆游与韩 胄之间的距离。

就在这一期间，陆游与名列“伪党”之籍的周必大也保持着来往。庆元四年秋，他有《寄题周丞相平园》（《剑南诗稿》卷三七），称赞周必大是“先生国论如砥平，三朝倚之作权衡”。二人之间的书信不断。嘉泰元年（1201年）秋，陆游有“退傅寄声情缜密（自注：连得周丞相书，细字满幅），晦翁人梦语蝉联（自注：昨夕梦朱元晦甚款）”之句（见《剑南诗稿》卷四七《新凉书怀》）。陆游和周必大的这种关系，必然会引起韩党的忌恨，而放翁显然对此并未放在心上。

总之，在庆元党争的问题上，陆游虽对赵汝愚之罢相多少有些快感（这并不完全是基于个人恩怨），但对于韩 胄以“伪学”之名打击对手的作法也大有微词。陆游有其自己的立场。

关于开禧北伐——

我们前面说过，不论韩 胄本人杂有何种个人动机，收复中原毕竟在客观上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及爱国士大夫的愿望和要求。不必远引，且看陆游在开禧元年闰八月北伐战争前夕所写的《客从城中来》（《剑南诗稿》卷六四）：

客从城中来，相视惨不悦。
引杯抚长剑，慨叹胡未灭。
我亦为悲愤，共说到明发。
向来酣斗时，人情愿稍歇。
及今数十秋，复谓须岁月。
诸将尔何心，安坐望旄节！

同年所作《夏日感旧》（第二首）云：“胡尘扫尽知何日，不隐箕山即华山，”时不我待，尽早北伐，这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

正是以北伐为基础，陆游便和韩 胄发生了关系。

陆游与韩 胄发生关系，一是通过叶翥（前已提及），二是通过韩 道。

韩 道是韩肖胄之孙，韩 胄的族孙。陆家和韩家原有通家之好。韩胄的从兄弟韩肖胄是坚定的主战派，绍兴十年（1140）五月，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与陆宰有交往，给陆游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韩肖胄之孙韩道也和陆游保持了友谊。庆元六年（1200），陆游有诗寄江东漕使韩 道（《剑南诗稿》卷四三《江东韩漕 道寄杨庭秀所赠诗来，求同赋，作此寄之》），诗中有“顾怜通家略贵贱，劳问教诲均儿童”之句，语意颇亲切。陆游希望韩 道继承韩琦以来抗击异族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推动韩 胄举行北伐，此诗非平时泛应之作。

韩 胄用事以来蓄意北伐，所以，陆游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嘉泰二年（1202），韩 胄生日，陆游赋诗致贺。《剑南诗稿》卷五二有《韩太傅生

日》，诗云：

珥貂中使传天语，一片惊尘飞鞚路。
清霜粲瓦初作寒，天为明时生帝傅。
金黄饰衮雕玉觥，上尊御食传恩光。
紫驼之峰玄熊掌，不数沙苑千群羊。
通天宝带连城价，受赐雍容看拜下。
神皇外孙凤骨殊，凛凛英姿不容画。
问今何人致太平？地万里皆春耕。

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认真地讲，这首诗在艺术上平庸得很，不过，题旨倒是很明确的——希望韩 胄建立收复失地的盖世之功。

但是，当嘉泰二年陆游到临安主持编修国史后不久，他便失望了，他意识到韩 胄目光短浅、障于私欲，用人不当。为此，陆游对这次出仕颇有后悔之感。“渊鱼脱水知难悔，野鹤乘车只自惊”。（《剑南诗稿》卷五三《出谒晚归》）这便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虽然陆游对韩 胄失望了，但韩 胄却依然看重陆游。嘉泰二年，命陆游提举神观，年末，又兼秘书监，陆游此时身兼国史、实录、秘书监三职，但心情依然苦闷。“口言报国直妄耳，断简围坐晨至夕，”（《剑南诗稿》卷五七《书怀示子 》）韩 胄对陆游虽然器重，但视同外人，绝口不与之共论国事，北伐已成为韩党的专利品。陆游当时心情之郁抑是可以想见的。

嘉泰三年四月，陆游主持的《孝宗实录》五百卷、《光宗实录》一百卷已告完成，由于对韩 胄的失望，他决定离京还乡了。“人生快意事，五月出长安。”（《剑南诗稿》卷五三《乍自京尘中得归故山作五字识喜》）在这轻快的文字背后，隐含着一种郁愤之情，这一点是不难体会的。

陆游然对韩 胄失望了，但对于北伐仍持支持的态度。开禧元年，韩 胄追封岳飞为鄂王，借以鼓励诸将北伐，尔后又做了一些具体的布置，摩拳擦掌，准备一搏。陆游听到这些消息异常兴奋，作《出塞四首》（《剑南诗稿》卷五八），预祝北伐的胜利。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北伐下辽碣，西征取伊凉。
壮士凯歌归，岂复赋《国殇》。
连颈俘女真，贷死遣牧羊。
犬豕何足仇，汝自承余殃。

这位 81 岁的老人相当天真，竟事先提出了宽大战俘的收局政策。开禧二年五月，南宋在取得初步战果之后下诏伐金，陆游更是欣喜若狂。《剑南诗稿》卷六七有《剧署》，诗云：

方今诏书下，淮汴方出师。
黄旗立辕门，羽檄昼夜驰。
大将先擐甲，三军随指挥。
行伍未尽食，大将不言饥。

渴不先饮水，骤不先告疲。

此时，陆游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亲自参与这场北伐之战，他在《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渭南文集》卷三十）中说：“方王师讨残虏时，乃不能以尘露求补山海，真茶山先生之罪人。”

开禧北伐的战事是不顺利的，宋军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便不断地遭受挫折，和议之论再兴。然而，开禧三年二月，战局又出现了某种转机，陆游反对和议，主张把北伐坚持下去，《剑南诗稿》卷七一有《雨晴》，诗云：

淮浦戎初遁，兴州盗甫平。

为邦要持重，恐复议消兵。

然而，时局的变化不以陆游的意志为转移，开禧三年十一月三日，韩胄在玉津园被中军统制夏震所部乱棒打死，开禧北伐便烟消云散了。对于韩

胄的被杀，陆游在诗文中没有明确提及，但从他开禧三年冬所写的《读书杂言》、《书文稿后》等文字来看，还是颇有悲惋之情的。《剑南诗稿》卷七四《读书杂言》中说：“不知开眼蹈覆辙，乃欲归罪车轮摧。福有基，祸有胎，一朝产祸吁可哀！”同书同卷《书文稿后》中说：“上蔡牵黄犬，丹徒作布衣。苦言谁解听，临祸始知非。”韩胄当然应对开禧北伐的失败负有责任，但南宋投降派屈于金人的压力竟取韩氏首级以送敌，实在是损国格。

以上，我们对陆游在庆元党禁、开禧北伐两次历史事件中的态度进行了一番描述，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陆游绝没有附庸于韩胄而自污其人格。

4. 陆游作两记的问题

关于陆游晚节之争，与陆游曾为韩胄作《南园记》和《阅古泉记》有很大关系，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考查陆游作两记的背景以及两记的主旨。

关于《南园记》

为论述方便，兹将《南园记》引录如下：

庆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别园赐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极山湖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禄入之余，葺为南园。因其自然，辅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视，左顾右盼而规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象列。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流秀石，若顾若揖。于是飞以阁，虚堂广厅，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毕备。高明显敞，如蛻尘垢而入窈窕，邃深疑于无穷。既成，悉取先德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为和客，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关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水艺稻，为为场，为牧羊牛、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亭之名则曰远尘、曰幽翠、曰多稼。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耕，是公之志也。公之为此名，皆取于忠献王之诗。则公之志，忠献之志也。与

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逮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志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或曰：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记。游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来曰：“子为我作《南园记》。”游窃伏思公之门，才所萃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衣冠而去，则庶几其无谀辞、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获辞也。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赐紫金鱼袋陆游谨记。

此文未记写作年月，但文中称“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而韩胄于庆元五年九月加少师平原郡王，六年十月又加太傅，则知此文必作于庆元六年十月之前，文尾自置“中大夫直华文阁赐紫金鱼袋陆游谨记”，而陆游退休后，于庆元五年五月拜致仕敕，至庆元六年三月除直华文阁致仕赐紫金鱼袋，故知此文必作于庆元六年三月之后。

如果不是预先怀有偏见，我们很难发现什么谀词。此文“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至“终曰归耕”，记山林泉石之胜，与一般游记文章相同。从“公之为名”至“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记”，勉励韩以其曾祖为榜样，忠于王室，建立功勋。文章最后说明写作态度，作者申明绝非韩公门下所萃之才，只是由于韩来求文，念其为忠献王韩琦之后才同意动笔。

我们还应注意到陆、韩两家的世谊关系。我们前面曾提到陆游《江东韩漕道寄杨庭秀所赠诗来，求同赋，作此寄之》，讲过韩琦长子韩忠彦之孙韩肖胄于绍兴二年知绍兴府，肖胄与弟膺胄皆寓居绍兴，陆、韩二家有通家之谊，故陆游早年得与肖胄相见，韩道便是肖胄之孙。下面再举几例。《剑南诗稿》卷四三有《斋中杂兴》十首，其四云：“成童入乡校，诸老席函丈。堂堂韩有功，英概今可想。从父名彦远，早以直自养。始终临川学，力守非有党。纷纷名佗师，有在其颡。二公生气存，千载可畏仰。”韩有功当是肖胄同族。《剑南诗稿》卷三四有《题韩运监竹隐堂绝句三首》，自注云：“茂卿字立道。”韩茂卿亦肖胄孙辈，韩道兄弟行。开禧二年，韩茂卿出守池州，陆游曾送之以诗（见《剑南诗稿》卷六六）。《渭南文集》卷三还有《跋韩立道所藏兰亭序》，《渭南文集》卷十上《会稽志序》载韩立道曾以安抚司干办公事与修《会稽志》。陆、韩两家有此通家世谊，且多有文字往来，则韩胄托陆游为南园作记，陆游亦不拒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同时，陆游作《南园记》与其晚年应召出山修史并无必然联系。

如前所述，作《南园记》事在庆元六年，应召出山修史在两年之后的嘉泰二年，有人据此断定二事有必然联系，好似陆游为出山而作记。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便说：“陆务观……晚年为韩平原作《南园记》，除从官。”

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据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早在庆元五年春，

临安已经有“议者欲起洪景庐及此老（即陆游——引者）付以史笔”之事。此事在作《南园记》前一年，当然与作记无关。由于某种原因，修史任务落在龚颐正身上。尔后龚颐正病死，主持史事无人。嘉泰二年五月，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未就及三朝史事未成，召直华文阁陆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就陆游而言，早在孝宗、光宗朝就曾两任史官，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又是亲身经历，奉召出山以报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就韩胄而言，这也与他“欲多收知名之士”的愿望相合，或许促成此事。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陆游在出山之际就下定了决心——修史工作一完便决然引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邻翁好为看耕陇，行矣归来一笑”（《剑南诗稿》卷五一《入都》）。

以上种种，均说明《南园记》并非陆游为出山而作。

关于《阅古泉记》

《阅古泉记》作于嘉泰三年四月，其时，陆游正在临安史局。其文云：

太师平原王韩公府之西，缭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鼉，径如惊蛇。大石累累，或如地踊而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将奋，或森如欲搏。名葩硕果，更出互见，寿藤怪蔓，罗络蒙密。地多桂竹，秋而华敷，夏而箨解，至者应接不暇。及左顾而右盼，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自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其尤绝胜之地曰阅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缭以翠麓，复以美阴；又以其东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辄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几也。霖雨不溢，外旱不涸，其甘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静，可鉴毛发。而游尘堕叶，常若有神物呵护屏除者，朝暮雨，无时不镜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可饮可濯，尤于烹茗酿酒为宜，他名泉皆莫逮。公常与客徜徉泉上，酌以饮客。游年最老，独尽一瓢，公顾而喜曰：“君为我记此泉，使后知吾辈之游，亦一胜也。”游按泉之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盖此泉湮伏弗耀者几四百年，公乃复发之。阅古，盖先忠献以名堂者，则泉可谓荣矣。游起于告老之后，视道士为有愧，其视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复归故山，幅巾短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赋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阴陆游记。

十分明显，陆游在文中谈到自己的挂冠复出，认为这实在是愧于斯泉，并且提出了“复归故山”的愿望，这表明他绝无希荣附势、依傍门户之意。

既然《南园记》、《阅古泉记》并非阿谀韩胄之作，为何不见于《渭南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为陆游有愧于心，有销赃灭迹之嫌。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信口胡说。陆游若真是心虚而在文集中删去二记，为什么又在诗集中保留《韩太傅生日》诗而不予删除呢？

文集无二记而诗集有《韩太傅生日》诗，这恐怕与二书的编者不同有关。

《渭南文集》是陆游幼子子作宰溧阳时所刻，其时为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见子所作跋语；《剑南诗稿》则是其长子子通知江州已请致仕时所刻，其时为嘉定十三年十二月，见子所作跋语。两书刊行时间虽接近，

但操办者的为人却不相同。子 已请致仕(其时 72 岁)，心中于仕途无牵挂，编次时遵守先父生前手订之旧，因而保存了《韩太傅生日》诗。而子虚其时 42 岁，正在仕途上挣扎。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载：

绍兴间，赵静乐善湘留守建康，急于财赋，不时差官下诸邑，孔粒以上，根括无遗。溧阳宰陆子 ，放翁子也，窘无所措，乃以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时相史卫王(即史弥远——引者)，王以十千一亩酬之。子 追田主索田契，约以一千二亩。民众相率投上府，诉既不行；子 会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庐。众遂群起抵拒，杀伤数十人。始则一豪妇为之倡，势既不敌，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灌以尿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就名福贤庄。……刘漫塘遗之诗曰：“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志何如？”

加兵杀 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与？万口衔怨皆怒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回家理故书？必须指出，这段文字记载的年代有误。据《景定建康志》及《溧阳县志》，陆子 于嘉定十一年到任，十四年四月满替。俞氏所谓“绍兴间”，其时子 去溧阳任已六七年，“绍兴间”必为“嘉定间”之误。另外，刘宰《漫塘文集》卷二有《寄陆大夫》一首，文字与俞文豹所录略有不同，由此可证陆子 讨好史弥远之事属实。

由上可知，陆子 刊行《渭南文集》时，正在攀结当年杀韩 胄的主谋史弥远，他当然不愿看见文集中有《南园记》、《阅古泉记》这样的犯忌之文，删去二记自在情理之中。陆子 顾念个人前程，至使其父蒙千古之冤，可谓不肖之子。在宋人笔记中，人们常将子 与杨万里之子扬长孺相较。言陆游有不肖之子，此论信然。

综上所述，《渭南文集》不载二记，实乃事出有因，并非陆游自愧心虚。

5. 关于荫子问题

关于陆游荫子一事，尤为荒诞。似乎陆游作记、出山，全是为子孙后代考虑，竟至于将人格气节置之不顾。认真考究起来，原来是子虚乌有。

陆游共有六子。长子子 生于绍兴十八年(1148)。淳熙十五年(1188)冬，陆游除军器少监，子 开始出仕，光宗绍熙元年冬，子 年四十三，出仕寿春，很有政绩。在陆游主前，他的官做到淮西濠州通判。次子子龙生于绍兴二十年(1150)。庆元三年，子龙年四十八，出仕武康尉。在陆游生前，他的官做到东阳丞。三子子修生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嘉泰四年，子修年五十四，出仕闽县。四子子坦生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嘉泰四年春，子坦年四十九，出仕临安。五子子布生于淳熙元年(1174)。他在陆游生前未曾作官。幼子子 (也作子聿、子)生于淳熙六年(1178)。他在陆游生前未曾作官。

以《南园记》作于庆元元年计之，其时幼子子 年已二十三，绝非襁抱中物，此事至明。如此，则刘垞所记“有妾抱其子来前曰：‘独不为此小官人耶？’乃降节从 胄游”云云，不攻自破。

至于《浩然斋雅谈》中所录的章良能所行陆游落宝谟阁待制之制词又是

缘何而来的呢？原来，按宋制，卿监官致仕例得荫一子。陆游以兼秘书监致仕，照例得荫一子，这才有少子子 获得恩荫之事。《山阴陆氏族谱》云：“子 ，字怀祖，……以父致仕恩补官。”而自从韩 胄被杀之后，凡与韩氏有牵连者均受打击，个别人控空心思，抓到荫子一事做文章，把本来是因致仕例得之荫子，说成是为荫子而再次出山，这完全是倒为因果。对于这种不实之污，陆游有自己的答辩。《渭南文集》卷一有《落职谢表》，文云：

叨荣罪大，念旧恩深，仅镌笔橐之华，犹保桑榆之景。仰惭鸿造，下愧公言。伏念臣本出故家，初无它技，每自求于远宦，岂有意于虚名。命之多艰，动辄为累，强起仅余于数月，退归又阅于六年。齿豁头童，心剿形瘵。叫阖请命，蒙恩久许其乞骸；饰巾待终，视世已同于逆旅。敢谓宽平之邦宪，尚令渐尽于里居。此盖伏遇皇皇陛下，励精大猷，惠养遗志。念臣生当全盛，被六圣之涵濡；怜臣仕遇中兴，荷三宗之识拔。虽名薄责，益示殊私。臣敢不祇诵训词，痛惩宿负。尸居余气，永无再瞻轩陛之期；老生常谈，莫叙仰戴丘山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表中根本没有理睬制词中所指责的“子孙之累”问题，突出说明自己是迫于上召才“强起”暂出，这是不辩之辩，是对制词的侧面反驳。

陆游落职事在嘉定二年（1209）春。在此期间，陆游在《短歌行》中说：“耳边闲事有何极，正可付之风马牛。”《夜闻雷雨大作》云：“九十老翁更事多，寄言儿女不须惊。”这类诗句，显然是针对“子孙之累”云云而作。

陆游不会为荫子而出山，相反，他对后辈的要求是极严格的。次子子龙赴吉州时，他作《送子龙直吉州椽》（《剑南诗稿》卷五），教子一要为官廉洁自守，二要能过清贫生活，三要勿事干求，四要善于向友人学习。即以庆元六年即作《南园记》之年的诗看，亦绝无一点为子孙干进求禄之迹；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我躬尚不阅，况为子孙谋”（《读何斯举黄州秋居杂咏次其韵》）、“赋禄虽尚远，迹足慰衰白”（《读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诗次其韵》）这样的诗句。至于陆游临终所作《示儿》诗，就无须细说了。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评述了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十分明显，许多人沿袭朱熹以来的道学家门户之见，纠缠于陆游作《南园记》以诋毁其晚节，反倒见笑于大方。我们引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朱子尝言：“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宋史》本传因之，辄谓其不能全晚节。此论未免过刻。今按：嘉泰二年，放翁起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其时韩 胄当国，自系其力。然放翁自严州任满东归后，里居十二三年，已七十七八，祠禄秩满，亦不敢复请，是其绝意于进取可知；

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职在文字，不及他务，且藉以报孝宗恩遇，原不必以不就职为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即力辞还山，不稍留恋，则其进退绰绰，本无可议。即其为 胄作《南园记》、《阅古泉记》，一则勉以先忠献之遗烈，一则讽其早退，此亦有何希荣附势、依傍门户之意？而论者辄藉

为口实以皆议之，真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陆游自幼喜爱陶渊明，终生不渝。嘉定元年（1208），84岁的陆游仍在研读陶诗，他写下《读陶诗》（《剑南诗稿》卷八），诗云：“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失疏句，还许诗家更道不？”诗中的“夏木扶疏句”，是指陶渊明《读〈山海经〉》中“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之语。陆游忧国忧民，极积入世，以恢复中原为己任；陶渊明却退居田园，标举隐逸，崇尚恬静。那么——

陆游为什么崇尚陶渊明？

据陆游自称，他是在十几岁时接触陶渊明诗的，并且马上被迷住了。《渭南文集》卷二《跋渊明集》载：

吾年十三四岁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

陆游对陶渊明的热情由此被激发出来，历久愈炽。开禧三年，83岁的陆游写下《自勉》（《剑南诗稿》卷七），诗云：

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

正复不能到，趣乡已可观。

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

勿谓在屋漏，人见汝肺肝。

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

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

无疑，无论是就诗品还是人品而言，陆游都把陶渊明视为典范。

追究起来，陆游对陶渊明的推崇是与宋代的文化气氛分不开的。

陶渊明固然受到后世文人的崇仰与歌颂，但由于各个时代的特点不同，陶渊明在文人心目中的位置就有所不同的。如，唐代（尤其是初唐、盛唐），其人生价值标准是建立功业，文人虽也歌颂陶渊明的不慕荣利，但赞誉之际仍不乏批评，杜甫在《遣兴五首》之一中便说：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

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怆。

然而，宋代的情形就不同了。赵匡胤建国之初，宋朝便先天不足，与大唐气象相比，相形见拙，对外用兵，屡遭败绩，只得苟安求和。但由于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宋代却极注重精神文化建设。就学术界而言，周敦颐援佛道入儒，提出了“主静”、“无欲”的理论，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突出道德理想的哲学体系——理学。由于理学的兴起，整个时代的文化思潮很自然地把士大夫引向对主观世界的探索之中。另一方面，宋代是在五代纷乱割据的局面下建立的新朝代，有识之士鉴于前朝的兴亡得失，纷纷提出重整纲常的各种建议。在这种背景下，孔子的高徒颜回日益显赫，宋人也发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是现世社会最合适的楷模。

在宋人心目中，陶渊明是真、善、美的化身。林逋在《省心录》中说：“陶渊明无功德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此处的名节主要指操守，即人的品格，这除了有不慕荣利、安贫乐道之外，还有指其不与刘宋政权合作的一面。而这一点，又恰恰与宋代的民族矛盾产生了微妙的联系。文天祥《文山全集》卷十四《海上》便说：“王济非痴叔，陶潜岂醉人。得官需报

国，可隐即逃秦。”陆游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推崇陶渊明的。杜甫不是说陶诗“枯槁”么？绍熙元年，陆游作《杭湖夜归》（《剑南诗稿》卷二一），对此加以反驳，其一云：

昔如架上九秋鹰，今似窗间十月蝇。
无 囊 思出塞，不妨粥饭略同僧。
白 洲晚初回 ，绿树村深已上灯。
莫谓陶诗恨枯槁，细看字字可铭膺。

在陶渊明与“道”的关系上，宋人也给了极高的评价。杜甫不是说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么？苏轼在《书渊明饮酒诗后》中反驳说：“《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即陶渊明——引者）不知道，吾不信也。”许 在《彦周诗话》中评论说：“‘既自以心为形设，奚惆怅而独悲’，是此老悟道处。”辛弃疾在《书渊明诗后》中也写道：“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闻道更谁闻？”在这一点上，陆游也颇有同感。他认为陶渊明之诗，言浅意深，语平道蕴，因而产生了“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剑南诗稿》卷二七《读陶诗》）之感，并继而哀叹说：“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

陶渊明备受宋人推崇还和宋代的党争相关。有宋一代，党争激烈，斗争此起彼伏，大部分士人都被卷入了党争的旋涡而无法脱身。一些尝过宦海沉浮、世路崎岖滋味的知识分子不仅需要理性的探索，还需要情感上的安抚。于是，居于世俗之中又超脱于世俗之外的陶渊明便成为最值得仿效的楷模。他们从陶渊明的人生与诗文中找到自己情感的渲泄口。例如，苏东坡在被贬惠州时，写有《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文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苏东坡在贬逐生涯中正是以陶渊明自比，达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神释》）的人生境界。

陆游生逢乱世，有国破山河碎之恸，又有雪耻复中原之志，但却常常受到投降派的排挤而屡屡罢官，闲居乡里。这种遭遇，自然会把他的目光引向陶渊明，将其视为同道。嘉泰二年春，陆游在山阴闲居时写下《二月一日作》（《剑南诗稿》卷五 ），诗云：

狼藉梅花委道旁，山樱已复占年光。
消积雪时闻滴。夜覆残炉剩得香。
老马已衰宁识路？寒龟未死且担床。

柴荆终日无来客，赖有陶诗伴日长。显然，在人生失意之际，吟诵陶渊明诗作已成为陆游的一种补偿手段，他深感人生命运不可把握，便把主宰命运的主动性转换成了净化内在心灵的主动性，在陶诗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和满足，从而建立一种具有道德评价的个体生活。

对陶渊明的崇敬导致对陶诗的模仿，我们不难看出，陆游的《游山西村》一类作品，其情韵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陆游对陶渊明的终生崇尚，既有深广的社会背景，又有复杂的个人因素。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陆游崇敬陶渊明的另一个原因——宋代流行的审美意识与陶渊明诗文所表现的美学风格正相符合。宋人提倡自然美。被称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认为，“作诗无大吟，唯造平淡难。”（《读邵学士诗卷》）王安石也认为好诗应该是“看似容易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时值南宋，朱熹也强调作诗要“平淡，不废力”。陆游亦是如此。他在《读近人诗》（《剑南诗稿》卷七八）中说：“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而要达到这种平淡自然之美，首先要有一种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由此，宋人便向陶渊明注目倾心了。

嘉定元年（1208）冬，陆游在山阴写下《雪后煎茶》（《剑南诗稿》卷八），诗云：

“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显然，诗人在煎茶，品茶中得到了一种充分的心理满足。如果我们认真翻阅《剑南诗稿》，就会发现其现存有关茶事的篇什竟有320首之多，那么——

陆游为何写下如此众多的咏茶诗？

公元12世纪，日本荣西禅师曾两次来华求法，并学习中土茶俗，回国后开创日本茶道，至今不废。然推其原始，茶之为道，实肇自我国宋代。有宋一代，无论南北之分，饮茶之俗遍及朝野，而尤以文人士大夫为盛，其斗茶、品茗、论器、试水之习气与当时硕学鸿儒谈性论道之风尚相表里，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养生饮食的范围，从而成为一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这正是陆游写下众多咏茶诗的文化背景。

追根寻源，饮茶之举三国时代便有，吴主孙皓曾以茶代酒，密赐亲随，尔后历代沿袭，难以备述。但是，由吴而及唐，众人视茶，多为一种醒酒解渴提神消乏的养生之饮，并未论及它的精神文化上的意义功用。至宋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宋代茶风极盛，而且，其品鉴之精，陈义之高，前所未有，风流皇帝宋徽宗甚至亲作《大观茶论》，可谓宋代茶风的宣言。《大观茶论》将茶与谷粟丝帛等日用之物区别开来，把饮茶品茗视为文人士大夫“冲淡闲洁、韵高致静”的高雅之举；将“碎玉锵金，啜英咀华”的品茶之习，看作为人恬物熙的盛世清尚。至此，饮茶品茗的精神文化意义被揭示出来了。依宋徽宗的看法，茶乃山川舆地的灵秀之物，茶之为饮乃文士的专利。这种对茶的赞美，代表着宋代文人对茶的一种共同看法。

例如，苏轼认为茶具有一种伦理美学意义，他在《寄周安孺茶》中称：“大哉天宇内，植物知几族，灵品独标奇，迥异凡草木。”黄儒《品茶要录》称：“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久矣。夫身世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苏轼及黄儒的这种看法，与宋徽宗所论完全一致，反映出文化界对茶文化的新观念。

宋代帝王嗜好茶事者决非徽宗一人。在帝王的鼓励与宣扬下，品茗饮茶在宋代文人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大大助长了风雅茶事的流行，各种论茶专著应运而生。除了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外，现存的宋人专著还有蔡襄的《茶录》，子安的《试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等等。这些著述较之以往的《神农本草》、《食经》、《唐本草》、《茶经》所论，宋人对茶的研究品鉴远较前人精细。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批评陆羽的《茶经》说：“虽有陆羽为之说，而持论未精。至本朝蔡君谟《茶录》既行，则持论精矣。以《茶录》而核前贤之诗，皆未知佳味者也。”另外，宋人的饮茶风俗亦比前代丰富。宋人有“斗茶”（又称茗战）之俗，唐庚《斗茶记》描述说：“聚二三人于一室，取水烹茶，品论高低优劣。”宋人还有“茶令”。王十朋《万季梁和诗留别再用前韵》“搜我肺肠茶著令”句自注：“余归与诸友讲茶令，每会客，指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宋人还有“茶话”。方岳《人局》诗云：“茶话略无尘土染，荷香剩有水风兼。”甚至，茶与禅也发生了关系，《景德传灯录》卷二六：“问：‘如何

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宋代文人多好禅，文人禅僧都借茶而助意思，黄庭坚《题落星寺岚漪轩》有“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之名，即是描写禅寺煮茶的景观。

有人总结说：“宋代文人的风雅茶道，从精神上讲，乃是借以实现兼取儒道的冲淡闲静的人格理想；从风范上讲，是体现一种脱落尘秽的气度；从情趣上讲，是追求一种优游不迫、涵咏于人文生活中的雅致。”这是一种很精彩的分析，我们正是应在这种文化背景上去理解陆游的咏茶诗。

陆游的咏茶诗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表现对茶事的品鉴精赏。乾道六年十月，陆游在峡州作《三游洞前岩下小潭水甚奇取以煎茶》（《剑南诗稿》卷二），诗云：

苔径芒鞋滑不防，潭边聊得据胡床。
岩空倒看峰峦影，远中含药草香。
汲取满瓶牛乳白，分流触石声 长。

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陆游在诗中描述了汲水过程，显然，诗的用意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是在于表现对茶这种灵秀植物的赞赏之情。而这正是宋代诗人咏茶时的一种普遍心态。如，蔡襄在《茶壘》中对茶叶的生发作了如下描写：“造化曾无私，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力，朝云护日车。千万碧天枝，戢戢抽灵芽。”王禹偁在《茶园十二韵》中描述采撷焙制过程：“舌小侔黄雀，毛狞摘绿猿。出蒸香更别，入焙火微温。采近桐花节，生无谷雨痕。”苏轼在《试院煎茶》中描述煎茶过程：“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宋人的这些诗作，生动地表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和风范。

其次是表现品茶中所体会到的那种淡泊宁静的人生境界。陆游的这类咏茶诗较多，我们以时间为序引出几例。淳熙八年冬，陆游在山阴作《夜汲井水煮茶》（《剑南诗稿》卷十四），诗云：

病起罢观书，袖手清夜永。
四怜情无语，灯火正凄冷。
山童亦睡熟，汲水自煎茗。
锵然辘轳声，百尺鸣古井。
肺腑凜清寒，毛骨亦苏省。
归来月满廓，惜踏疏梅影。

寒山古井，明月疏梅，这一切被“茶”联系在一起，尘世被忘却了，只留下一片静谧的空寂，诗人在这种气氛中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淳熙十五年七月，陆游从严州归山阴时作《七月十日致故山削瓜沦茗 然自适》（《剑南诗稿》卷二），诗云：

镜湖清绝胜吴松，家占湖山第一峰。
瓜冷霜刀开碧玉，茶看铜碾破苍龙。
壮心自笑老犹在，狂态极知人不容。

击壤穷阎歌帝力，未妨尧舜亦亲逢。这首诗虽有“壮心”、“狂态”之语，但尾联值得注意。《礼记》孔颖达正义：“《尚书传》称民击壤而歌：‘耒耨而饮，耕田而食，帝有何力？’”陆游在诗中用此典，意在表示自己摒斥现世，在逍遥的野泽生活中获得心灵上的愉悦。最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嘉定二年（即其卒年）所作的《书意》（《剑南诗稿》卷八二），诗云：

养得山林气粗全，此怀无日不超然。

日长琴奕茅檐下，岁晚春江箬帽前。

天上本令星主酒，俗间妄为世无仙。

今年茶比常年早，笑试西峰一掬泉。陆游在诗后自注：“今年清明前数日，山中已有新茶。”在这里，诗人对茶的迷恋显然是对那种淡泊宁静、闲雅率远的人生境界的迷恋。这种境界在唐人笔下曾出现过，如钱起《与赵莒茶宴》云：“竹下玄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这种境界在宋人笔下更为多见。苏轼《雨中过舒教授》中写道：“客来谈无有，洒扫凉冠履。浓茗洗积昏，妙香净浮虑。”杨万里《舟泊吴江》写道：“江湖便是老生涯，佳处何妨且泊家。自吸松江桥下水，垂虹亭上试新茶。”饮茶不但使文人感到宁静与闲适，更令人觉得超脱与轻松。饮茶后的生理效应转化为精神上的解脱轻松感，这种轻松感在文人笔下有时竟被形容为羽化登仙的快活，苏轼在《寄周安孺茶》中描写道：“清风击两腋，去欲凌鸿鸿。……意爽欲飘仙，头轻快如沐。”宋代文人成不了仙，但却向往邀游逍遥的生活，于是，他们通过品茶，将饮茶所产生的快感夸大为类似的感觉，在幻想中得到超脱尘世的快乐。

最后是联系情感的媒介。陆游交友广泛，朋友间常有馈赠，在诸多礼品中，茶是一大宗。精美的香茗，特别是名茶，在当时有极高的身价。用以赠友酬宾，情深意重。这类作品在陆游诗中屡见不鲜，如，淳熙元年九月，陆游自大邑返回蜀州，作《九日试雾中僧所赠茶》（《剑南诗稿》卷五），诗云：

少逢重九事豪华，南陌雕鞍拥钿车。

今日蜀州生白发，瓦炉独试雾中茶。

诗中的“雾中”，即大邑的雾中山（又称雾山），出产佳茗，山僧以之赠陆游，陆游以诗记之，可谓两情依依。

陆游写下众多的咏茶诗，反映出宋代诗人在题材方面的开拓，也反映出宋诗偏于人文意象的一大趋势。陆游咏茶诗所揭示的旨趣，体现了宋人重涵养品节的精神，显示出宋代诗人特有的心理气质。

陆游临终前写下千古传诵的诗篇——《示儿》（《剑南诗稿》卷八五），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据《宋史》本传，陆游卒于嘉定二年（1209），享年85岁，张《宝庆会稽续志》、赵翼《陆放翁年谱》采用此说，依此，《示儿》当作于嘉定二年。然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陆游卒于嘉定三年（1210），享

年 86 岁，方回《瀛奎律髓》、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从之，依此，则《示儿》当作于嘉定三年。那么，《示儿》究竟作于哪一年？换句话说——

陆游究竟卒于何年？

《宋史·陆游传》：“（陆游）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山阴陆氏族谱》：“宁宗嘉定二年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五；（与令人）合葬五云乡庐家。至今崇祀乡贤。四川夔州亦立祠祀焉。”族谱所载，与《宋史》本传相合而且更加具体。我们应注意到，嘉定二年十二月小建，二十九日即除夕。

然而，宋代学者陈振孙却在《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八中写到：“（陆游）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终。”钱大昕力主此说，并在《陆放公年谱》“嘉定三年”条下写到：是岁先生卒。先生《题药囊》诗有“残暑才属尔，新春又及兹”之句，又《未题》诗云：“嘉定三年正月后，不知几度醉春风？”则正月间先生尚无恙。

陈氏《直斋书录解題》谓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终者，盖得其实。《宋史》本传云：嘉定二年，年八十五。

殆考之未审耳！

钱大昕的考证似乎相当有说服力，其实，他是误读了陆游的诗句。陆游《未题》中“嘉定三年正月后，不知几度醉春风”之句，是陆游在岁末病中计算自己尚能活多少日子之语（故诗中用“不知”），而钱大昕竟认为是已然之事。以此为据是不能说服人的。至于“残暑才属尔，新春又及兹”诗句中的“新春”，非已经换岁，只是说新春将至，陆游的诗多有此类用法。如《剑南诗稿》卷二六绍熙三年所作《壬子除夕》诗前，有《立春》诗云：“绍熙又见四番春，春日春盘节物新。”但这首诗作于绍熙三年而非绍熙四年。同书卷三六《戊午元日读书至夜分有感》诗前，有《初春欲散步畏寒而归》诗，诗有“春困苦多无处卖”句，但此诗作于庆元三年年末而非庆元四的年初。同书卷四二庆元六年所作《庚申元日口号》六首前，有《新春》一首，但此诗作于庆元五年底而非庆元六年初。同书卷六九开禧二年所作《十一月廿七日夜分披衣起坐……作诗志之》诗前，有《春近》诗云：“开禧忽见第三春”，但此诗作于开禧二年而非开禧三年。陆游《题药囊》中“新春又及兹”之句，亦是同类。显然，钱大昕的两条根据都是不成立的。

关于陆游的卒年，陆游晚年弟子苏 的一首诗很值得一读。苏 《冷然斋诗集》卷六有《金陵杂兴二百首》，其第十六首云：

三山掺别是前年，除夕还家翁已仙。

少小知怜今老矣，每因诗句辄潜然。诗中的“除夕还家翁已仙”一句，只能是指嘉定二年除夕；如指嘉定三年除夕，以陆游写诗之勤，我们在《剑南诗稿》中怎么竟找不出几首嘉定三年之作？由此可知，此诗的第二句，实可为陆游卒于嘉定二年的力证。苏 的这首诗有极高的可信性。首先，苏 外祖孙综与陆游是中表亲，二人自幼过从，情好甚笃。其次，苏 与陆游为近邻。苏 自己曾在诗中说：“结屋清镜滨。”清镜即指镜湖。苏 还曾在

诗中说：“颇幸结屋今连间。”最后，苏 从陆游学诗，是在陆游晚年居家时，故对于陆游的情形较为了解。总之，苏 的话是可信的。据其诗意，陆游当卒于嘉定二年除夕稍前，苏 因此才有恨不及见之感叹。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倘遇中西历跨年情况，则较为复杂。所以，陆游卒年，若依夏历，应为嘉定二年；若以公历计，应为1210年1月26日。

陆游临终前的《示儿》诗，炙灼人心。他一生写了那么多诗歌，最后以“示儿”收笔，够人尽情体味的了。翻检《剑南诗稿》，我们会发现各种题目的示子诗随处可见，卷卷皆有。那么——

陆游一生共写了多少示子诗？

仅就诗题来看，《剑南诗稿》共保留陆游的示子诗有70首；若不考虑诗题而从内容着眼，则有示子诗200首。此种情况，在我国诗坛上是不多见的。

陆游有六男二女，子又有子。作为一位爱国者兼诗人的长辈，陆游对其后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的示子诗，或谈治学之道，或论平生宏愿，语言质朴，亲切感人。

陆游的示子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 教子读书。宋代是一个文化相对普及的历史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后代的教育大多抓得很紧。就非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挤入官僚行列；就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刘清之《戒子通录》卷六《教子语》中有这样一句著名格言：“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陆游官运不济，自称“看尽人间利与名，归来始觉此身轻”（《剑南诗稿》卷三三《题斋壁》），但仍将读书视为教子的重要内容之一，诗人在一首《示儿》诗自述说：“读书乃一癖，吾亦不自知；坐书穷至劳，更欲传吾儿。”陆游那种好读不倦的精神影响着孩子们，他的示子诗中，有不少是描述父子相伴读书情景的，如《剑南诗稿》卷二二的《示儿》诗云：

舍东已种百本桑，舍西仍筑百步塘。
早茶采尽晚茶出，小麦方秀大麦黄。
老夫一饱手扪腹，不复举首号苍苍。
读书习气扫未尽，灯前简牍纷朱黄。
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须饮酒径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

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陆游不仅“夜永卧听儿读书”，而且亲自动手为寒窗苦读的儿子服务：“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

在陆游大量的示子诗中，有不少谈到读书目的、方法，这或是个人生活的总结，或是有针对性的忠告，其中不乏至理名言，如《剑南诗稿》卷四二《冬夜读书示子聿》之三云：

骨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2) 教子立身。陆游自己一生空怀壮志，屡遭坎坷，但却不愿以消极颓废情绪影响子孙，而是以乐观向上的精神鼓励晚辈。诗人仕途受挫之后，家境逐渐贫寒，以至于经常处在“雷动空肠惯忍饥”的境地，《剑南诗稿》卷六四有《灯下晚示子》，诗中曾这样描述家中窘况：“家贫短衣不掩，空庖凄凄灶不爨。老翁八十忍饥熟，兀坐空堂日常吁。今年闰余九月寒，哪敢遽议南山炭。艰难幸复致一，铺吸灯前百忧散。”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不但自己参加一些田间劳作，也时时嘱咐晚辈“未用厌锄犁”、“孺子虽知学，家贫且力耕”，让他们懂得“躬耕百亩可无饥”的道理。就宋代的情况

而言，陆游的这种教子内容很有代表性。如果说“古者士则不稼”（陈舜俞《都官集》卷七《说农》），那么宋代士大夫则普遍认为：“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周辉《清波杂志》卷十一）宋代的“耕读家庭”就是由此产生的。

晚辈出仕时，陆游格外关注。《送子龙赴吉州掾》一诗写得情真意切。其中“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是说为官要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我食可自营，勿用念甘旨；衣穿听露肘，履破从见指”是讲两袖清风，不求奢侈享受，知足常乐；“敬叔乃乡里，岂惟能文辞；实亦坚操履，相似勉讲学”是谈尊敬师长，广为交友，虚心求教。陆游主张为官就要“醇如新丰酒，清若鹤林泉”，决不能与势利小人为伍，一定要保持清廉的品德。

（3）教子爱国。陆游的爱国主义激情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他的示子诗也自始至终洋溢着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其中常有父子共论治乱、大谈“南北会当一”的理想和志向，也有探讨统一收复良策的情景。陆游的儿子先后出仕，他都积极支持孩子们为国出力，特别是在晚年，他忍受着离别和孤独的煎熬，视国念为家念。开禧二年，子 任淮西濠州通判，身临抗金前线，陆游有诗送行，为子 能“身率将士力战平之”而感到自豪。至于临终前的那首《示儿》诗，是作为遗嘱留给后人的。这首诗是陆游爱国思想的升华、浓缩的结晶，足以粉碎加在诗人身上的不实之辞。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云：“人谓公探孝宗恢复之志，故作为歌诗，以恢复自期。至公之终，犹留诗以示其家云：‘王师 复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则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箦之时矣。”

陆游那种近乎痴情的爱国热情当然也教育和影响着他的子孙。陆游卒后79年，元兵败宋于 山，南宋亡。陆游孙元廷（三子子修之子）闻 山之变，忧愤而死。曾孙传义（二子子龙之孙），闻 山之变不食而卒。玄孙天骥（子龙之曾孙）于 山抗元战役中蹈海死。

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陆游的遗愿未能实现。南宋遗民林景熙《雾山集》卷三有《书陆放翁诗卷后》，诗中有“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之语。林氏写此诗时，南宋已经亡国，故诗意甚为痛切！

陆游在《示儿》诗中所期待的王师北定中原之举虽未能成为现实，但陆游在《示儿》诗中所表现的爱国激情却与世长存！

陆游是我国文学史上诗作最多的文学家，他以“平生诗句传天下”为荣，《剑南诗稿》共85卷存诗9100余首，毛晋《放翁佚稿》辑陆游之诗作43首（当然，其中亦有他人之作羸入，此处不一一指正）。中华书局《陆游集》出版说明说：“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现存九千多首。”

这是比较平实的看法，人们要问的是——

陆游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诗？

陆游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大致推断，陆游一生至少写有三万多首诗。

《剑南诗稿》总计存诗 9138 首，现将其诗作系年统计表展示如下：

年岁	诗数	年岁	诗数	年岁	诗数
36 以前	49	37	10	38	11
39	22	40	5	41	14
42	16	43	28	44	12
45	(无)	46	68	47	51
48	109	49	129	50	175
51	36	52	148	53	212
54	147	55	154	56	173
57	164	58	69	59	211
60	114	61	64	62	169
63	176	64	100	65	41

年岁	诗数	年岁	诗数	年岁	诗数
66	67	67	221	68	251
69	249	70	260	71	227
72	158	73	105	74	246
75	362	76	300	77	468
78	278	79	355	80	453
81	454	82	451	83	478
84	599	85	479		

当然，这绝非陆游的全部作品。如，曾几《茶山集》卷一有《还守台州次陆务观赠行韵》，卷五有《雪山陆务观来问讯，用其韵奉赠》、《陆务观效孔方四舅氏体，倒用二舅氏题云门草堂韵，某亦依韵》，而在《剑南诗稿》中均查不到原韵。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二有《陆务观病弥旬，仆不知也，佳篇谢邻里，次韵自解》、《务观得曾吉甫茶，以诗见遗，因次其韵》、《招陆务观令江西笋，归有绝句云……戏和》，卷三有《次韵陆务观送行二首》、《病中次陆务观通判韵》，而《剑南诗稿》并无原韵。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一八有《次韵陆务观慈姥岩酌别二绝》，《剑南诗稿》无原诗；又，同卷有《次韵陆务观编修新津遇雨不得登修觉山，经过眉州三绝》，《剑南诗稿》有二绝，无愁字韵。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六有《次韵务观城西书事二首》，《剑南诗稿》无原韵。史浩《峰真隐漫录》卷四有《次韵陆务观游四明天》，卷五有《阿育王山有松万株，乞亭名于真隐居士，榜曰‘构风’，陆

务观作诗，因次韵》，《剑南诗稿》无原韵。《宋诗纪事》卷五 有程大昌《次韵陆游海棠》，《剑南诗稿》无原韵。

当然，陆游佚诗远非以上所举。如，《剑南诗稿》卷十九有《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而《菊枕》诗失传。隆兴二年闰十一月至乾道元年正月，陆游与其友韩元吉皆在京口，唱酬颇乐，共赋诗 30 篇，编为《京口唱和》，陆游为之作序（见《渭南文集》卷十四）。今检陆游诗词，唯得《无咎兄郡斋燕集有诗未章见及，敬次元韵》（见《剑南诗稿》卷一）、《赤壁词》（调下原注：“招韩无咎游金山。”见《渭南文集》卷四九）、《浣溪沙》（调下原注：“和无咎韵。”见《渭南文集》卷四九），其余均亡佚。乾道九年，陆游自编《东楼集》，收古律 30 首，并有序，见《渭南文集》卷十四。序谓乾道八年在王炎幕府“凭高望”，“思一醉曲江、 陂之间，其势无由”，及发而为诗，“欲出则不敢，欲弃则不忍”，遂“叙藏”之。据此序检《剑南诗稿》，似此集所收之诗已大部失传。陆游乾道八年南郑从戎时写下不少军旅之作，曾自选百余篇编为《山南杂诗》，而在舟行过望云滩时竟坠落水中，此《山南杂诗》百余篇因此失传。

另外，据陆游长子陆子 的《 剑南诗稿 江州刊本跋》，陆游在严州时自编前稿，于旧诗多所去取，“其所遗诗，存者尚七卷”，陆子 别其名为《剑南诗稿遗稿》。但《剑南诗稿遗稿》早已失传，部分作品在他书中有所保存。如，王象之《舆地纪胜》收陆游佚诗六首，首尾完整者二首、残句四首，皆陆游在严州编诗前之作。再如，《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收诗 196 首，未见《剑南诗稿》者 14 首，这 14 首诗与陆游晚期作品不类，当是严州编诗之前所作。据此，似可推断须溪及王象之曾接触过《剑南诗稿遗稿》。

我们为什么推断陆游一生至少写了三万多首诗呢？根据当然是有的。

《渭南文集》卷二七《跋诗稿》云：

此予丙戌以前诗二十之一也。及在严州再编，又去十之九。然此残稿，终亦惜之，乃以付子聿。绍熙改元立夏日书。

跋语中所说的“丙戌”，是乾道二年（1166），陆游时年 42 岁。查《剑南诗稿》，陆游乾道二年前的诗作有 111 篇。按《跋诗稿》所说，111 首诗是“严州再编又去十之九”的结果，说明严州再编前有诗 1100 余首，而这个数字仅是“丙戌以前诗二十之一”，那么，丙戌以前，即陆游 42 岁以前，就写诗 22000 余首。这是有根有据，不容置疑的了。

根据《剑南诗稿》，陆游 42 岁以后的诗收 9027 首，这个数字加上 42 岁之前的 22000 余首，就已 31000 余首了。在此，我们尚未涉及陆游 42 岁之后诗作的亡佚情况。总之，我们可以肯定，陆游一生最少写了 3 万余首诗。

在诗歌创作方面，陆游异常勤奋，他自称：“三日无诗便怪衰”，“损食一年犹可健，无诗三日却堪忧”，甚至到了每日必有诗的地步（“无诗日每惭”），由此，他的诗作是异常丰富的。

问题是，既然陆游一生创作了至少 30000 余首诗，为什么只留下 9000

余首呢？为什么乾道二年前之诗仅留下“二十之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到南郑从戎。陆游在绍熙三年写下《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剑南诗稿》卷二五），诗云：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
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
打 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
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
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
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 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为了理解这首诗，我们不妨再读一读陆游嘉定元年写的《示子 》（《剑南诗稿》卷七八）：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郤。
正令笔找鼎，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狴？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陆游南郑从戎，这是他得以身临前线的唯一机会。陆游心情振奋，他身着戎装，戍卫在大散关头，来往于前线各地，接触了爱国民众，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地形，出谋献策，积极准备挥戈北伐。他生活在战士中间。这种火热的战斗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扩大了他的诗歌领域，并使他领悟到“诗家三昧”，从现实生活中、从火热的斗争中汲取题材，因而形成了他的宏丽悲壮的风格。这是陆游诗歌成熟的关键时期。为了纪念这段有意义的生活，后来他把自己的诗集题名为《剑南诗稿》。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在严州再编诗稿时，在 42 岁之前的诗作 22000 余首仅选 111 余首，将大量的“从人乞”的模仿之篇和“工藻绘”的早期不满之作，彻底删除了。这便是陆游诗歌仅留传下来 9000 余首的主要原因。

《宋人百家小说》及《香艳丛书》收《清尊录》一卷，共十则，署名为陆游。然而，《说郭》及《古今说海》亦收此书，署名却为廉布。

那么——

《清尊录》是不是陆游所作？

宋人王明清（字仲言，与陆游为同时人）《挥麈后录》卷五《黄巢明马儿李顺皆能逃命于一时》条说：“今日陆务观《清尊录》言老内侍见林灵素于蜀道。”元人王栾《清尊录后记》说：“明清之父，字性之，务观曾携文谒之，备见于《老学庵续笔记》中。”郭光先生据此认为《清尊录》必陆游所撰，而作为专绘山水林石的画家廉布来说，他并不是《清尊录》的作者。

郭光先生之论有可商榷之处。

《清尊录》一则之末云：“予在太学时亲见。”然而，陆游未曾进入太学，倒是廉布曾入太学。《渭南文集》卷十四《容斋燕集诗序》载，宣和初年，廉布“以郡文学高第入为博士”。此篇文章是陆游应廉布之请所作；容斋，廉布燕集之室。《清尊录》另一则之末云：“表弟临淮李从为余言”。然而，在陆游的亲戚中，未有籍临淮者。相反，据邓椿《画继》卷三，廉布老家山阳，与临淮较近。据此，《清尊录》仍当为廉布所作。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看看王明清另一部著作——《投辖录》。《投辖录》共四十九则，其中有五则出于廉布。该书载林灵素事二则，其一则之末，王明清自注：“廉宣仲云。”宣仲即廉布之字。《投辖录》所记廉布之语，皆奇事逸闻，与《清尊录》所记正相类同。此种情形亦可证《清尊录》为廉布所作。

郭先生认为廉布“不是文学家”，似乎以此佐证《清尊录》为陆游所作，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清尊录》这类的笔记之作并非一定要出自文学家之手；况且，廉布本人也是能作诗文的。建炎年间，廉布避乱于天台白岩山，与吴说、邓仁宪朝夕唱酬，有“将士戈犹枕，书生笔屡投，中原兵未戢，尚有自焚忧”之句，见《天台集别编》卷一。另外，绍兴九年，廉布应象山邑民之请，作《修朝宗石记》。以此等手笔，写出《清尊录》，当不成问题。

据王明清《投辖录》、廉布为张邦昌之婿，故不得重用；且与吕祉同岁。据《宋史·吕祉传》，吕祉于绍兴七年七月为叛将郿琼所害，时年46岁。据此，廉布当生于元祐七年（1092），比陆游大33岁，二人可谓忘年之交。

《宋史·艺文志五》载有陆游《山阴诗话》一卷；焦《国史经籍志》亦有相同记载。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介绍陆游著作时，亦提及《山阴诗话》，并遗憾地称其已经“散佚”。然而，宋人目录学家陈振孙却说《山阴诗话》为李兼所撰（见《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二），胡震亨也持相同看法（见《唐音癸签》卷三二）。那么——

《山阴诗话》的作者究竟是谁？

从时间上看，陈振孙时代距陆游甚近。据《宝庆会稽续志》卷二，陈振孙曾于理宗嘉熙元年（1227）提举浙东，其时距陆游之卒不过二十余年。应该说，陈振孙的说法是可信的。在历代正史中，《宋史》纰缪之多是人所共知的，仅就《艺文志》而言，既有蒋作宾、赵不迹《会稽志》二卷，又有陆游《会稽志》二卷。对于这一问题，清人钱大昕《跋会稽志》一文已辨其误（见《潜研堂文集》卷二九）。也许，《宋史》编撰者以为陆游是山阴人，自然就该是《山阴诗话》的作者了。至于焦 ，他不过是未加深考地沿袭前人误说而已。《山阴诗话》的真正作者应该是李兼。

李兼对诗歌很有研究，曾编辑《梅圣俞别集》，嘉泰三年止月，陆游应李兼之请，作《梅圣俞别集序》，见《渭南文集》卷一五。李兼是陆游的挚友之一。开禧元年，陆游在山阴作《老怀》（《剑南诗稿》卷六三），诗云：

老怀常易感，秋雨苦难晴。
羈枕悲欢梦，高城长短更。
荣枯一 堦，成坏几棋枰？
抱疾茅檐下，行人肯寄声。

陆游自注云：“昨日和李孟达书。”李孟达即李兼。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李兼，字孟达，宁国人。孝先曾孙。博学工诗，杨万里推许之。开禧三年，以朝请郎出知台州，居官有守。明年九月，除宗正丞，未行卒。所著有《雪岩集》。”李兼之死，使陆游很为伤心，他写下《哭李孟达》（《剑南诗稿》卷八二），诗云：

旧交多已谢明时，孟达奇才最所思。
晚岁立朝虽小试，平生苦学竟谁知！
尊前一笑终无日，地下相从却有期。

恸绝寝门霜日暮，短篇聊为写余悲。陆游称其为奇才，赞其苦学，且又“博学工诗”，李兼撰有诗话，当不是空穴来风。问题是，他为什么将所撰之诗话名为《山阴诗话》呢？陆游的《会稽志序》（《渭南文集》卷十四）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线索。据《会稽志序》，李兼曾官浙东（任安抚司干办公事），参与修编《会稽志》，其所撰诗话以山阴为名，当是本此。

陆游一生坎坷，历尽磨难，但却以85岁的高龄而寿终。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陆游的确是长寿者了，那么——

陆游有何长寿之道？

陆游生逢强敌压境、王朝偏安于一隅的时代，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书军”的报国壮志。为此，他一生勤于书剑，留下了近万首诗篇，成为南宋时期的伟大爱国诗人。虽然一生坎坷，历尽磨难，却活到了85岁，其原因正是他注重养生健体并一生为之实践的结果。

陆游写的激励后人的爱国诗作，以及感人情怀的爱情悲剧诗，千古传颂，尤其是他的爱情悲剧诗，被编成戏剧电影，搬上舞台银幕，广为人知，但是，他的那些今天仍有借鉴之处的养生健体诗篇，却不大为人所知。其实，陆游本精通医道，擅长养生。在其浩瀚的诗篇中，可以寻觅出若干养生健体之诗作，从中可以得知陆游之所以能健康长寿的奥秘，读陆游这方面的诗作，不仅可以养性怡情，还可以获得很多启迪。

习武练功——

陆游少壮时期即以身许国，发奋读书，酷爱剑术、骑射，曾亲手刺杀过一只猛虎。“耿耿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母仇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这是何等英武豪健。陆游不以军旅生活为苦，“我时在幕府，来往无晨暮，夜宿沔阳驿，朝饮长木铺。”他曾在雪夜飞渡渭水，不顾冰滑水深，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即使后来衰病卧床，还“振臂犹思备征戍”。

陆游不仅长期习武，还坚持每天做气功以锻炼身体。他在《五更起坐》诗中说：“煌煌心光回自顾，绵绵踵息浩无声。”

由于长期坚持，因而得益匪浅，收到了“住山缘熟尘机息，养气功夫搞面丹”的效果。

可见，陆游的健体与报国壮志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他习武、练功也就终生不止。

笔耕不辍——

陆游终生笔耕不辍，直到年逾80高龄以后，仍勤于笔耕。他自感“无诗三日却堪忧”；常说“三日不作诗，幽禽语撩人”。他还嗜书如命，终生手不释卷，“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谓绳头二万言”。陆游的一生，就是这样从读书写作中寻求到生活乐趣，陶冶性情，舒展胸怀的。

陆游对练书法有益健康也深有体会。他在《草书歌》中说：“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斛酒不敌，今朝醉眼烂岩电，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扫不自如，风云入怀天借力。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摧山太阴黑。此时驱尽胸中愁，槌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出高堂三尺壁。”诗人在书法中动静结合，气贯尺幅之间，进入了如醉如痴的忘我境界，岂有不长寿之理！

喜爱运动——

陆游喜爱登山、打球等体育运动。一次，他去四川青城山时，不顾年事已高，独自登上艰险难攀的灌口，使同行者为此惊异不绝。可他却在峰顶远

眺滚滚岷江，畅吟“姓名未死终磊磊，要与此江东注海”。他认为，“游山如读书，深浅皆可乐”。目的明确，强身健体，骋目抒怀，投身大自然；“青猿导幽蹊，青草伴微步”，不以平奇为爱恶。陆游还是一位打球健将，读读他那描述比赛精彩、气氛热烈的球场诗作，便可领略一二。如“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姿驰逐。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球场日打球”；“打球筑场一千步”；“射棚命中万人看，球门对植双旗红”。这些诗句，既是军队开展球赛盛况的反映，又是陆游活跃在军中球场上的自我写照。

田园耕作——

陆游很喜欢参加田间农业劳作，在山阴闲居时，他还亲自种菜种花。他的诗中有“身杂老农间，扶衰业耕桑”；“夜半起饭牛，北斗垂大荒”；“平生乐行役，不耐常闭户”；“堪叹筋骸犹健在，强随丁壮事深耕”；“八十身犹健，生涯学灌园”；“五亩畦菜地，秋来日荷锄”；“午窗无一事，梨枣弄诸孙”。

陆游也喜欢家庭劳动，他专为称赞“扫地”而写了一首诗：“一帚常在旁，有暇即扫地；即省课童奴，亦也平血气，按摩与导引，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去，延年直差易。”

由此不难看出，陆游能获高寿，是与他坚持参加适当的劳作分不开的。陆游十分推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哲理。有诗云：“故放小劳君会否？户枢流水即吾师。”他在后来即使年事已高，“不复事农桑”了，也还要“拥杖牧鸡豚”。

注意保养——

陆游在日常生活中，很注意食居等保养，主张劳逸结合，食眠有节。他提出“休息取调节气血，不必成寐；读书取畅适性灵，不必终卷”。“晨脯节饮食，劳逸时卧起”。还说：“朝脯食粥汤饼之属，皆当令腹中有余地。鱼肉仅仅可以下饭，按酒则已，多尤为害。食罢，行五七十步，然后解襟褫带，低枕少卧，此养生最急事也。”

身体的健康与否，有无疾病，虽要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保养是否得宜。特别是老年人，一不小心，就会百病滋生。陆游对此深有体会，他写道：“吾身本无患，卫养在得宜。一毫不加紧，百病所由滋。”有此认识，也就必有注意保养的措施，也就必然会身强体健。

调整身心——

陆游少时体弱多病，青年时又爱情受挫，重演了一幕《孔雀东南飞》式的悲剧。诗人在84岁时，离逝世只有一年，犹赋诗怀念他与唐婉的那段婚姻与恋情，“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是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真是至死不忘，情深意长。中年后仕途多艰，壮志难酬，逝世前叹呼“但悲不见九州同”。尽管如此坎坷之人生，但陆游却未因此而失去进取之心。

在坎坷的人生途中，陆游冷静处世，注意心理调节，始终以乐观的态度，

正确地对待人生人世中的一切坎坷和挫折，以保持暮年壮志。他开朗豁达，培养乐观性格。“放翁胸次谁能测？万里秋毫未足宽”；“长生岂有巧？要令方寸虚”；“纷纷谤誉何劳问，莫厌相逢笑开口。忍字常须作座铭，扫尽世间闲忿纷”。这里的“未足宽”、“方寸虚”，以及以“忍”为上，都是要求净化思想，排除一切释咎争荣的个人杂念，求得心静。陆游是主张心静豁达，老有所乐的。他甚至认为闲时当寻嬉，常动小劳，以活跃身心。这些情景，被诗人用“整书拂几当嬉戏，时取曾孙竹马骑。故放小劳君会否？户枢流水即吾师”，表达得淋漓尽致。

自古文人多清贫，陆游也不例外。但陆游“直令贫到骨，未害气如虹”；“木盘炮藜苋，美与玉食同……放箸一笑粲，赋诗晓愚公”。他注重情志养生，顺其自然，能从寻求生活乐趣与坚持身心锻炼着手，“饮水读书贫亦乐”，所以达到了“正似篱边数枝菊，岁残犹夏耐冰霜”。同时，陆游对养生健体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抱定“寓形天地里，疾病谁能无？”“一笑失百忧”；“世上闲愁千万斛，不教一点上眉端”；“心闲天地本来宽”；“养生如艺树，培养要得宜。常使无天伤，自有千云时”的态度，终生为之求索。因此，他“年事依稀鬓复青，看书细字眼犹明。六十还朝今八十，都为修史几个知？”这就是说，由于陆游有自己的一套养生健体方法，他在70岁时依然是满头乌发，耳聪目明，连蝇头小楷还看得清清楚楚；80岁时，尚能伏案撰写史书，身体之康健是明摆着的。

保健诸法——

陆游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系列的保健养生方法，如经常梳头、睡前洗脚、常搓睾丸等。

梳头有生发健身的功能。经常梳头，不仅可减少灰尘、微生物和其他碎屑，使头发干净光亮，而且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与抑制过程，调节头部的神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和皮下腺体分泌，促进头发生长。陆游有诗云：“客稀门每闭，意闷发重梳”；“觉来忽觉天窗白，短发萧萧起自梳”。

脚部情况是人体全身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睡前洗脚是含有丰富的科学内容，有益于老年保健的。陆游有诗云：“老人不复事农桑，点数鸡豚亦未忘。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渐长解烧汤。”

常搓睾丸其实也是一种富有科学内容的养生保健法。睾丸，亦称“精巢”，是人和动物的雄性生殖腺，是产生精子和分泌雄性激素的器官。陆游有诗云：“人生若要常无事，两颗梨需手自煨。”“两颗梨”即男人的两颗睾丸；“手自煨”即用两手去揉搓。古传《男子固本益寿之诀》即有以两手将阴囊捧起，将睾丸置于掌心中，两掌前后移动，谓之“搓”，共搓100次之法。揉搓睾丸，可以增强睾丸功能，有利于产生精子，分泌雄性激素，延长生殖能力，防止早衰。

酷爱素食——

陆游咏叹素食的诗竟有数十首之多，说明他是酷爱素食的。

陆游有一首诗从侧面描写了人们吃麦做面点的欢欣，很有情趣。诗云：“玉尘出磨飞屋梁，银丝人釜须宽泌，寒醅发剂炊饼裂，新麻压油寒具香。大妇下机废晨织，小姑佐庖忘晚妆。老翁饱食笑扪腹，林下击杯歌时康。”这首诗渲染的场面，简直是一幅绝妙的农家乐图，非好食面点，焉能写得如此传神！

鲜蔬干果是陆游很感兴趣的食品。他很喜欢四川的韭黄和鞭笋。有诗咏曰：“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洗釜烹蔬甲，携锄笋鞭。”至于黄瓜，他也视为上品，“黄瓜翠苣最相宜，上市登盘四月时；莫拟将军青芥句，两京名价有谁知？”这评价是多么地高啊！陆游晚年时，牙齿已松动，但他仍喜吃炒栗子，并有诗咏叹：“齿根浮动吾衰，山栗炮燔疗夜饥；唤起少年京辈梦，和宁门外早朝时。”

陆游对野菜也有深厚的感情，他用荠菜与糝同煮，认为是上好的食品。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食荠糝》诗：“荠糝芳甘妙绝伦，辍来悦若在峨岷。

羹下鼓知难敌，牛乳拌酥亦未珍。异味颇思修净供，秘方当惜授厨人。午窗自抚臑腹，好住烟村莫厌贫。”

陆游深得饮食之精髓，一生偏爱食粥，视粥为养生之妙品，他认为常食粥可以益寿延年，他的《食粥》诗更是脍炙人口：“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陆游晚年仍耳聪目明，鹤发童颜，享年 85 岁，这与他喜食素食有很大关系。

后记

陆游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和史学家。不过，他自己生前对时人这方面的赞誉并不过分在意，他更想成为一位能指挥千军万马北伐中原的将军，遗憾的是，苟且偷安的南宋政权并没有力他提供实现这一宏愿的条件。苦闷和失望折磨着他，他在内成外患中饱受煎熬，由此，他的作品便具有了一种千古不灭的魅力。在这里，我们不禁再一次想到这样的古训：国家不幸诗家幸。当然，这里所谓的“诗家”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贤才每被庸才妒，傲骨偏遭媚骨伤。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陆游在生前及身后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例如，有人对陆游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思想，颇不以为然。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说：“人谓公（陆游）探孝宗恢复之志，故作为诗歌，以恢复自期。”赵翼《欧北诗话》中也提到，当时有一些人把陆游的爱国主义创作说成是“书生习气，好为大言，借此为作诗地”。这类论调，或是恶意的中伤，或是严重的误解。再如，对于陆游诗歌创作的成就，很有一些人极尽吹毛求疵之能事，田同之认为陆游的诗“不免于滑易”，袁枚则讥其“重复多繁词”，朱彝尊在《书剑南集后》中有一段相当苛薄的文字：“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而且，朱彝尊还罗列出三十九例以证其说。另外，陆游诗歌创作的题材本来是相当广泛的，可有些人置其主要方面于不顾，大肆吹捧陆游的闲适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石研不容留宿墨，瓦瓶随意补新枝”这类诗句，被赞誉是“流丽绵密”、“清圆可诵”，袁宗道在一首诗中称赞陆游“模写事情俱透脱，品题花鸟亦清奇。”这种表面上的称颂，其实质依然是对陆游的曲解。此外，文人笔记小说中（甚至包括《宋史·陆游传》）对陆游生平的描述亦多有不实之处，其中有些问题无关轻重，有些问题则非同小可——如陆游晚年与韩胄的关系问题。基于以上种种原因，陆游身上笼罩着种种疑云，拨开这些疑云而还其本来面目，这是一件十分必要而又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正是为此而作。

本书的重点放在陆游生平及其诗文之“秘”上。这些所谓的“秘”，包括陆游某些作品的真伪及创作动机、陆游生平活动的重新考证、陆游的交流、陆游的思想，同时，也涉及一些现代研究陆游者的不妥切之论。由于这是解“秘”之作，作者无意于描绘或勾勒陆游的生平全貌，读者如欲从整体上把握陆游，不妨另找一些书籍（如各类《陆游传》）来读。本书的意义在于：读者在对陆游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阅读此书可加深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奉行“谜”开即止笔的原则，因此，具体篇章长短不一，有时甚至相距甚大，这便是所谓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在陆游研究的这一领域，有些问题虽重大，但并无分歧异说；有些问题虽

微小，但不同的理解之间却泾渭分明。寻谜而行笔，不拘于问题之大小，这是本书的宗旨。在秘案分类方面，本书采取以时间为序的方法，这既是某些秘案的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又是为了便于读者把握陆游的生平。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相关著作。主要有《陆游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钱中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陆放翁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于北山《陆游年谱》（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欧小牧《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朱东润《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郭光《陆游传》（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孔凡礼、齐治平《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此外，作者还参阅了建国以来的各种陆游作品选注本以及许多专家学者的单篇论文，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作者学力有限，本书中不妥之处当多有所见，恭请批评指正。

编者
1996 年 9 月

